

同舟共進

2025.10

总第448期

定价:13.00元

(港澳地区30.00元)

中国近代儿童教育

朱德与南泥湾垦荒 / 徐元宫

丰子恺的“艺术抗战” / 刘永加

职业报人张恨水 / 汪修荣

“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人 / 张 玮

苏东坡的岭南行 / 李怀宇

ISSN 1006-3811



10 >

9 771006 382566



张玉麟

《青山依旧伴红楼》

· 中国近代儿童教育 ·

专题策划	马背上的摇篮	徐 鹏 (4)
	——延安时期儿童保育工作叙事	
	近代文人的童年印象	薛 原 (8)
	名人的家庭教育	张守涛 (13)
	中国幼儿教育先驱者陈鹤琴	克 念 (17)
人物春秋	朱德与南泥湾垦荒	徐元宫 (22)
	丰子恺的“艺术抗战”	刘永加 (27)
	职业报人张恨水	汪修荣 (31)
	老舍下厨	颜坤琰 (37)
往事历历	“兔子岛”的秘密	张在军 (40)
	——一位反战人士的叙述	
	朝鲜战场上的情报战	章慕荣 (44)
	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	钟兆云 (46)
	——国际友人林迈可	
灯下话旧	“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人	张 玮 (50)
	孟宪承：中国现代教育的探索者和开拓者	张 砺 (55)
	抗战中的捐机者	王厚明 (59)
岭南历史	林国祥：矢志一生捍海疆	王 戡 (62)
	苏东坡的岭南行	李怀宇 (66)
文化广角	冰心与燕大	孙玉祥 (71)
	“诗为禅客添花锦”	郑连根 (76)
	——禅诗小史	
	“丝毫不通融”的傅斯年	魏邦良 (80)
舟边絮语	欧阳修为范仲淹撰神道碑	陈季冰 (83)
	“双六节”的由来	李开周 (86)



月刊

2025年第10期
(总第448期)
10月15日出版

总 编 辑：孙宏光
编辑部主任：郭芙秀
编辑、记者：梁思慧
刘淑君
钟 瑞
美 术 编 辑：梁颖瑜

同舟共进杂志社授权律师声明

本刊谢绝一稿多投，坚持独家使用的原则。凡向本刊投稿，如未注明非专有许可，视为专有许可。在本刊发表的任何文章，视同作者同意在本刊相关网站发表及结集出版（稿酬不另支付）。除标明不得转载外，其他报刊及网站转载、摘登本刊作品须注明出处。否则，本刊保留追究相关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本刊常年法律顾问：朱征夫

本刊选用了部分资料图片，敬请作者与本刊联系并领取稿酬。

编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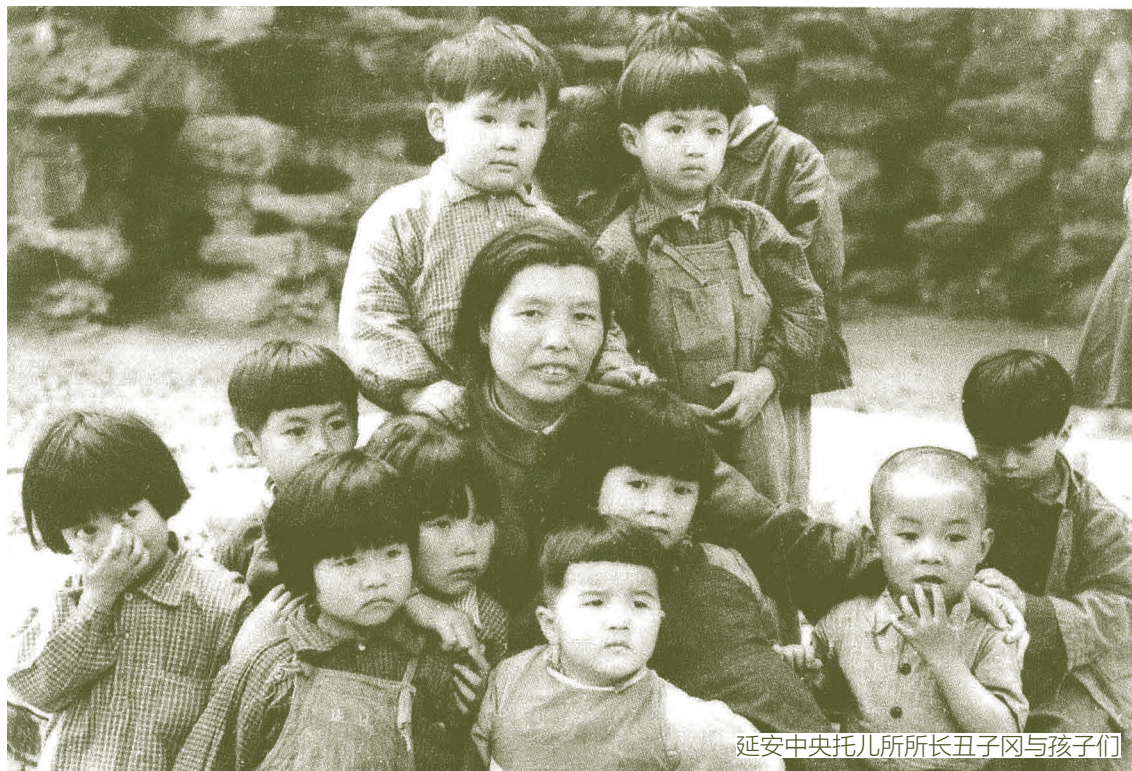
主 任：陈文明
副 主 任：朱仲南 肖航夫 洪晓龙

编 委（排名不分先后）：

吴敬琏	冯培恩	任玉岭	李君如	李仁臣
沈宝祥	杨天石	陈平原	葛剑雄	黄天骢
邱 捷	孙立平	李 辉	谢 泳	石仲泉
周瑞金	陈四益	沈志华	杨奎松	梁晓声
李永忠	王长江	韩 钢	汪玉凯	

主管主办：广东省政协
编辑出版发行：广东省政协文史馆《同舟共进》杂志
地址：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强路7号民主大楼《同舟共进》杂志
邮编：510623
电话：（020）38308909（采编）
（020）38308908（发行）
传真：（020）38308918
定价：13.00元（港澳地区30.00元）
本刊网站：www.gdszx.gov.cn/zxkw/tzgj/，欢迎浏览
电子邮箱：tongzhougongjin@126.com
邮发代号：46-56
（可直接汇款到杂志社订阅，或到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4-1036 / 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6-3811
发行范围：国内外
印刷：广州市人民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

常年法律顾问：朱征夫
（全国人大代表、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



延安中央托儿所所长丑子冈与孩子们

中国近代儿童教育

教育之本，在于立人；人之立，始于童年。近代历史进程开启以来，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中国人对儿童的培育与期待，承载民族复兴的宏愿与个体觉醒的追求。

一个人在童年读到的书，遇到的师长，对于一生历程影响深远。经典上的一经句、一首诗，校园里的一棵树、一朵花，老师的一堂课、一句话，都有可能在这小心田播下人生鸿图大志的种子。

回望延安时期的儿童保育工作，战时环境下，仍尽一切可能将革命火种与民族希望传至新生一代；追溯近代幼教先驱陈鹤琴的生平与实践，其“活教育”思想宛如一股清流，润泽中国教育的土壤；梁启超、鲁迅、陈寅恪、朱自清等大家以言传身教与深情期许，为中国的孩子构筑精神家园；沈从文、郁达夫、季羡林等名人的童年回忆，共同编织出一幅童年世界的动人图景……

俗语道“三岁看八十”，童年教育深刻影响儿童的未来。儿童的未来正是国家民族的未来。

——题记

马背上的摇篮

——延安时期儿童保育工作叙事



行军途中的托儿所工作人员与孩子

文 | 徐 鹏（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1940年8月，从太行山去延安的路上，一位挑夫挑着担子，前面筐里躺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左太北，后面筐里放着衣物和吃食。左权将军的夫人刘志兰跟在挑夫身后，急急地赶路，此行是将小太北送往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托儿所抚养。（翟明战、胡木英等《特殊年代：特别的孩子和阿姨——回眸延安中央托儿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硝烟弥漫的岁月里，许许多多这样的孩子睡在或肩挑、或马驮的箩筐里，随着革命的脉搏颠簸前行。他们的成长摇篮不是温软的襁褓，而是黄土高原的山岭与沟壑，是战士用脊背撑起的移动家园。

保育机构的诞生

党的儿童保育工作的发源，较早可追溯至1929年，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在上海以教会慈善机构为掩护，筹备幼稚园，收养抚育烈士遗孤及因种种原因失去父母呵护的革命者子女。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上海戈登路挂

牌开业，董健吾任园长，王弼任顾问，“大同”寓意为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理想。为了涂上更浓的保护色，董健吾特地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园名，将墨宝制成匾额悬挂于幼稚园大门口。（《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隐蔽战线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先后入园的20余名儿童中，有彭湃、恽代英、蔡和森、李立三、杨殷、王弼等人的子女。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的三个幼子岸英、岸青、岸龙由湖南的亲戚送到上海毛泽民处，再送到大同幼稚园。园内工作人员大都是中共党员或其家属，如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嫂子陶锡琪等。1931年4月顾顺章事件发生后，大同幼稚园解散，儿童分散转移。此后，中央苏区政府在儿童保育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1934年2月颁布《托儿所组织条例》，标志性地开创了红色政权的托儿所制度。

历经万里长征，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烈士遗孤、前线将士子女及途中收留的“红小鬼”亟待安置，儿童保育工作成为紧迫任务。

1937年2月，徐特立在延安创办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小学班，后几经动迁、合并、改名。1938年9月，“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建成，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之捐款。毛泽东题词：“儿童万岁。”

1939年，宋庆龄领导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办一所儿童保育院，统一拨发经费。于是，“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延安第一保育院）成立，逐渐形成乳儿、婴儿、幼稚、小学四部，幼儿到龄就升到小学部念书。“延安保育院小学”简称“保小”。

毛泽东殷切叮嘱，“好好的保育儿童”，“为教育后代而努力”。周恩来从重庆募捐来奶粉和药品，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社会呼吁援助，送来毛毯、食品、医疗器材……边区卫生保健及儿童保育工作状况大为改善。1939年1月25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总结：

为了培养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减少革命干部的家庭顾虑，边区政府曾在前年建立了托儿所，首先免费收容工作人员的婴儿，现在收容儿童数已达200余名，且在继续扩大中。两年来虽因为管理经验缺乏，以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还未能达到期望的成绩，然而却开辟了边区培养健全后代和减少工作人员家庭顾虑的门路。尤其是因为获得了各方面的帮助，使儿童获得了较为优良的待遇。……儿童文化、卫生设备亦已稍得具备，对于幼稚生进行了抗日救国的教育，这于培养民族优秀后代是有极大贡献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随着儿童保育需求的不断增长，1940年3月，经卫生部部长傅连璋提议，毛泽东批准，成立了寄宿制的中央托儿所。1942年，为感谢洛杉矶华侨及国际友人对边区幼儿的大批捐助，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1945年，在宝塔山下又建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小学”，即延安第二保育院。这些实际驻地多变的机构，一般都统称为延安保育院，以“保教结合”为宗旨，与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等一起，成为战时儿童保护体系的

核心。（综合郭青《延安保育小学：革命回忆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央档案馆编《摇篮里的中国梦——毛泽东关怀下的延安保育院》，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黄土坡上的日常生活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熟悉的旋律响起，很多人就会跟着哼唱，这首《丢手绢》诞生于1940年代的延安保育院，至今仍是流传最广的儿歌之一。

孩子们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土炕上铺着草席，每床被子用染料编号，防止拿错。早餐是小米粥、豆浆、咸菜，午餐、晚餐是小米干饭，多半还有馒头，每周至少有一次肉菜。陕甘宁边区所有军政干部和学生均实行供给制，为照顾孩子们的身体发育，每月调剂大米或小麦若干斤。学校经常喂二三十头猪，三四十只羊，以增加肉食。蔬菜则自己种，烹饪调料也自己解决。边区政府每年发给学生单衣两套，棉衣一套，单、棉鞋各一双，羊毛四两（供自己织毛袜用）。

战时常迁徙，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一块小木板，放在膝盖上，就算个课桌了。没有钢笔，就买来一个钢笔尖，在后面绑上一根木棍，蘸着墨水来写。那墨水呢，就是用延安当时的一种紫色铅笔，一点点削下来，泡上水，制成土墨水，不过一到冬天就冻住，没法用



孩子们坐在摇篮车里

了。上课没有正规课本，教师用锅灰掺水制墨，在马兰草纸上编写教材。算术课用树枝计数，地理课用黏土捏山河模型。为了能给孩子省几张纸，女同志把每月发给的卫生草纸省下来，给孩子们写字画画用。

为了更好教育儿童，洛杉矶托儿所根据年龄、智力、体力不同进行编班。5岁至6岁编为幼稚大班，每班最多16个人。4岁至5岁编为幼稚二班，每班12人。3岁到4岁编为幼儿大班，每班8人。2岁至3岁编为幼儿二班，每班5人。两岁以下的叫婴儿班。教育内容分幼稚教育、生活教育、卫生教育三大类。幼稚大班的课程项目有看图识字、数数目、图画、手工、游戏、跳舞、故事体操、户外活动、自由发表意见、选举模范、卫生检查、卫生习惯训练，等等。（王颖《红摇篮》，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除了午睡及吃饭外，孩子们多半时间在户外活动、上课。天热时可在棚下及树荫下，刮风下雨例外。日光下，在河中洗澡；晚饭后，到河边沙滩活动。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吸收大量新鲜空气和充足的日光，对身体大有好处，体格粗壮。“日光浴喽”——托儿所工作人员吹起哨子，孩子们便各自准备，脱去上衣、裤子、鞋子、袜子，整整齐齐排好队，由阿姨领着来到阳光充足的指定地点。地上铺了厚厚的沙层，在这里日光浴特别舒服。

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保育小学也开荒种菜养猪，孩子们跟着老师种土豆、纺线线，

大孩子每天纺纱一两，能换半个鸡蛋。为了积肥种菜及保持环境卫生，经常要掏挖粪坑，把五六个土坑厕所的大粪送到菜地，由年龄最大的学生和教师共同劳动。（郭青《延安保育小学：革命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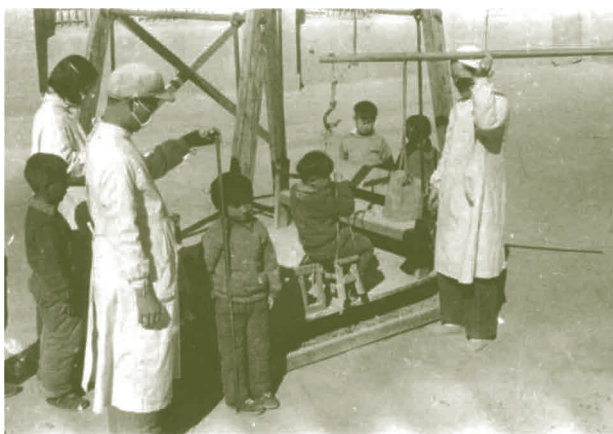
那时，各单位都派了纺线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回忆：“棉线一纺好了，就把它交上去，人家就会折算成钱币，给我们做酬劳。那是我第一次挣到了钱，有了一些边区币。蔡妈妈让我把钱存到边区的合作社里，还跟我开玩笑说：‘小苏云，你现在可是财东了。’因为边区币的面值都很大，一花起来，就是成百上千的。……我们的这些劳动成果，在延安大生产成绩展览时，都送去展览了，包括我做的灯心绒布鞋，岱娜织的手套。”（王凡，东平编《红都童话——我的少年延安往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陕北山高狼多，有时白天也有狼群出没，夜里就更猖狂。为了消除阿姨和孩子们的恐惧心理，增加防狼打狼的知识，洛杉矶托儿所的丑子冈所长编了《打狼歌》，要阿姨们教孩子唱：“老狼老狼不可怕，铜脑袋来铁尾巴，麻秆腿，纸糊腰，见了火光它就跑……”从周围群众得知，狼最怕金属声，她们组织大一点的孩子，每天夜幕降临时，敲打铜锣、铁器，一方面增添孩子们的活动项目，一方面借此吓走狼群。

健康守护战

当年“洛杉矶托儿所”的资料中，有一组训练儿童卫生习惯的题目，很有现实意义，现抄录如下：

- 1.早睡早起，我每天要乖乖睡觉。
- 2.我每天饭前便后一定洗手。
- 3.我要喝开水。
- 4.我常在外面生活，多晒太阳。
- 5.青菜豆腐鸡蛋西红柿都是娃娃好朋友。
- 6.我们不和有病的儿童玩耍。
- 7.打预防针是保护我们有好身体。
- 8.手指甲要常剪，又干净又漂亮。
- 9.东西丢下不能再拾起来吃。
- 10.我爱洗澡。
- 11.早晚把脸洗干净。



给孩子检查体格（量身高、称体重）

12.我们大便小便到厕所去。

13.牙齿像剪刀，不擦要生锈。

14.大小便告诉阿姨。

15.用我的手巾擦鼻涕。

16.冷了加衣服热了脱衣服。

17.我坐立行身体要正直。(王颖《洛杉矶托儿所》，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有的教唱这样的儿歌：

一、早起早睡身体好，洗脸刷牙最重要。坐要正来头要直，天天邀我上早操。

二、多吃青菜和水果，身体强健多快乐。每天吃饭按时间，细细嚼来慢慢咽。

三、饭前便后要洗手，指甲剪得光溜溜。少吃零食不生病，不喝冷水讲卫生。

四、常换衣服常洗澡，虫子疥疮生不了。种痘打针不怕痛，可以预防传染病。

1945年，为解决参加对日总反攻干部的幼儿照看问题，中央决定在延安再建立一所保育院，“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院”即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

6月开始接受第一批孩子，第二保育院就蔓延开了麻疹、齿龈炎、角膜炎、鼻膜炎、口角炎、肛门炎等许多种疾病。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麻疹被打退了，但其他疾病总是复发，尤其是齿龈炎蔓延得更厉害，使孩子吃不好饭，严重地影响健康，时间长了甚至威胁生命。

院方派人去第一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学习，了解齿龈炎的病因及预防治疗方法。有人说缺少维他命（维生素）会得这种病，于是保育院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千方百计买来青菜，给孩子吃了两三个月，但齿龈炎仍不断蔓延。

后来医生又提出，这是口腔卫生不好引起的，要用棉棒蘸药水擦洗齿龈和口腔。100多个孩子，每天一个个用棉棒擦洗，既费时间又费人力，一段时间以后，齿龈炎仍不见消除。院领导问几位有小孩的女干部：“你们的来保育院以前在家得过这种病吗？”妈妈们回答：“没得过。”

大家集思广益认为：要堵死一切传染渠道，孩子的饮食用具每次用后，必须煮沸消毒。于是，山上支起了两口大行军锅，一口用来消毒食具，一口用来消毒用具，孩子的饭碗、水杯、勺子、毛巾等，用一次就煮一次，

两口大锅里整天开水沸腾。此外，又发动群众堵塞了其它一切可能传染的途径。经过积极治疗和保育员的精心护理，经过两三个月的时间，不仅齿龈炎消灭了，其他疾病的发病率也显著下降了。

这两口大锅，在攻克难关中立了大功。从此，保育院正式建立了消毒制度，并在以后的行军、驻军中，对杜绝传染病蔓延起了很大作用。从营养、隔离、消毒、阳光、新鲜空气、治疗、个人卫生、卫生教育等方面，摸索制定了一系列卫生保健制度，如消毒制度、隔离制度、孩子一日生活制度等。（北京市六一幼儿院院史编写小组编《战火中的延安第二保育院》）

马背上的行军

1946年冬，为防备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延安保小”与“抗小”合并，随后勤机关疏散撤离。当地百姓准备孩子们出发的工具和其它物资，“一头牲口两个筐，一边一个娃”，有的牲口大，背上还要再坐一个孩子。

“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20多头牲口编成一个队，驮着这批孩子从延安走到绥德，开始了颠沛坎坷的转移之旅。从吴堡过黄河，经山西前往河北，近三年后，最终迁入北平。翻山涉水，辗转三千里，无一人掉队，也无人伤亡。

第二保育院接到转移命令。康克清大姐叮嘱：“你们必须撤离延安。你们离开延安，中央就发电报，沿途党政军都会帮助你们，你们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打电报告中央说清楚是否全院孩子一个不少都安全到达目的地。”第一批136名幼儿装进柳条筐（有的称驮床、架窝子），由骡马驮运穿越封锁线。

出发前，院方组织了紧急动员会，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做了100多条预案，如睡在马上有窒息危险怎么办，遇到敌机轰炸怎么办，缺乏卫生消毒条件怎么办……行军途中，每个工作人员都有自己明确固定的责任，医务人员要千方百计治好孩子的病；炊事员要让孩子喝够水、吃饱饭，保证足够的营养；保育员要对指定的三四个孩子的健康和安全负责。陕北高原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有时马匹受惊狂奔，有

时敌机轰炸扫射，同志们都用自己的生命保护这些小人儿。几个月后，这批孩子安全抵达太行解放区，不但没有病弱消瘦，反而一个个胖乎乎，红光满面。（《战火中的延安第二保育院》）

洛杉矶托儿所的40多名工作人员，担负起90多个孩子的转移任务。转移途中，经常遭到袭击骚扰，大人少、孩子多，缺乏交通工具，又常在夜间行动，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开启了一场艰苦的“娃娃长征”。从陕西延安，经山西到河北，途经三省十八个县，历时一年零四个月，辗转跋涉千余公里，安全到达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郭静，周清香主编《洛杉矶托儿所——延安纪事》，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5年版）渡黄河时，三五八旅在每条船上都派一个班战士护送，手持盒子枪站在船中。撑舵的老艄公沉稳地把着舵，众多划桨的青年船工高喊着号子。（《特殊年代：特别的孩子和阿姨——回眸延安中央托儿所》）

1948年开展的“送孩子找父母”行动中，第二保育院历时11个月，行程三千里，将37名东北干部子女护送到哈尔滨。途中孩子们学会识别信号，“举红旗躲进高粱地，举绿旗继续前进”。屡经海陆换乘，无一人掉队或伤亡，最终将孩子平安送抵，陆续被他们的父母接走团聚，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

（姚淑平《马背摇篮：忆战火中的延安第二保育院》，中国妇女出版社1995年版）

据统计，全面抗战期间，延安第一保育院、第二保育院和洛杉矶托儿所，共收托婴幼儿近3000名。（中央档案馆编《摇篮里的中国梦——毛泽东关怀下的延安保育院》）延安时期的儿童保育工作，创造了一个战时奇迹：1937—1949年间，保育机构收容的5000多名儿童茁壮成长，伤害夭折个例鲜少发生，实现了极高比例的抚育存活率，远超同时期平均水平。

这些保育机构，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儿童保育、学前教育事业的摇篮：积累的“保教合一”经验，直接影响了《幼儿园暂行规程》的制订；实施的分餐制、晨检制等仍在沿用；培养的保育干部，成为各地托幼机构的骨干。许多在保育院长大的孩子，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栋梁之材。📖



眨眼就到了耳顺之年，真切体会到了身——边事转眼就忘，久远之前的记忆却想起来犹在眼前——譬如童年。我出生于1965年，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清晰的就是从1972年开始读的那几年，虽然乏善可陈，仍难以忘怀。

20年前，我曾编过一本《童年》，编选收入了30多位近现代作家与学者关于童年所受教育的回忆。该书的编选缘于当时一位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邀约——

像是叩响了久闭的门扉，童年的印象如一幅幅褪色的画面在眼前变幻，那些重叠的画面大多单调寂寞，值得留恋或说难以忘怀的是童年的冬天仿佛总是大雪漫天飞舞，趴在窗台上仰着脸看屋檐上透明的冰凌在阳光下一滴一滴地融化……

而恰巧当时，我正记录着刚满6周岁的女儿的成长日记，编一本“他们”的童年记忆，也是为了给即将开始读小学的女儿的礼物——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那些远去的“他们”的童年风景。

童年如梦，每代人的童年梦境有着不同的内容。从“他们”的童年里，我看到了岁月的河流尽管一去不返，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是永远不老的。就像冰心老人所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近代文人的童年印象

文 | 薛 原（文史学者）

由旧式私塾到新式学堂

现在再回望，这些近现代文人回忆的童年印象，仍值得我们再三阅读，尤其是他们开始读小学时的记忆，可以说影响了他们的一生。例如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说，他童年在家乡时正是废八股诗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而读小说给了他很大的收获，就是帮助他把文字弄通顺了。这里的“小说阅读”，除了《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经典小说，还包括弹词、传奇和笔记小说，例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粉妆楼》《夜谭随笔》《秋灯录》等。尽管等到他完成了在“家乡的九年教育”离开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是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他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不少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多年后很有用处。

在家乡的这九年（1895—1904），胡适说，真正学到的就是读书和写字这两件事；在读书看书之外，还给了他如何做人的训练。而在这一点上，他的恩师就是他的母亲。胡适写道：“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

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1933年，胡适出版《四十自述》，也是在那个时期，沈从文也撰写了《从文自传》，回忆自己的童年成长。与胡适深受母亲的影响不同，沈从文回忆强调的是：“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在读一本大书”：“6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如一般风气，凡是老塾师在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故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运。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枯燥文句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我间或逃学，且一再说谎，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

胡适和沈从文的童年回忆，都描述了由旧式私塾到新式学堂的时代变化，和他们各自受的影响。沈从文说，他离开私塾转入新式小学时，学到的并非课堂上的书本知识，而是学校以外的。20多年后的他，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若溯源应当就是童年在私塾中逃学的经历。但正是当时的这份经历，让沈从

文读到了另一本大书：

从我家中到那个新的学塾里去时，路上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可看到一个伞铺，大门敞开，做伞时十几个学徒一起工作，尽人欣赏。又有个剃头铺，任何时节总有人手托一个小小木盘，呆呆的在那里尽剃头师傅刮脸。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强壮多力的苗人，蹲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

沈从文说，他就喜欢看这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不过，他虽然对学校里的课本不感兴趣，从不用心念书，许多书总是临时读十遍八遍，背诵时节却琅琅上口，一字不遗。

新派作风和人格品质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胡适和沈从文的童年记忆，给那个时期的儿童教育状况做了历史的佐证。再如郁达夫，也给那个时代的启蒙教育留下了历史的见证——他在《儿时的回忆》里说，最初去书塾念书的年龄大约在七八岁，有一年冬天临近年底的深夜，他已经蒙眬想睡了，忽而门外来了一位提着灯笼的老先生，说是来替他“开笔”的。他跟着老先生上了香，对着孔夫子的神位行了三跪九叩之礼；立起来就在香案前面的一张桌子上写了一张“上大人”的红字，念了



老照片里的私塾学童

四句“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开春后他就夹着绿布书包，拖着红丝小辫摇摆着身体，成了“英文读本里的小学生的样子”。

郁达夫说，经过了30多年的岁月，把当时在书塾里的苦痛，一层层地摩擦干净，再回想起来当年在书塾里的生活，“实在是快活得紧。因为要早晨坐起一直坐到晚的缘故，可以助消化，健身体的运动，自然只有身体的死劲摇摆与放大喉咙的高叫了”。这段描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鲁迅回忆童年读书生活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情景。由书塾到学堂，郁达夫说对他自己犹如“从天上飞到地上”，因为在全校的学生当中，他的身体和年龄都是最小的一个。当时，学堂已是新生事物，郁达夫写道：

当时的学堂，是一般人的崇拜和惊异的目标。将书院的旧考棚撤去了几排，一间像鸟笼似的中国式洋房造成功的时候，甚至离城有五六十里路远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走进城来挤着看新鲜。在校舍改造成成功的半年之中，洋学堂的三个字，成了茶店酒馆，乡村城市里的谈话中心；而穿着奇形怪状的黑斜纹布制服的学堂学生，似乎都是万能的张天师，人家也在侧目而视，自家也在暗鸣得意。

而且，这样一所唯一的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堂长，也就是校长，更是县城里的一位大人物：进进出出，用的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也总少不了他。

当时的小学校长和主任教师们，也以他们的新派作风和人格品质影响了学生的未来。例如梁实秋在《我的小学》里回忆，在北京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念书时，三十多岁的周先生对他有深远的影响：

周先生是我真正的启蒙业师。他教我们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他的教学方法非常认真负责。在史地方面于课本之外好编补充教材，每次上课之前密密匝匝地写满了两块大黑板，要我们抄写，月终呈缴核阅。例如历史一科，鸿门之宴、垓下之围、淝水之战、安史之乱、黄袍加身、明末三案，诸如此类的史料都有比较详细的补充。材料很平常，可是他肯费心讲授，而且不占用上课时间去写黑板报。对于习字一项，他特别注

意……我们每人都备有一本草书千字文拓本，与楷书对照。我从此学得初步的草书写法，其中一部分终身未曾忘记。

而且，周老师还担负起训育的责任，那时叫做“修身”课。他记得周老师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不一一加以指导。

小学教育受益终生

在《忆小学乡土教育》里，费孝通回忆了读小学时校长对自己成长与未来专业选择的影响。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于1916年至1920年在江苏吴江初等小学念书。大概在小学四年级时，有一门课就是“乡土志”，也是他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一门课。

“乡土志”授课者即是校长，费孝通喜欢听，因为校长在课堂上讲的都是他们熟悉的家乡地方风物，例如经常去玩的垂虹桥和鲈香亭的故事。一直到晚年，每每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桥亭的画面仍悠然在目，使他心旷神怡……

焦菊隐在《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里，也回忆了从私塾到公立小学的童年成长经历，而且对比了给自己不同的印象与影响。焦菊隐说，父亲最初把他送到附近一个有钱人家的家馆里寄读，老师是个新派的冬烘先生。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但老师还是瞧不起他，因为焦家穷。即便富家子弟欺辱了他，老师依然放纵优待，反而狠狠地责骂他。因此他回到家后哭着喊着，说再也不上这个家馆。焦父没有办法，只好叫他停学，并托人把他送进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上学。在这里，焦菊隐遇到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小学校长。

这位校长是前清举人，当时属于教育救国论的新派人物——

校长对教员和学生都是十分和蔼的。上课时，他的神色很严肃，一到下课，他就混在欢蹦乱跳、又打又闹、吵成一片的小学生中间，和这个说说，和那个笑笑。学生们都喜欢他，和他很亲近。因此每个学生情况，包括家庭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全校几百个学生，他没有一个叫不出名字的，也

没有一个说不出家长的姓名和职业的。一到中午和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就站在学校铁栅栏门口，等着列好队的学生出来，最小的班次在前，立定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个一个地叫着学生的名字，把孩子交到来接的家长手里。大班的学生，他也一定看着个个都过了街道，他才进去。一年四季，每星期六天，天天如此。

焦菊隐读小学和临近毕业时，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及五四运动前夕，当时的小学老师和每个学生也都受了这种新思想的影响。

当然，那时私塾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也并非都是负面，例如，金克木晚年回忆：小时候，塾师陈夫子给了两个自己选抄的厚本子，叫他自抄自读，作为背诵经书以外的功课。一本是《九家七言近体录》，选七言律诗，从杜甫、李商隐到吴伟业、黄景仁；另一本是对联，大体分类排次序，从祝寿、哀挽到殿堂、寺庙，附有一些带诙谐性的非正规的作品。例如骂袁世凯当民国总统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老师告诉他，像这样的联句盛于清朝，清人里有两大家，前是纪晓岚纪昀，后是俞曲园俞樾，都是大学者。这两位对联，在本子里选抄了很多。

陈从周在《岁暮忆旧》里回忆说，他生长在江南的一个中等人家，从小在私塾里念书，每临近新年就要背完“年书”，即一年中所读的最后要全部背出来，才可以放学，向孔夫子像和老师拜别。后来他进了新式小学，但老师对所学的还是不肯轻易放，要严格地考查，放假时恭恭敬敬地告别老师。虽然放几天假，仍有假期作业，最显著的就是习字作业，每天在家里还要练字。

实行男女同校

杨绛读小学，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那一年，那时的小学里已经能招女生。她先是在北京女师大附属小学上学，后来跟着家人迁居无锡，就在离家不远的大王庙小学上学。

《大王庙》一文写道：

那时学校为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创出一种新服装。当时成年的女学生梳

头，穿黑裙子；小女孩子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按这种新兴的服装，十二三到十五六岁的女学生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我记得我们在大操场上“朝会”的时候，老师曾两次叫我姐姐的朋友（我崇拜的美人）穿了这种短裙子，登上训话台当众示范。以后，我姐姐就穿短裙子了，辫梢上还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

虽然只待了不过半学期，却给她留下了生动深刻的印象。原先的庙改成一间大课堂，“有双人课桌四五直行”。初级小学四个班都在这一间大课堂里，男女学生大约八十人左右。杨绛本来读三年级，在这里就插班入最高班。她写道：

大王庙的教职员只有校长和一位老师。校长很温和，冻红的鼻尖上老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是孙先生，剃一个光葫芦瓢似的头，学生背后称他“孙光头”。他拿着一根藤教鞭，动不动打学生，最爱打脑袋。个个学生都挨打，不过他从不打我……校长不打学生，只有一次他动怒又动了手，不过挨打的学生是他的亲儿子。这孩子没有用功作业，校长气得当众掀开儿子的开裆裤，使劲儿打屁股。儿子号啕大哭，做爸爸的越打越气越发狠痛打，后来是“孙光头”跑来劝止了。……在大王庙读什么书，我全忘了，只记得国文教科书上有一课是“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孙光头”把“子曰”解作“儿子说”。

杨绛说，有时候，她会感到自己仿佛还在大王庙里。

季羨林读小学的时间和杨绛差不多。《回忆新育小学》一文里说，1920年他9岁，同一位长他两岁的亲戚一起来济南新育小学报名，面试时他认识了一个“骡”字，就被定在高小一班。他的亲戚不认识，便定在初小三班，少他一年。一字之差，他提前了一年。在季羨林记忆里，那时候新育小学已经实行男女同校，还有缠着小脚去上学的女生，大家也不以为怪。大约在他读高小二年级时，学校里忽然来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师，教美术和音乐，除了新来时引起一阵街谈巷议之外，不久也就习以为常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班主任李老師——大概四十多岁，为人诚恳忠厚，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让人感到亲切。季羨林说，李老師是他一生

最难忘的老師之一。

对比这些作家学者们的童年回忆，会发现一个共同现象：不喜欢小学里的正课，而喜欢读课外闲书。就像季羨林所说：

上课时，不是玩小动作，就是不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脑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常常走神儿，斜眼看到教室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春天繁花似锦，夏天绿柳成荫，秋天风卷落叶，冬天白雪皑皑。旧日有一首诗：“春天不是读书日，夏日迟迟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可以为我写照。

季羨林说，那时候在他们家里，小说被称为“闲书”，是绝对禁止看的。但他却酷爱读“闲书”，例如《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七侠五义》《小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封神演义》，等等。可是他不但在家里偷偷看，还带到学校去，偷空就看上一段。这一类书他看的数量很大，光是一部《彭公案》就看了四十多遍。当时虽然已经历了五四运动和现代白话文新文学的兴起，但他们在小学里作文还是都用文言——语言障碍当时是有的，最困难的是不知道怎样起头。老师出的作文题写在黑板上，他立即在作文簿写上“人生于世”四个字，下面就穷了词，仿佛永远要“生”下去似的。以后憋好久，才能憋出一篇文章。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以后自己竟然一辈子舞文弄墨。

有一次作文，季羨林不知从什么书里抄写了一段话：“空气受热而上升，他处空气来补其缺，遂流动而成风。”结果受到了老师的赞扬。

“可我一想来，心里就不是滋味，愧悔有加。在今天，这也可能算是文坛的腐败现象吧。可我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不知道什么叫文坛，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完全为了好玩儿。但自己也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才愧悔，从那以后，一生再没有剽窃过别人的文字。”

还有许多闪光的名字……经历20世纪新旧时代大转折的兴衰变迁，在他们各自的生命源头，不同的童年印象斑驳陆离。过去的时光已经老去，后来人读到他们或美好安然，或贫困窘迫的回忆，人生滋味涌上心头。其实，无论怎样的人生命运，忆起童年总是清朗悠长。不同时代不同人的童年回忆，都镌刻着永恒——这便是童真。📖

名人的家庭教育

文 | 张守涛（文史学者）



梁启超与儿女们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开始了对“人”的重新发现。传统“训蒙”幼教，以规训服从为纲，近代有识之士则将儿童视为平等、自由的生命，摒弃“父为子纲”的旧伦理，倡导尊重天性、激发心智的教育方式。梁启超呼号“少年强则国强”，鲁迅沉思“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陈寅恪以“常怀一颗平常心”训育后代……这些思想巨擘的育儿实践，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个闪亮的微观切片。

梁启超的言传身教

提及近代史上的育儿佼佼者，首屈一指的是“最牛老爸”梁启超，他的子女“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成功秘诀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梁启超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梁启超自身便是“牛人”，从戊戌变法起，引领时代风骚四十年，在政治、文化、学术等方面都成就杰出，自然为子女树立了榜样。梁启超也非常注重对子女以身作则，经常在家书中讲述自己是怎么做的。如：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是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压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碍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

对此，儿子梁思礼曾回忆说：“父亲对我的教诲虽不甚多，但我的兄长和姐姐们却深受其言传身教的熏陶。”

其次，虽然工作忙碌，经常在外漂泊，但梁启超对九个子女都充满了疼爱。他也毫不掩饰对孩子的爱，在家书中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

烈。”他对每个孩子都有昵称，如“大宝贝”“小宝贝”“不甚宝贝”“老白鼻”“小白鼻”……他总是抽出时间给孩子写信、写打油诗、寄东西，包括寄压岁钱让孩子买糖吃，给孩子买“许多灯”。在信中，梁启超像朋友一样同儿女谈生活、谈人生、谈时事，循循善诱提出各种建议，不仅关心生活学业，更关心他们的人格培养，也经常教导年长的兄姊关心弟弟妹妹。

尤其是，梁启超对子女因材施教，根据他们各自特点培养，“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但又不强求他们一定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办，而是反复地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如女儿梁思庄性格内倾，梁启超就注重引导她多认识些朋友。

另外，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松紧有道。一方面，他对儿女的学业并不苛责，写信给孩子道：“你们兄妹四人勤奋进取，我对于你们的学业始终抱以宽容，毕竟课业繁重，有时甚至导致身体不适，这让我心中颇为忧虑。”另一方面，对儿女的人格则严格要求，如家书中所言：“尽管爹爹对你们怀有深沉的爱意，他却始终未曾纵容溺爱，总是期盼你们在困苦与危险中锤炼出坚强的人格。”梁思永幼时曾与一位同伴扭打，梁启超严厉批评，还让梁思永思考三个问题：“有必要打架吗？如何与对方重归于好？如何处理此类事件？”回答满意之后，梁启超方准许梁思永吃饭，然后亲自陪同，向那同伴道歉。

总体上，正是梁启超的以身作则、关爱培养、因材施教、松紧有道，让其子女都有所成，后代的婚姻家庭，也都幸福美满。

鲁迅怎样做父亲

我们今天如何做好父母，如何教育儿

童？鲁迅先生的话，依旧很有参考价值。1919年11月1日，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专门发表了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在此文章中，鲁迅首先指出了父亲的职责在于“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接着，他具体谈了“现在该怎样做父亲”，包括三个方面，“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些话充分体现了现代的儿童教育理念，即把儿童也视为平等的人予以尊重，但同时要尽力教育、培养。

鲁迅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老来得子，而且是唯一的孩子，鲁迅自然对周海婴非常疼爱：尽其所能满足孩子的愿望，买最新的玩具、看最新的电影、看马戏表演，放下手头工作陪海婴玩骑大马的游戏，有时还叫他“小乖姑”，用胡须刺他的双颊……周海婴后来回忆道：“凡是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电影，父亲总是陪我去观看，像《泰山之子》《米老鼠》《仲夏夜之梦》都是我那时钟爱的影片。”

逛玩具店代替了平时的逛书店，鲁迅给周海婴买过万花筒、木匠工具、儿童三轮脚踏车等新潮玩具。瞿秋白也曾送过周海婴一套当年的“变形金刚”积铁玩具，可以用金属零件组成各种形状。这些玩具，能拆的都被周海婴拆过，培养了动手能力和对技术的热爱，让他后来成了无线电专家。

夏天，周海婴起了痱子，鲁迅就亲自给他涂痱子药水，许广平在一边摇扇子，周海婴后来称：“这是我感到最快活的时刻”。周海婴小时候有哮喘病经常咳嗽，学医的鲁迅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总是第一个听到咳嗽声过去照料孩子，有时一陪就是一夜。当时有人笑话对论敌冷酷的鲁迅对孩子却这般宠爱，鲁迅特意写了一首诗回击：“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每当有朋友来访，鲁迅经常将周海婴抱出来秀秀炫耀，也经常在致朋友的信里提及周海婴。要是鲁迅活在今天，或许他也天天发朋友圈“晒娃”。为了哄海婴睡觉，鲁迅还特地编了一首歌谣：“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小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

红，小象，小红红……”每天晚上睡觉前，周海婴都会和鲁迅道别：“爸爸，明朝会！”“明朝会”就是明早见的意思，鲁迅则回道“明朝会”，哪怕是病重临终前，也是用尽力气来回应。早晨海婴上学时，总要先到父亲的卧室里，在烟嘴里插上一支香烟，这样等鲁迅睡醒之后伸手就能拿到。

疼爱孩子之外，鲁迅对周海婴也非常尊重、理解，如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言，“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有一次，鲁迅请客，菜品一道鱼丸，周海婴嚷嚷不新鲜。其他人都以为小孩子胡说，鲁迅却尝了尝海婴盘子里的鱼丸，发现果然变味，于是说：“孩子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有朋友送了两套丛书，许广平先给海婴看比较浅显易懂的《儿童文库》，不久他就看腻了，非要看《少年文库》，许广平让他长大些再看；鲁迅则让许广平拿出《少年文库》，随海婴翻看。鲁迅给朋友写信时，海婴承担起重要任务，即挑选信纸，如果不合适，鲁迅就和周海婴商量“是不是再换一张”，直到两个人达成一致。若达不成一致，鲁迅总是叹一声让步。这些小事，充分说明鲁迅对“小朋友”的尊重爱护，如周海婴回忆说：“父母对我的启蒙教育是顺



鲁迅抱着周海婴

其自然，从不强迫，不硬逼。”

“理解”之外，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道，“第二，便是指导……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即做父亲的不应该命令孩子而是指导孩子。鲁迅经常讲故事来培养海婴的想象力，如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对于各种奇怪甚至幼稚的问题，鲁迅也总是予以耐心回答，如有一次周海婴问：“爸爸，可以吃吗？”鲁迅回道：“按理说是可以的，但爸爸只有一个，吃了就没了，所以还是不要吃的好。”海婴顽皮时，鲁迅偶尔也会揍他，但不是真打，只是吓唬而已，如鲁迅给母亲的信中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解放”孩子，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所写：“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鲁迅自己是大文豪，但他从没有要求孩子一定要从文，反而在遗言中嘱咐“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自食其力就好，不要华而不实。后来，周海婴也没有从事文学，而成了无线电专家和摄影家。

陈寅恪的家教

陈寅恪与妻子唐筼结婚近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女儿。恰巧当时陈寅恪获得一枚刻文为“福建台湾巡抚关防”的官印，便给女儿起名为“陈流求”，“流求”是台湾的故称。一年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陈寅恪为之起名为“陈小彭”，“小彭”即隐喻澎湖列岛，起这样的名字，是希望孩子不要忘记被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列岛。

六年后，他们又有了第三个女儿，家翁陈三立为之起名“美延”，取自《荀子》中的“美意延年”，陈寅恪对女儿解释，“你在生活里要积极乐观，与人为善，便可幸福快乐，延年益寿了”。唐筼后来则把自己的号“稚筼”送给了离家求学的陈美延，“我把号给了你，就当我随时都与你在一起”。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后来在著作《也同欢乐也同愁》中写道：“我们三姐妹流求、小彭、美延的名字看似简单，但随着年龄

和阅历的增长，我们才逐渐了解到父母和祖父在给我们起名字上的良苦用心。”的确，名字是父母给孩子的第一件重要礼物，陈家三姐妹的名字，便反映了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关爱。

唐筼自己制作字块，教孩子识字，做跳舞鞋让孩子跳舞。陈寅恪有空也教孩子背诵古诗，带她们散步、买零食。她们后来回忆道：

“……流求和小彭现在都能清晰背出好多句子，如最初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到后来的《长恨歌》《琵琶行》，这些诗句表达的意思，我们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加深理解，也更明白父亲的用心。”

对孩子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陈寅恪夫妇在家从不打麻将，从不吸烟，从不大声喧哗，从不用不文明词语说话……唐筼精心布置庭院，培植很多花卉，乃至女儿陈小彭从小养成对植物的兴趣，后来成了生物学家。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回忆：“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深深感受到全家对祖父的孝顺与尊敬。我们和父母平日都住在西郊清华园的家，每逢周末及寒暑假，便乘清华校车进城与祖父团聚。”陈寅恪还曾让唐筼带年仅四岁多的陈流求乘火车去接祖父陈三立，“母亲带个不懂事的小孩上路，显然增添了不少麻烦，后来我们才明白是想让孩子见见世面、长长知识”。

虽然经常四处漂泊，陈寅恪夫妻尽量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条件，即使抗战时也不让孩子辍学。在西南联大教课期间，陈寅恪非常思念远在香港的孩子，有一次在集市上看到一个苗族妇女，背着个很像陈美延的孩子，于是就盯着那孩子看，使得那妇女误会有不良企图，便很快离开了。但陈寅恪对孩子也有严厉的一面，如要求她们从小看报关心时事，要求学好数学、培养严谨思维。陈流求有一次期末考试考了第一名，兴高采烈地回家，但陈寅恪看到成绩单后却说：“你是不是比班上不少同学年龄大一点，自然应该考得好些，有什么值得骄傲呢。”

“在家里，爹爹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们要孝敬长辈、关爱同辈，生活上做到独立自强……我爹爹对家庭非常负责，对上孝顺父母，尊重兄嫂，对下又非常关心我们，尽可能给我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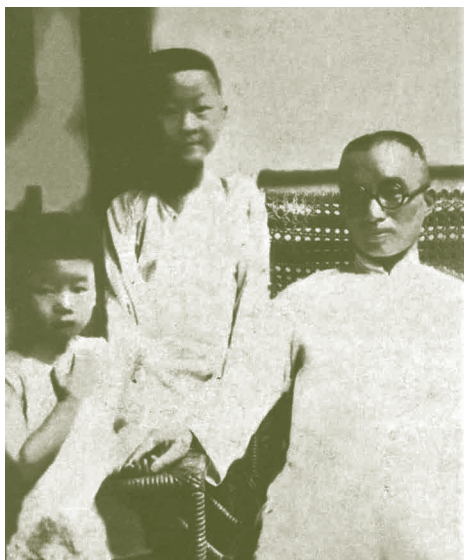
境。”“常怀一颗平常心，处事低调淡定”，是陈寅恪给陈流求最为深刻的印象。

陈氏姐妹写道：“我们三姐妹有幸在这样温暖的家庭中健康成长，感到无比幸福；正是这样的家庭，才能带给我们如此值得回忆与纪念的岁月。”

朱自清的转变

提起朱自清，人们会想到他的散文名篇《背影》，为其中的父子温情感动。实际上，当时朱自清与父亲朱鸿钧的关系矛盾纠结，因新旧观念冲突几乎已经失和。不过，因为这篇《背影》，父子两人最终互谅和解。而朱自清也因循一些传统习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与自己子女的关系也曾拧巴，但最终通过自己的反思、成长得以转变。

朱自清19岁时就结了婚，21岁有了第一个孩子阿九，23岁又有了女儿阿菜。那时的朱自清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鞴、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于是在阿九哭闹时，朱自清“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女儿阿菜周岁时不太会走路，朱自清竟然将女儿逼在墙



朱自清（右）与长女“阿菜”朱采芷（左）、长子“阿九”朱迈先

角里紧紧按着，害得女儿大哭，还因此生了好几天病。

后来，朱自清又陆续有了几个孩子。虽然孩子的哭闹会让朱自清觉得很烦，甚至有时会叱责和打孩子，但他也开始渐渐地学会了做父亲，“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为此，朱自清专门写了篇文章《儿女》，对自己的养儿育女进行深刻反思，认为自己是“不成材的父亲”，“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

在这篇文章最后，朱自清写道：

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

自此，朱自清和子女的关系得以转变，对孩子有了更多关爱、耐心。他经常在日记中挂念孩子的病情，如：“两个孩子都病倒了。乔发烧已两个星期，思亦数日。妻身体也不佳，像是又被急病了。真为他们焦虑。”朱自清也更多地尊重孩子，据幼子朱思俞回忆，父亲曾教他刻图章，有时随便刻的，父亲却赞赏“这个有点意思”。但同时，朱自清对子女也要求严格，从日本人扔的破烂堆里捡回一张桌子，或在清华校园里玩用于建设的沙子，都会被朱自清斥责，要求他们还回去。

更重要的是，朱自清以身作则、自身清正。抗战胜利后，他身患疾病，穷困潦倒，但绝不占公家便宜。在子女眼中，父亲是“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的人，是他们一生的人格榜样。也因此，朱自清的子女后来大多生活得恬静、淡雅。

朱自清和父亲、子女的故事，可说是“转型时代”儿童教育的一个典型样本。作为“新青年”，他和持旧观念的父亲激烈冲突过，也曾用粗蛮的方式对待子女；庆幸的是，通过自身的反思转变，穿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迷障，朱自清学会了“怎样做父亲”。正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儿童教育的进步，也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



陈鹤琴与孩子们在一起

中国幼儿教育先驱者陈鹤琴

文 | 克 念（文史学者）

1956年，当了四年小学教师的谈凤梁考入南京师范学院，9月1日清晨，学校宣布晚上举行开学典礼，地点在大草坪。谈凤梁很惊愕：连小学开会也得让大家端坐在房子里，讲究一点气氛，这是怎么回事？晚上典礼开始，他看到一位白发苍苍、中等个头、满脸红光的长者走上台阶发表讲话：“今天最高气温三十七度，太热了，学校没有大礼堂，所以开学典礼在大草坪举行。我们因时、因地制宜，各位新同学感到奇怪吗？”

谈凤梁问了身边高年级同学，才知道讲话者就是南师的院长陈鹤琴。陈院长是知名的教育家，也是中国幼儿教育的启蒙人物，被称作“四圣”之一。谈凤梁还知道，陈院长提倡一种叫“活教育”的思想方法，但具体是什么，在当时没人提及。后来，校园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徜徉在其间的谈凤梁已是校长。当他回忆起三十年前那场晚间草坪上举行的开学典礼，突然明白了，这就是“活教育”，不受形势、局面的限制，以幼儿、少年、学生的利益为第一先导，边做边学，即知即行。典礼固然要求庄严而有威仪，但高温酷暑下，学生健康是第一要素，所以在较凉爽的晚间草坪举行，因时而利，因地制宜。

陈鹤琴去世后，谈凤梁真挚缅怀道：“在

我这个不忘小学教师的生活、愿意为大学生效劳的普通教师心目中的偶像，恰恰是身在大学，潜心研究幼儿教育、家庭教育的陈鹤琴院长。”暗室昏昧，一灯即明，薪火相传，幼儿教育延伸出的“活教育”模式和价值观，终究有序传承，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可贵经验，并被越来越多的后人关注、研究、探索。

凄苦的童年

清光绪十八年（1892），陈鹤琴生于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今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一个小商户家庭。小镇不算大，地理位置却十分优越，西通杭州，东达宁波，距绍兴和余姚都不过百里，交通便利，过往客商集中，成了做生意的好地方。

陈鹤琴的祖父四十几岁才生了儿子，但个性严厉，从不对这个独子假以辞色，儿子稍有差错，就拿压布的方铁向他砸去。其老友看到此情景，大吃一惊，质问道：“你只有一个儿子，不能这样打他的！”祖父余怒未消，发狠道：“要从小教起，恶习惯，不可养成！”

这个独子当然就是陈鹤琴的父亲。他共有五子一女，陈鹤琴是最小的一个。陈父之严酷，令陈鹤琴在近五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是不寒

而栗：“父亲是很严的。他睡在楼下书房里。我进出总是走后门的。他吃饭总是一个人吃的，我们小孩子另外在厨房里一起吃。父亲死时我才六岁，在这六年中我没有同他吃过一餐饭。我们是不敢同他亲近的。我们在厨房也一点不敢作声。若是兄弟间稍会有点冲突，只要母亲说声‘我要喊了！’我们立刻鸦雀无声了。所以我们兄弟很少有口角的，打架那是从来没有的。”

陈父这种不近人情，一方面可能源自童年阴影，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鸦片上瘾的缘故。他还将水果和零食都藏起来，只能自己吃，不许儿女们碰一下。若发现哪个儿子偷吃，必然半夜里将人从床上揪起来，用一捆绑紧的竹梢一顿饱打。

父亲死后，家里的商铺由大哥接手，大嫂成了内当家。某天中午开饭，大哥还没回来，大嫂先把饭菜端了出来。年幼的陈鹤琴不懂事，像平日里一样，看见桌上有碗火腿蒸咸鸭蛋，就伸过筷子拣了一点。不料大嫂伸出筷子，把他夹在筷子上的一点火腿末拨回碗里，厉声说道：“这是大哥吃的，我们吃了，大哥回来要吵的！”陈鹤琴听了，强忍着眼泪把饭碗里的饭吃掉，回到楼上，倒在床上大哭了一场。他上一次号啕大哭，是在父亲死的时候。

大哥之所以不理家里生意而天天往外跑，是因为沾染了赌博恶习，没几年，就败掉了原本已被抽鸦片的父亲消耗得所剩无几的家产。店面盘给别人，这一大家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有天清晨大雪纷飞，母亲对缩在床上的孩子们说：“被窝里很温暖，起来太冷了，还是睡吧，我们又可以省一餐早饭呢。”这是陈家五代人在百官镇立下门户后第一次挨饿。

陈鹤琴回忆道：“挨了饿，才知道饿是怎样一回事，使我们以后对于挨饿的人，格外容易表同情，所以偶然挨挨饿，也是于一个人的同情心有很大的益处的。”他还发自肺腑地说过：

亲爱的小孩子，我们中国有句俗语：棒头底下出孝子。这句话，我的祖父是深深相信的，我的父亲也是深深相信的。我因为小时受了这种严厉的教训，起了反应，所以我用慈爱的方法来教你们了。

这或许是陈鹤琴性格中最可贵的地方。任何逆境，包括父兄的不负责任和苛刻以待，未

曾激发他的恶性，而是促使他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施行善行。这也值得那些戾气满身而将其归咎于所谓“原生家庭”的后人反复自省。

清华园的天使

虽然祖父、父兄带来极大的心理伤害和事实困境，但仍有一些向上的精神，引领和激发陈鹤琴向善的力量。从家庭破产后的八年间，母亲靠给人洗衣服来养活全家。那时，洗衣服能挣到的钱很少：袜子一双五文，短衫一件十文，长衫一件二十文。一天可洗三十件，收入不过三百文。母亲先在家里用皂荚抹衣服，一把一把搓过，七八岁大的陈鹤琴把衣服挑到离家约二百米的池塘边，放在石板上用脚踏，母亲再用池水洗净。陈鹤琴个子不高，但身体结实，能负起三十斤重的担子，把洗好的衣服挑回家去。

也差不多这个时候，陈鹤琴进了私塾读书。对于教育家来说，自身有两个经历极为重要，即家庭和学校。家庭能使人明白爱和团结的意义，这是教育的基础；学校能使人明白教和学习的方法，这是教育的手段。家庭并没有给陈鹤琴带来太多爱，私塾也没什么收获，从七岁开始，六七年时间，先生只教了他三千个汉字，几篇背得出而不明白含义的“四书”，连一篇完整的文章都不会写。

朝廷废除科举后，私塾解散，陈鹤琴已经十四岁了，学业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原本他离开家乡来到杭州城，是投靠嫁在这里的姐姐，想跟姐夫学做生意，然而后者觉得他应该读书。当时杭州有美国教会举办的蕙兰学堂，是学制五年的美式中学，颇得新派人士的青睐，但学费很高，加上食宿，一学期要三十二元。姐夫典当了自己的皮衣，姐姐典当了自己的首饰，凑了三十五元给他，还宽慰陈鹤琴说，试个一学期，能读就读，读不下还是回来学生意。

自此，从外人看，陈鹤琴的学业有如神助。一个连新式小学程度都没有的人，英文和其他科学知识完全一无所知，到考取圣约翰大学、清华学堂，并留学美国，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仅用了十余年时间。这个“神”，就是陈鹤琴的秘诀——

早起。为了在每个学习进程赶进度，他通常在清晨五点钟就起床，一直学习、阅读或背诵到晚上九点就寝，除了三餐时间，仅在黄昏时间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

1912年春，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这也是陈鹤琴正式跨进校门学习的时候。入学两年后，陈鹤琴举办了两项对自己今后志业影响重大的“事业”。先在清华园内办了一所校役补习学校，每晚上课，对象是学校里的工勤人员和杂役，通常会来三四十人；又在离清华园二三里的成府村办了一所义务小学，教材里的几十个孩子识字读书。两所学校的校长由他担任，教学则是他自己和班上的同学共同担当。他的同学、后来也成为著名教育家的郑晓沧亲切地称他为“青年天使”。

近七十年后，陈鹤琴回顾道：

我今年虚度九十岁，适逢母校清华七旬大庆，何幸如之。我回忆当年离母校不远的地方海甸成府，我专为附近穷苦失学儿童办了一个义务小学，每天下午四时回来还为清华校役办一个补习夜校。这是我一切为儿童，一切为教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开端。

这段当“校长”的公益教育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整整一辈子的人生选择。

哥伦比亚大学

1914年夏，上海招商局码头，陈鹤琴登上了航向太平洋的邮轮，清华校长周诒春与学生同船赴美。船上，陈鹤琴遇到一位年龄差不多的安徽歙县青年陶文濬，他毕业于金陵大学，也是去美国留学。后来，他改名为“行知”，是与陈鹤琴关系最好的心灵密友和事业伙伴，友谊长达三十二年之久。

清华学校最后一年的办义学经历，使得陈鹤琴萌生了当教师的想法，因此留学科目他报的是教育。学校是欧柏林学院，与中国有着悠久而良好的关系。但他作了个唐突而重要的选择——想去学医。在所有手续都结案条件下，仓促换科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想到同船的周诒春答应了陈鹤琴的要求，同意帮他申请转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又过了几天，陈鹤琴重新检讨了自己的

志向：

教育虽然不能使我独立，难道医学是我所愿意学的东西吗？一个人做人总有一定的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现在我要自己问一声：“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志向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

最后他决定：“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

周诒春并没有批评他的反复，只是说：“电报已经打出，不能再改了。好在霍普金斯大学文理科也是非常著名的，你还是到那里去吧。”然而，霍普金斯大学本身以研究型的医学和工程学为主，所谓的教育学只有个教师培训班；霍普金斯大学并不全面承认清华学校的学分，学生先要从事本科学习，才能再进入某专业学院深造。

就这样，陈鹤琴用了三年时间获得了学士学位，然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行教育学研究，主要师从克伯屈和保罗·孟禄两位教授。

克伯屈是杜威的学生，教育哲学家、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致力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通俗阐释。克伯屈认为，传统教育抹煞学生兴趣，桎梏儿童活跃的心灵，阻滞创造力和学习精神，批评旧式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严格主义，主张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学习自由。他依据杜威“从做中学”的教育思想，还提出“儿童中心学校”主张，认为儿童的学习课程主要由儿童来决定；儿童的天性是喜欢去学习与他自身兴趣有关联的知识，或能帮助解决他所遇到的困难的事物。

保罗·孟禄，教育史学家，1915年起任哥大师范学院院长。他所著的《教育史》系统阐述了西方教育从远古时代到二十世纪初的发展历程，一直是美国师范院校教育史课程的标准教科书，对其他国家的教育史学科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18年夏，陈鹤琴读满规定学分，被授予教育社会学硕士学位及教育学教师文凭。冬天，他通过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初级考试。通常作这样的研究须一年时间，而陈鹤琴的官费留学期限至明年上半学期，1919年初，他将延展

留学期限的申请手续送到公使馆。

这时，哥大师范学院首位中国籍博士郭秉文受南高师委托在美延揽人才，即聘请陈鹤琴回国担任教席。当时，陈鹤琴要求三年后设法送自己回美继续博士研究，郭秉文一口答应。正当一切准备停当，突然获悉自己的延展呈请刚得到批准。但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法更改。三年后，郭秉文终未践履自己的承诺。后来，陈鹤琴不无慨叹地写道：“博士学位只好在梦中实践吧。青年血气方刚，只往前冲，一遇陷阱，噬脐莫及。这是我的一桩终身大憾事。”

鼓楼幼稚园

1919年初秋新学期，陈鹤琴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的同学兼好友郑晓沧、陶行知也在此任教。两年后，学校改组成综合性的国立东南大学，郭秉文任校长，陈鹤琴为教授，兼教务部主任。

1920年底，长子一鸣出生，陈鹤琴对孩子的成长发育过程作了长达八百多天的连续观察，并用文字和照片详细记录下来。他将一鸣在各种场合、环境中透过表情、动作等反应表现出的生理、心理特征予以对比、研究，以求得出结论。这些观察与实验工作，实验室就是自己的家，妻子和母亲是两位得力助手。他将观察、实验结果分类记载，文字和照片积累了十余本。

结合对儿子一鸣的观察与研究，陈鹤琴编成《儿童研究纲要》，作为东南大学和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讲授儿童心理课的讲义。他还经常把一鸣抱到课堂上，作示范和研究对象。

1923年秋，为了继续进行儿童教育实验，陈鹤琴在位于南京鼓楼头条巷的自家客厅开办了一所实验幼儿园，取名鼓楼幼稚园。他描述道：

鼓楼幼稚园的办学宗旨、教学内容、课程、教学方法、设备，一切的一切以中国儿童为对象，以中国化为目的，为起点，为归宿。首先，由于缺乏幼稚园教学场所，就在鼓楼城北空地上新盖的家宅客厅里办幼儿园，招生十二名。嗣后，募捐修建园舍。我亲自布置园地，种植花卉，添置运动器具如

秋千、摇船、摇马、大小积木、沙盘等，又订制课桌椅。园地布置成草坪，四周冬青、四季如春，红红绿绿着实可爱，俨然是个小公园。这样一来，南京鼓楼幼稚园竟成为一个游览之处。

这是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拟研究和推广扎根本土的幼儿教育方法。陈鹤琴亲任园长，聘请在东南大学附中任音乐教师的甘梦丹为教师，在东大任幼儿教育课程的讲师，美国女教师卢爱琳受聘来园担任指导员，后由钟昭华来园任教。

在鼓楼幼稚园之前，中国大多数幼儿园为外国传教士所办，少数国人办的幼儿园基本蹈袭英美教育模式，僵硬而不思改进。中国幼儿教育的三种大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使陶行知、陈鹤琴等新教育的倡导者们深有感慨。陈鹤琴提出的课程原则是：“在助人以选择或发展最有益生活之经验，课程所包举者，不仅限于人生日常行事所需之事实原则与方法，亦应兼及事实或活动之本身。”

设计组织或中心制是陈鹤琴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他们通常于前一星期商定下周要上的课程，以当时当地自然界和社会风尚、节日等作为设计的目标或课程的中心。自然万物是教育的最好课堂，豆子、黄瓜和节气都被看作是上课内容和教育时机。在陈鹤琴看来，课程是要合乎实际生活的，并且应该活用。同时，儿童的兴趣和适应力也是设计课程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们采用的教材一部分来自于书本，如歌谣、故事等，大部分是自然界、社会上日常所见的万事万物。这些预定的课程有时也会“因为儿童临时心境的不合，难以应用，常常改变的，有时竟有全部分不用的”；“因为课程是根据那些地方来的，教材当然也从那些地方去采取。所以自然、图画、游戏、读法、手工、常识等，没有一科不从那些地方来的，我们只知道给儿童生活，并不主张给他几多成人的知识或技能”。

陈鹤琴历来重视和强调儿童的习惯问题。他认为，教育的一部分功效是养成儿童的习惯。他所采取的方法是，首先拟出一个幼儿习惯表，将包括卫生、个人品德、接人待物、游戏和工作及学习智力等内容分别列出，然后在开学及各月、学期末逐项对照，根据儿童不

同情况分别施教，检查教育效果，并将结果告知家长。检查清洁是养成卫生习惯最好的途径，在清洁检查表上把每天早晨检查的结果用小红旗依评定的等级标示出来。还有一种方法是，用挂图将学习步骤表现出来，将学习进展分别对应表示，以鼓励儿童努力学习。

终归幼儿教育

基于对幼儿的研究，1925年，陈鹤琴撰述的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系其早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中国，他是最早将观察实验方法运用于研究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之中的教育家。他以文字、摄影等，记录并阐明了幼儿动作、好奇心、模仿力、游戏、言语能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发展的特征及意义。这些第一手资料，成为日后对儿童心理、游戏和玩具、道德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研究论述的重要佐证，陈鹤琴因此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儿童心理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及“中国幼教之父”。

不久，续作《家庭教育》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陈鹤琴早年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陶行知曾评价道：“此书为东南大学教育科丛书之一，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郑晓沧则说，读此书后“但觉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域”。《家庭教育》八十多年间曾十数次再版，印行多达百万册之巨，受到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他在自序中说：

小孩子实在难养得很！有时候，你不晓得他应当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有时候你不晓得他为什么哭的，为什么不肯吃！有时候，你不晓得他为什么生病的，为什么变得这样瘦弱的！有时候，你不晓得他为什么一个活泼的小孩子竟变为暮气沉沉的老少年！

小孩子不但是难养的，而稍明事理人，知道也难教得很！有时候，他非常的倔强，你不晓得骂他好呢，还是打他好；让他去强霸好呢，还是去抑制他好。……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因小孩子难以教养就不去教养他呢？我们知道幼稚期（自生至七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什么

习惯，言语，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教养我们小孩子的。著者不揣固陋，本个人之学识经验，編集是书，以供负教育子女之责者之参考。

陈鹤琴所追求的教育境界，是一种民主、和谐的家庭气氛和科学、艺术的教育方法。在这本书中，他将儿童生活的各个细节逐一列举并进行具体分析，对应正确的教导方法。

1926年夏，陈鹤琴主持东南大学幼稚师范讲习所。1927年初，陈鹤琴与陶行知、张宗麟等一同发起成立幼稚教育研究会，团体会员有鼓楼幼稚园和陶行知新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还有东南大学实验学校。同时，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儿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并任主编。对于自己之于幼教事业的热衷，陈鹤琴解释道：“依据生理心理的发展过程，幼稚时期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幼儿身心健康的增进，身体和行为方面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各项知能的发展，都是决定他将来人格和体格的重要因素。所以幼儿教育实在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他认为，幼儿教育的主体是儿童，教师的作用是度量儿童的能力与个性，用种种最适宜的方法，把教材介绍给儿童；课程与方法，则是达到教育目的之工具。

在此期间，陈鹤琴与张宗麟对在鼓楼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和晓庄幼稚园进行的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合著了《幼稚园的课程》《幼稚园的读法》《幼稚园的故事》《幼稚园的设备》等论著，并将他们研究、实验心得陆续发表在《幼稚教育》《儿童教育》上。例如他们提出的“单元教学法”，具有深远影响。

1928年5月，由南京政府大学院（即后来的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主持的全国教育会议召开，陶行知、陈鹤琴分别提交关于注重幼儿教育的提案。同时，受大学院之聘，陈鹤琴担任全国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参加者有郑晓沧、张宗麟等。标准的制定依据了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成果。1929年9月起，该标准在国内各省市试行，经实验和修订，于三年后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成为当时中国统一的幼儿园课程标准。📖



朱德与南泥湾垦荒

文 | 徐元宫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号召，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大生产运动。南泥湾垦荒堪称是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缩影。

【“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在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后，八路军迅速采取措施促进军民协同一致提高生产。一个多月后的3月2日，朱德与彭德怀等人发布第十八集团军通令：为了保障春耕，提高生产，各部队应注意：在春耕期间要尽量节用民夫、牲口；不许走居民已经蔬耕之地中间的小路，并帮助民众插立拦路牌；以前因河水山水冲溃之土地石罅或土罅，要动员我们部队帮助居民修好；禁折居民一树枝、一柳条或损坏其他农作物等。（《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大约两周后的3月15日，八路军总部致电各政治机关，要求各部队“须发动热烈的生产运动”，“军政民

应协同一致提高生产，提早完成春耕”，“准备到更困难时以自己劳动所得解决必需给养”。

针对国民党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物质限制的阴谋，1939年5月7日朱德与彭德怀等人致电各兵团首长指示“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上。坚决与敌人经济封锁作斗争，打破国民党物质限制我军发展的阴谋”。具体办法有：（1）努力发展生产运动。（2）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原则下，整理一切必要的地方税收及田赋制度。（3）加强敌占领区（交通线城市）伪组织中的工作，争取物质帮助来源。（4）运用经过政权与群众团体，在自愿的原则下，进行献金、献粮运动。等等。（《朱德年谱》）

1939年9月，朱德等领导人提出部队垦荒任务。9月3日，朱德与彭德怀等人致电刘伯承、田守尧、陈赓等人：晋东南、冀中、冀南、五台山区均受灾，陕北受顽固分子封锁，抗大、陕北公学均须移迁来此，来年春夏粮食必成大问题。在不妨碍战斗情况下尤其是非战斗部队，应注意开荒种冬麦。从榆社到武乡之滩河，如以人工塞堤，引导清漳河水，能垦荒数万田；早麦必在白露前下种，迟则不生芽。

1940年春，朱德与彭德怀率先垂范，带领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朱德亲自到蛟龙坡开荒。同年3月15日，《新华日报》

(华北版)报道：“朱彭总副司令号召全华北积极春耕，大力生产，战胜日寇。”

1940年5月26日，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此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怎样呢？同年10月21日朱德写给陈康白的信中内容对此作了回答：“我回延安已四个月，参观过许多工厂及一切建设，并讨论过财政经济及过去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个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以致引起大家注意。”朱德强调要努力去干，发展经济、冲破困难。(《朱德年谱》)

由上述内容可见，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以及国民党限制我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阴谋，在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之后，八路军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促进军政民协同一致提高生产，并且开始了部队垦荒。然而，很显然，这些措施由于刚开始实施等因素，其效果并不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陕甘宁边区生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同年8月18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朱德有针对性地指出，总的经费的解决，不只是靠减人，主要靠边区增加生产，发展商业。延安机关生产是好的，但民众的生产发展还不够，要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朱德主张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展生产，发展经济。1940年12月3日，在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时，朱德号召大家都来搞好生产，都来当家，不要把这个任务只放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身上。

在1940年12月25日发表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机关刊物《团结》杂志上的《完成边区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中，朱德指出：“一九四一年我们前面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完成边区的财政经济计划，绝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有关抗战胜利有关党国命运的大事。”朱德要求“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必须要特别关心经济工作，每一个干部和党员，必须努力完成自己的一部分经济工作，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推动广大人民到生产建设的热潮中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0年冬季，朱德明确提出了军垦屯田的主张和要求。任务首先落



1944年的南泥湾，于山腰修建的悬崖窑洞民居

在了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指战员们的肩上，而他们军垦屯田的目标则是南泥湾。早在1940年9月2日，朱德就曾邀集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人到延安西川等地视察，随后他们到南泥湾、临镇等地视察。同年11月初，朱德前往第三五九旅视察工作。他交待三五九旅旅长王震：“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还可以使指战员得到锻炼。延安南泥湾开垦起来困难较大，希望你们好好搞。要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用大家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朱德年谱》)

1941年春季，朱德率领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洁、第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干部多人，到南泥湾进行实地考察，并访问当地老农，对开垦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开垦荒山野岭】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黄龙山地区，距离延安城约45公里，是延安县金盆湾区的一个乡。

1941年3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遵照中共中央命令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尽管朱德事先交待过第三五九旅“延安南泥湾开垦起来困难较大”，但是，当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的时候，指战员们还是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了！当时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副政委的王恩茂回忆说：

“眼前只是一座座荒凉的山坡，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蒿子，荆棘横生；深山是遮天蔽日的树林，野猪野鸡成群；沟底是黑暗阴森的溪流，

浸泡着腐烂的古木和野兽的尸体。”（《口述抗战》第二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

指战员们首先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是住的问题。正如响彻中华大地的歌曲《南泥湾》中唱到的那样：“往年的南泥湾，到处呀是荒山，没呀人烟。”当时南泥湾几十里渺无人烟，仅有的村镇也只有几户人家，几眼破烂不堪的窑洞经过整修之后大都做了团、营的生产指挥所。第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只好在村边、河边宿营，有的用树枝搭成简陋的窝棚居住。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时，适逢三月份，天气还很冷，特别是夜间寒风刺骨，大家拣来一些树枝和柴草点起篝火御寒。后来，指战员们开挖窑洞，尽管刚挖好的窑洞里非常潮湿，有的还渗水，但铺上些干土、草灰或者柴草，就算安营扎寨了。

其次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吃的问题——粮食匮乏。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粮食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背回来，来回一趟需要走三四天。特别是雨雪天气爬山背粮，更加艰难。没有菜吃，指战员们到山上、河边挖野菜，有时打到野猪、野鸡，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

第三个严重挑战是没有垦荒的农具。指战员们群策群力，有的上山伐木到几十里远的村镇换农具；有的到河防两岸搜集敌人轰击边区的炮弹片；有的到处寻找废铁。第七一七团一营的战斗英雄王福寿带领十多名战士偷渡黄河，到日军占领的火车站去搞回来一些钢铁，然后又从金盆湾小街上请来一个从河南逃荒来的王铁匠。不久，王铁匠就在一群战士的协助下连续苦干几天，打出了锄头、斧头、镢头，农具匮乏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尽管事先朱德曾视察过三五九旅，并且在1940年冬季还专门交待过旅长王震：要充分做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用大家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但是，在开进南泥湾之初，对开垦南泥湾仍有不同程度的思想困惑。一些干部担心搞生产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还有些干部觉得“自己动手”是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因此总想多搞些商业，少搞些农业生产，因为相比较而言，农业生产出力大、盈利小且周转慢。不少战士对于军垦屯田的意义认识不足，觉得之所以当兵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的，现在在后方搞农业生产，没有在前

线打敌人光荣。

这些情况引起了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根据1941年3月13日中央军委第一次政务会议的决定，由朱德等人组成财政委员会，以加强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朱德任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会议还决定由朱德直接领导后方勤务工作。1941年5月，朱德在百忙之中抽空视察南泥湾，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并向团以上干部阐述了“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勉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朱德年谱》）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通过耐心、深入的说服和教育工作以及广泛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第三五九旅指战员们对于军垦屯田、开发南泥湾的重大意义有了统一的理解和认识：目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造成的，边区人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力量支援八路军抗战，为了持久坚持抗战和保卫边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我们必须自力更生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最终战胜敌人的可靠途径。

在解决了思想上的困惑、达成统一而正确的认识之后，第三五九旅上至王震旅长下至普通士兵很快掀起了一个响应中央号召、积极开展生产运动的热潮。旅首长及各级指挥员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旅长兼政委王震的双手也跟普通战士的双手一样由于辛勤劳动而结出了老茧。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也跟战士们一道在山上同吃同住同开荒。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带着团司令部人员住在荒地，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镢头，带领由他本人任组长的一个开荒小组及战士们一起开荒。虽然白天他还要到各连检查布置工作，晚上还得开会，但是，由他本人任组长的开荒小组每人平均日开荒地1.4亩，他本人也达到了平均日开荒地1亩。七一八团政委左齐，由于在战斗中失掉了右臂而无法自如地抡起镢头开荒，就忙着给战士们做饭并挑桶上山给战士们送饭送水。（《口



南泥湾的八路军战士在进行体能锻炼

述抗战》第二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

干部的率先垂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战士的劳动积极性。开荒告一段落后，第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及时地春播、夏耘，不久，一片片荒地变成了郁郁葱葱的良田。

1941年6月20日，朱德致函陈宗尧等人，表扬七一二团、七一七团的“生产有成绩，有了基础，望他们每天都向前推进，建立起模范的生产运动”。与此同时，信中再次嘱咐他们“要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但解决了目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也为边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将来即是国家一部分优良的产业”，要求他们在开荒将告结束时，抓紧时机，大力发展畜牧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做好商业工作，“要时时刻刻想着为国家建立一个很大、很好的家务……不要忘了整个人民的利益……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同时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准贪污腐化。

1941年7月，朱德再次视察南泥湾，夜宿八路军总部炮兵团（驻地陶宝峪）。他向指战员们讲话时指出：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一面训练。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你们的任务是屯垦，要求你们今年粮食自给自足，明年耕二余一，向边区政府交公粮。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朱德年谱》）

第三五九旅遵照朱德的指示，在搞好开

荒种地的同时，抓紧时机大力发展畜牧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做好商业工作。1941年秋收之后，第三五九旅在金盆湾东头开办了一个油酒综合厂，雇请了两个老师傅，抽调三十多名战士当学徒，用部队收获的豆子、麻子榨油，用玉米、高粱酿酒，并将豆饼、酒糟作为部队养猪的饲料。综合厂生产的油和酒不仅供应了部队，而且还对外出售，销往国民党统治区，换回药品、棉花等。

毋庸置疑，南泥湾垦荒及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推进倾注了朱德的心血。关于这一点，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积极推进“南泥湾”政策》作出了客观评价：“朱总司令从前方回延（安）后，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丰富的劳动，投入有用的活动，以减轻人民的生产工作，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联系，帮助边区建设。朱总司令这种克服物质困难、支持长期抗战的远大打算，在三年以前，有些人曾是不了解的。为了实现这一正确主张，朱总司令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看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当时，南泥湾是空无人烟的地方，那里鸟兽纵横，蒿蓬塞路，当朱总司令去踏看的时候，晚上只能找到一个茅棚住宿。但是，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的江南’。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在一起。”

1942年12月21日，执行开垦南泥湾任务的第三五九旅所隶属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在陕甘宁边区党的高干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前六部分时指出：第三五九旅坚决地执行了我们总司令的生产思想、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南泥湾政策，部队除粮食外，百分之八十二是自己弄来的。（《朱德年谱》）

【“陕北的江南”】

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在八路军指战员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八路军纪律严明，令行禁止，开垦南泥湾既艰苦卓绝又成绩斐然。在开垦南泥湾的过程中，第三五九旅实施的竞赛机

制——每天测量开荒效率，公布开荒成绩——无形之中激发了指战员们的劳动积极性和主动性，个人之间以及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展开了竞赛，竞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劳动竞赛的过程中，劳动的智力因素和技术因素在不断发展，垦荒的整体效率和成就也在与日俱增。1941年，第三五九旅开荒种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96.3%，经费自给率达到90.2%。1943年，开荒种地原计划3.9万亩，由于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开荒后半个月即被突破，在改订计划6万亩之后，又被突破，最后达到了种地10万亩，全年收细粮1.2万石，加上南瓜、土豆折粮（三斤折粮食一斤），共为1.5万石，粮食自给有余，并且上交公粮约万石。

这一年，全旅养猪4200多口，养牛820多头，养羊7800多只。1944年播种面积26万多亩，农业生产获得了更大的丰收，主副食经费全部自给有余，粮食平均每人生产细粮6石多。在开荒种地的同时，全旅指战员还打了1000多孔窑洞，建筑了600多间平房，置了1万多件家具和农具。（《口述抗战》第二册）

实际上，到1942年，南泥湾就已经发生了奇迹般的惊人变化。1942年4月中旬，朱德与贺龙等在王震的陪同下视察南泥湾农场、工厂和从事生产的第三五九旅等部队，称赞南泥湾建设搞得好，是“陕北的江南”。同年7月10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位老人同游南泥湾，并欣然赋诗一首《游南泥湾》：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开垦南泥湾卓有成效，有力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及广大民众的大生产运动。

1942年2月3日朱德和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密电中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在去年已打下基础，“今年更有计划地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大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勿需外援”。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电影团组织拍摄的记录开垦南泥湾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在各地放映，更激励了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大生产运动。边区农民的佼佼者向第三五九旅发出了劳动竞赛挑战，1943年3月延安、安塞两位劳动英雄向第三五九旅提出开展生产竞赛。朱德闻讯后，电令第三五九旅和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积极应战，并且鼓励说：八路健儿都是劳动人民子弟，部队中劳动英雄一定很多。要认真发现部队中的劳动英雄，以作为竞赛运动的中心环节，并由此而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劳动竞赛。各部队要自行筹划，广泛发动个人同个人、单位同单位之间的相互竞赛，其成绩核算方法，将以劳动力和生产粮食之多少作为评判标准。

这样一来，陕甘宁边区各行业内部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更是展开了生产竞赛，真正实现了1940年12月25日朱德在《完成边区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一文中所提出的“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推动广大人民到生产建设的热潮中来”的目标。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军民实现了丰衣足食，这一年的4月10日朱德表示要“更加努力地生产运动，使我各根据地以至全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希望成为像边区一样丰衣足食的家庭”。（《朱德年谱》）

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几年奋战，使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根本改变面貌，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大生产运动为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抗战并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的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丰子恺的“艺术抗战”

文 | 刘永加

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也是我国著名书画家丰子恺先生（1898—1975）逝世50周年。抗战期间，丰子恺带着家人经历了为时8年、行程6000余公里的流亡之旅。尽管这趟旅程始于苦难，但丰子恺却以乐观旷达的精神将它走成了艺术之旅、抗战之旅，他自称为“艺术的逃难”。在炮火烽烟之下，他遍览祖国河山、了解各地风情，大大激发了创作热情，大量的诗词画作尤其是抗战题材的作品诞生其间。

流亡序幕：从浙江到江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时，丰子恺一家正在缘缘堂居住。“缘缘堂”是1933年春丰子恺在家乡浙江桐乡县石门镇建成的住宅，此后每年他都要带着家人到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里不仅是他的现实家园，更是他的精神家园。

11月6日下午，石门湾突遭日军飞机轰炸。当晚，全镇居民都逃到乡下避难，丰子恺全家也逃到了离石门湾5里地的南圣浜。随着战火蔓延，石门湾及其周围的乡村越来越不安全。正巧此时丰子恺收到了马一浮先生的来信，后者邀他带家人去桐庐避难，丰子恺立誓“宁当流浪汉，不做亡国奴”，遂决定离开缘缘堂，直奔桐庐。

11月21日晚间，丰子恺和夫人徐力民带着6个孩子，加上岳母、姐姐丰满、堂弟丰平玉、亲戚章桂，一行人一起坐船离开南圣浜，

到悦鸿村会同表亲周丙潮夫妇和孩子，组成一个“逃难团队”，连夜仓促逃离故乡。

第二天黄昏，船驶到了杭州拱宸桥，由于情况不明，他们只得夜宿船内。大家都很担心，辗转难寐。为了逃难方便，丰子恺忍痛把根据蒋坚忍原著所作的《日本侵华史》画稿，以及可能暴露身份的证件，统统销毁。

第三天早上，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大家只得扶老携幼徒步穿过杭州城，直到傍晚才抵达六和塔江边。可是，江边船只全被封存，汽车又都用于军事，天还下着雨，一筹莫展的大伙儿只能暂时躲进茶店避雨。幸好，一位心肠好的赵姓巡官听闻他们的困境，就从省警察局封存的船只中让出一条给他们用。这艘船的船主是富阳人，正巧要去桐庐，但要价24元，当面付清。丰家一行人付款后上了船，向桐庐进发。

船只驶离杭州时，丰子恺记下了他看到的杭州风光。眼前的杭州与他年少时看到的风景已大不一样。1914年，17岁的丰子恺第一次来到杭州求学。学生时代的他常常向学校请假，寄住在西湖边上的友人家里，等到黄昏月上，就背着写生箱来到湖上写生。丰子恺还经常在杭州的茶楼上凭窗而望，观察过往的行人。西湖的晴雨风雪、四时旖旎，杭州城中的人文气息，滋养了他的画笔。而今，战争当前，丰子恺感慨道：“自然永远调和，圆满，而美丽。惟人生常有不调和，缺陷与丑恶的表演。然而人生的丑，终不能影响大自然之美。”

午夜，船行到江心时，大家熟睡了，船主叫醒丰子恺，说要加价40元，否则就不送了。

丰子恺把章桂叫醒，轻声对他风趣地说：“今夜我们要吃‘板刀面’了。”意即在水路遇到打劫者。为解一时之难，他们只好答应船主的要求，但说明要到了桐庐亲戚家才能付清。

11月24日，船抵达桐庐，马一浮住在迎欣坊四号，桐庐县政府为了保护他，在门口设有卫兵。船主送丰家人到马一浮寓所时，看到门口的卫兵就有些胆怯了，连连认错赔罪。丰子恺宽慈为怀，并未追究。丰家人在马一浮寓所住了将近一个月后，迁居到河头上租住的新屋。

战火迅速蔓延，很快桐庐告急。这时丰子恺接到开明书店长沙分店刘甫琴的来信，后者代其兄刘叔琴邀请丰子恺去长沙工作，并提供住处。这样，丰家又开始了以长沙为目的地的迁徙。离开桐庐前，丰子恺怕路费不够用，便让章桂进入被围困的杭州，取出存在中国银行的200元存款。但章桂找不到保人，银行不让取款。

启程逃难前，丰子恺已是声名在外的名人，在流亡路上，他一直怕暴露身份，在兰溪入住旅馆时，登记簿上写的名字是“丰润”。恰巧，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曹聚仁，当时是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的特派员，路经兰溪，在旅客登记簿上见到“丰润”这个名字，知道是老同学来了，急忙赶来相见。

曹聚仁在聚丰园设宴，为丰子恺一家洗尘。他劝丰子恺，为了在途中得到各方协助，顺利到达大后方，一定要把“丰子恺”三个字亮出来，还帮他印了名片。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存在中国银行的200元存款，即便在兰溪“异地取款”，也无需保人，只凭“丰子恺”三字就顺利取出了。

路费总算解决了。丰家人就在兰溪雇船溯兰江西上，但经衢江到达常山后，水路就断了。附近公路局常山保养场的工人师傅听说丰子恺先生来了，赶来帮忙，给他们安排了一辆无蓬汽车，仅花了几块钱油费和驾驶员补贴费，就把他们送到了江西上饶。此时已是1938年元月了。

丰家一行风尘仆仆，晓行夜宿，又从上饶坐船经余干，过鄱阳湖、南昌、樟树镇，逆袁水至宜春，弃舟登陆。因为没有客车，他们只得攀上货运列车，半夜到达萍乡。在萍乡，丰子恺辗转重遇了在上海立达学园教书时的学

生萧而化。萧氏夫妇赶来探望老师丰子恺，热情挽留他们一家在萍乡过春节。盛情难却，丰家人便从城里迁到暇鹄塘萧氏祠堂，度过了流亡途中的第一个春节。

抗战宣传：从湖南到广西

春节过后，丰子恺从报上知悉缘缘堂被日寇飞机炸毁，心情很不好，写下散文《还我缘缘堂》《辞缘缘堂》，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后来，丰子恺再次接到长沙开明书店刘甫琴的来信，告知开明书店上海总店已经毁于炮火，拟迁武汉，要丰子恺先去长沙，再转武汉。1938年3月，丰子恺等人终于来到武汉。他把章桂、周丙潮分别安排到汉口和武昌的开明书店，自己带着陈宝和林先两个女儿在身边，其他人则暂留在长沙。武汉抗日救国气氛浓烈，群情沸腾。丰子恺与朋友一见面就激动地说：“一到汉口，仿佛睡醒了。”

当时，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三厅刚刚设立，爱国文艺界人士云集武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敌宣传工作。丰子恺的同学范寿康正担任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工作，对丰子恺的抗战文艺宣传很是支持。丰子恺在武汉逗留的时间虽短，但他除了写文章、画画外，还到处奔走，做了大量抗战宣传工作。

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下发现一棵被人砍伐了大半截却仍枝繁叶茂的大树，触景生情，便联想到：这不正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象征吗。于是，他以这棵大树为题材，画了一幅漫画，并题诗一首：“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他还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就像一棵大树》的文章，以此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此景还启发丰子恺后来为幼子取名“新枚”。

那段时间，武汉常遭日机空袭。丰子恺目睹敌人的暴行，非常气愤，连续创作了《我愿化天使，空中收炸弹》等宣传画。丰子恺还见证了“四二九”武汉空战。这次空战，中国空军英勇作战，打下了20多架日军飞机。丰子恺欣喜万分，事后题写了6首《望江南》，其中一首就是记录武汉空战大捷：“闻警报，逃入酒楼中。击落敌机三十架，花雕美酒饮千盅，谈

话有威风。”他画了一幅题为《汉皋春望》（汉皋是当时汉口的俗称）的漫画，画面上没有战机和硝烟，只有一家三口，在河桥的绿柳下放风筝，先生放飞的是“和平”，太太放飞的是“胜利”，一旁的孩子高举双臂，和父母一起仰望空中的风筝。这幅笔墨简洁的漫画，深刻表达了丰子恺盼望胜利与和平的美好心愿。

丰子恺还满腔热情地收集抗战漫画，编辑《抗战漫画集》，亲自为每幅画配上说明文字。此书后来由汉口大路书店出版，大受读者欢迎。

不久，湖口、马当失守，武汉告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第三厅撤往长沙、衡阳、桂林等地。丰子恺也从汉口回到了长沙。不久，他决定接受桂林教育局的邀请，赴桂林为“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的学员讲课。1938年6月23日一早，丰子恺和家人从长沙出发，次日下午到达桂林。

“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培训班”课程结束后，丰子恺应桂林师范学校校长唐现之邀请，到该校任教。教学中，丰子恺主讲“艺术与抗战宣传”，组织学生用漫画进行抗战宣传，实践“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的艺术理念。他坚持撰写《教师日记》，记录战时教育与师生情谊。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收集学生漫画，得四十幅，单纯明快，颇可

用。得四十幅分为四份，交学生明日赴乡间张贴。”丰子恺不仅教授学生艺术创作方法、技巧，绘制抗战宣传画，还亲自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开展抗日美术宣传，张贴抗日漫画。

那时，日机经常空袭桂林，躲空袭是常态。桂林地貌特殊，山岩形状奇崛，能让四散奔逃的人就地避难。丰子恺“就地取材”，把这些山岩也作为漫画素材。他创作了好几幅相关主题的漫画，其中一幅题为《不知有无警报》的黑白漫画，描绘的是丰子恺和家人在九龙岩躲避日军空袭。还有一幅题为《警报作媒人》，描绘了一对青年男女在形状独特、呈拱状的双岩下躲避空袭，二人端坐岩下，望向远处。这样的日子让丰子恺感慨，他填词叹道：

“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日更东归？”

1938年10月，丰子恺还亲历了广州大轰炸，亲眼目睹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城区的凄惨情景。在这次轰炸中，多间民房被炸毁，百姓死伤多人。丰子恺有感而发，以“轰炸”为主题，画了4幅漫画。其中一幅题为《狂炸也》，画面相当震撼：地面炮火连天，空中又有两枚炸弹飞来，一位母亲背着一个婴儿疾跑，却不知婴儿的脑袋已被弹片削去。丰子恺的这类时事漫画，是对日寇罪行的强烈控诉，反映了他作为一位爱好和平、正义的艺术家的良知和勇气。

胜利曙光：从贵州到重庆

1939年春，应浙江大学聘请，丰子恺任艺术课讲师，丰家一行便离开桂林前往广西宜山。1941年2月，浙大迁到贵州遵义，丰子恺升任副教授，仍讲授“艺术欣赏”。在遵义，丰子恺全家先住在罗庄，后迁居新城狮子桥南坛巷，寓所取名为“星汉楼”。

在遵义，丰子恺总算是获得了一段喘息时间，虽然是战乱时期的偏安，但对于热爱生活、学习和创作，性格乐天的丰子恺来说，好像来到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舞台。在生活中，他继续把逃难途中的亲见亲闻写成文章，绘成漫画、宣传画，动员民众积极抗日；在教学中，他坚持指导学生画各种宣传画，分发张贴。他还曾与学生在遵义城的繁华地段，以浓



《汉皋春望》

墨重彩画成多幅巨大的抗日宣传画，视觉冲击力很强。

1941年2月2日，遵义禹门乡绅胡忠相邀请当地名士赵恺和丰子恺、李瑜、罗展、冯励青等人前往新舟镇禹门的沙滩雅集。这里因为洛安江中的一片四面环水的沙滩而得名，沙滩一带曾孕育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文化名人。他们崇尚“渔樵耕读”，学术成就影响深远。抗战时期，浙大学者研究这一文化现象时，称之为“沙滩文化”。

丰子恺一行在5天时间里游览了古刹禹门寺、节孝寺等名胜，拜谒了郑、莫、黎三贤墓。众人既被沙滩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所倾倒，感慨遵义人文精神之盛，又为“寺观之兴废，陵谷之迁变”而慨叹，纷纷吟咏、挥毫，抒发心中所思所感。丰子恺则根据诗意配上漫画，并将诗句题于画上。返回遵义后，众人将此行催生的诗文、漫画编辑成册，1942年5月交由遵义孤儿院印刷发行。由于郑珍是“沙滩文化”名人之首，其旧居和墓地均在子午山，故诗画集定名为《子午山纪游册》。

1942年，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一再来电，邀请丰子恺前去协助办学，并推荐他为教务主任。丰子恺因教授薪水微薄，家庭负担过重，对于率家眷一行远道入蜀颇有顾虑。因此，他一直等到浙大课程结束后，才在这年11月到达重庆。次年，丰子恺随校迁往江北盘溪，因找不到住处，全家七口借住在沙坪坝陈之佛校长家。直到10月，丰子恺在城里

夫子池举办个人画展，获得了收入，才得以另谋住处。

丰子恺在沙坪坝正街西面街后庙湾（今一心村）租了块空地，自己设计盖起了三间简陋的“抗建式”穿斗结构的平房。当时的庙湾一片荒凉，但丰子恺十分喜爱这远离喧嚣、具有田园风光的小居。像过去常为寓所、书斋取名为“缘缘堂”“星汉楼”一样，丰子恺又深情地将陋居命名为“沙坪小屋”。在这座小屋里，丰子恺勤奋创作，为抗战鼓与呼，直到抗战胜利。

寓居重庆期间，丰子恺画了许多反映山城风俗民情、耐人寻味的漫画。其中有一幅呼唤和平的漫画非常出名。离重庆艺专不远处有一个迫击炮厂，常用空弹试炮，靶场就在学校附近，师生们在学校附近的稻田里或山坡上就可以捡到弹壳。他们将捡来的弹壳立于案头当作花瓶。丰子恺由此得来灵感，画了一幅画：荷花插在弹壳里，题曰《炮弹作花瓶 天下永太平》。

1944年中秋之夜，月明如画，全家团聚，喜庆之余，丰子恺大醉而睡。次晨醒来，他填就《贺新凉》一词：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手。

此时，丰子恺已然预感到抗战胜利即将来临。日后，他将这首词收入了题为《谢谢重庆》一文中。

山城重庆的三年生活，给丰子恺留下了深刻印象。抗战胜利后，他离开山城、复员杭州，还专门作过“抗战已胜利，莫忘策源地”的重庆写景画。

丰子恺的8年抗战长征路，从江南书斋到西南山野，始于苦难，终于艺术，画笔从未停歇。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使得他的漫画更富有深情，也为他赢得了“当代石涛”的美誉。🖼

（作者系文史学者）



1944年夏丰子恺与幼女一吟在重庆沙坪坝

职业报人张恨水



张恨水

文 | 汪修荣

在一般人心目中，张恨水是一个通俗小说家。作为民国时期最畅销、最高产的作家之一，张恨水一生共创作中长篇小说一百一十余部，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散文、评论、杂文、影评、政论、游记、通讯等，总计约五千万字。鼎盛时期，张恨水同时给七家报纸写连载小说，风头一时无两。然而，张恨水真正的职业却是报纸编辑和记者，最初他是以报人身份走向社会的。

【“恨水”的文学梦】

1895年5月18日，张恨水生于江西南昌一个宦游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是行武出身，张恨水生下来时圆头大眼，一副武人后代的样子。父亲有过从军经历，深知其中的不易，希望儿子能弃武从文，因此从小就重视儿子的教育。张恨水自幼酷爱读书，最早阅读的小说是家里藏的《三国演义》《希夷梦》《七国演义》等。十一岁时，他发现对四叔的《残唐演义》爱不释手，这是他读小说的开始。张恨水后来回忆：“我什么小说都读，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我在小说里，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张恨水不仅爱看小说，还喜欢给弟妹们讲书中故事，从小就显示出高超的讲故事才能。小学毕业时，张恨水已经读完了几百部小说，成了一个十足的小说迷。进入农业学校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张恨水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小说，林琴南的翻译小说令他大开眼界。

农业学校毕业后，父亲准备送他去日本留学，因为日本学费便宜。但张恨水认为要留学就要去英国。就在张父为儿子准备学费时，他突然背上患了恶性疮，救治不及，没几天就去世了。这一年，张恨水才17岁，留学梦也彻底破灭了。

办完父亲的丧事，为了生存，一家人只好离开南昌回到老家潜山黄土岭村，靠祖父留下的几亩薄田生活。张恨水无所事事，只能在家里写诗填词，看父亲留下的藏书和能找到的各种小说。张恨水曾自述：“十七岁上半年，我已经读了几百种小说了。在亲戚朋友的家庭中，没有人不知道我是个小说迷。”

不久，在堂兄张东野的帮助下，张恨水来到上海，顺利考入苏州蒙藏垦殖学校。学习之余，张恨水开始了业余创作，把一篇文言小说和一篇白话小说投给了《小说月报》，署

名“愁花恨水生”。很快，他收到主编恽铁樵的回信：“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稿子虽未发表，但主编的肯定却给了他极大鼓舞。

因缺少经费，学校停办，张恨水只好又回到家乡。张恨水并不甘心就这样老死乡间，1914年，他怀着强烈的求学欲望又回到南昌寻找出路，不久投奔武汉本家叔叔张犀草。张犀草编的是一张小报，报社只有一个人，见张恨水喜欢舞文弄墨，便让他帮忙补白。这是张恨水第一次闯入新闻界，也是他后来成为职业报人的最初尝试，为他后来从事报业积累了初步经验。

虽然没有稿费，没有工资，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张恨水仍十分高兴。从这时起，他在自己满意的诗作上正式署名“张恨水”，对于笔名的来源，张恨水解释说：“本来在垦殖学校作诗的时候，我用了个奇怪的笔名，叫‘愁花恨水生’。后来我读李后主的词，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我就断章取义，只用了‘恨水’两个字。”

【以原创和连载办副刊】

张恨水真正的报人生涯是从芜湖开始的。如果说早年到武汉编小报，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满足兴趣爱好，那么到《皖江日报》担任总编辑，则是张恨水报人生涯的真正开端。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张恨水在老家穷困潦倒时，命运之门终于对他敞开了。1918年1月，好友郝耕仁写信邀请他到芜湖担任《皖江日报》的编辑。2月，张恨水拎着一只箱子来到芜湖，准备闯荡新闻界，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机遇在等着他。郝耕仁恰巧有事要到广州去，辞掉了总编辑职务，便向报社经理谭明卿推荐张恨水接替自己的职务。为了证明张恨水能够胜任，郝耕仁还拿出了张恨水的诗文小说加以佐证。就这样，张恨水“鲤鱼跳龙门”，从一个文学青年一下子变成了报社总编辑，这一年他才24岁。

张恨水刚接手《皖江日报》时，报纸内容基本靠编编抄抄，了无新意。一次，郝耕仁看见张恨水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便信手在桌子上填了半阙词调侃他：“三更三点奈何天，手也挥酸，眼也睁圆，谁写糊涂账一篇？”

张恨水见状立马填了下半阙：“一刀一笔一浆糊，写也粗疏，贴也糊涂，自己文章认得无？”写罢两人相视大笑。

之后，张恨水决定大胆改革，改变原来“剪刀加浆糊”的办报方针，提出新闻继续靠“剪刀”，但要适当增加评论，副刊则完全原创，由他一个人负责，也不需要增加费用。这个建议得到了报社同仁的支持。张恨水边向朋友约稿，边亲自创作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为此他写下了平生第一部连载小说《南国相思谱》。这一举动增加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在芜湖新闻界，竟是打破纪录的”，新颖的办报方式很快吸引了大量读者，报纸销量大涨，老板高兴地把他的月薪从8元提高到12元。连载小说的成功尝试，为张恨水后来办副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此时，恰逢五四运动的思潮风起云涌，这对张恨水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在芜湖游刃有余，衣食无忧，但他觉得北京才是自己向往的地方，决定到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为了圆梦，张恨水婉拒了谭明卿的挽留，只身去了北京，寄宿潜山会馆。在朋友的介绍下，先到《时事新报》做校对和编辑，月薪10元。

一个偶然的機會，《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在张恨水的朋友方竞舟那里读到张恨水的一句词：“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惊为奇才，立刻上门拜访。成舍我虽是湖南人，却出生在安徽怀宁，两人一见如故，他当即聘请张恨水为助理编辑，月薪三十元。张恨水曾回忆：“虽说是助理编辑，其实就是校对，我的职务，乃是看大样。”

为了挣钱养家，张恨水又兼任芜湖《工商日报》的驻京记者。经济条件改善后，他便把家人从老家接到芜湖，一边安排弟妹读书，一边努力工作养活十口之家，靠一支笔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

因为业务繁忙，张恨水只好放弃了到北大做旁听生的梦想，一心扑在办报上。他帮成舍我办《今报》《真报》，做起了职业记者和编辑，还做了一段时间“联合通讯社”总编辑。他深入北京各个阶层，上至总理大臣，下至底层百姓、三教九流，由于肯吃苦，肯花工夫，不仅采访到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新闻要闻，也为

日后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张恨水在新闻界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外地报纸慕名而来，请他撰稿、担任特约记者，于是他又兼任了上海《申报》《新闻报》驻京通讯员。“在‘新’‘申’两报方面，信用都很好，写去的通讯，很少不登的，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那个时候的一二百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这一时期，对于能挣钱的活儿，张恨水几乎是来者不拒，常常身兼数职。

1923年，成舍我决定创办《世界晚报》，希望张恨水辞去一切工作，专门为他主编副刊，为报答成舍我的提携之恩，张恨水答应全力支持。

1924年4月1日，《世界晚报》在手帕胡同35号正式创刊了。张恨水为副刊取名“夜光”。他借鉴办《皖江日报》的经验，为副刊开办了一系列栏目，包括小说、诗词、散文、笔记、掌故等，同时应成舍我的要求，开设连载小说吸引读者——在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不谋而合。

【走红的小说家】

1924年4月，《世界晚报》创办时，为了吸引读者，成舍我希望张恨水创作一部连载小说。张恨水对此做了认真研究，当时各种“外史”的小说比较流行，于是他决定结合自己当记者的见闻，创作一部反映北京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小说一经问世，就产生了轰动效应，读者争相订阅《世界晚报》，报纸销量大涨，张恨水也因此一炮走红，声名鹊起。

一天下午，张恨水正在会馆写连载小说，一个穿白色西装的贵公子带着两个士兵来访，来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少帅张学良——他竟然是被《春明外史》吸引来的。为了表示对张恨水的尊敬，张学良还特地带来两斤龙井茶，两人虽地位悬殊，又是初次见面，却相谈甚欢。张学良有意安排他去麾下挂个闲职拿高薪，被张恨水婉言谢绝了。“少帅拜访当红作家”的消息很快成了报纸新闻，张恨水的名气更为响亮。

成舍我看到《世界晚报》在张恨水连载小说的加持下，风生水起，成了北京新闻界的一匹黑马，凭着职业敏感，他决定趁热打铁，

再办一份《世界日报》，“杀手锏”仍是张恨水的连载小说。1925年2月10日，《世界日报》正式创刊，张恨水为副刊取名“明珠”，为了吸引读者，特地在报上连载新创作的小说《新斩鬼传》。

《春明外史》的走红，使张恨水的连载小说成了许多报纸的敲门砖，一时间约稿无数，北京的几家大报，纷纷上门请他写小说。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张恨水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给自己的小说创作定了几个原则：

“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求其辞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

1927年2月14日，经过认真构思创作，《金粉世家》开始在《世界日报》副刊上连载，小说刚一问世便受到极大欢迎，好评如潮，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此前的《春明外史》，被誉为“民国红楼梦”，一时洛阳纸贵。好友张友鸾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

虽然成了当红作家，张恨水丝毫不敢懈怠，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大概自上午九点多钟起，我开始写，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去。吃过晚饭，有时看场电影，否则又继续地写，直写到晚上十二点钟。我又不能光



张恨水在伏案写作



张恨水作品集

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张恨水十分勤奋，平均每天大约创作五千字，而且是用毛笔写作的，这在当时是一个极高的产量。

作为当红作家，张恨水对读者非常负责，从不要大牌。创作《金粉世家》时，因为小女儿康儿患猩红热病逝，实在无心创作，他只好忍痛把连载停了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

【在上海打开局面】

《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两部连载小说使张恨水红遍京城，许多报纸都把他的小说当成摇钱树，纷纷向他约稿，张恨水不好拒绝，只好都答应下来。为了还稿债，张恨水只得同时创作几部小说。最多的时候，他为各地报刊同时写七篇连载小说。为了不混淆作品中的人物，他在墙上贴满了日程表和人物表，周一、周三《春明外史》《天上人间》，周二、周五《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周四、周六《剑胆琴心》《斯人记》，周日《斯文人记》，后来又新增了《春明新史》《啼笑因缘》。张友鸾说：“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人物故事都储存在（脑子）里面，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时不用提

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

为了拉稿，少帅张学良还曾亲自出马，请张恨水为沈阳《新民晚报》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这样的小说，赵四小姐特地把少帅收藏的一把扇子让人配了画，请张在上面题诗，张恨水拗不过情面，即兴赋诗一首：

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
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关。

由于约稿太多，一时来不及，张恨水婉拒了少帅的约稿，但《新民晚报》已经提前把广告登出来了，无奈之下，张恨水只好答应写一部交差。

如果说此前张恨水的影响主要在北方，那么与严独鹤的相识，就使其小说的影响力扩大到了南方。1929年5月，上海《新闻报》的副总编辑严独鹤来北京，老友钱芥尘向他隆重推荐了张恨水，严独鹤此前恰好在北京的报纸上看过张恨水的小说连载，印象深刻。张恨水与严独鹤一见如故，严当即请他为《新闻报》的“快活林”副刊写一部连载小说。该报是上海第二大报，如果能在上海打开局面，对张恨水无疑是一件好事。

为此，张恨水反复构思揣摩，最后根据朋友告诉他的一个真实故事，创作出《啼笑因缘》。据张友鸾回忆，“《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它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

最初《啼笑因缘》并未受应有的重视，被耽搁了五个月，张友鸾说，“《新闻报》是当时发行量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那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靠近小说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

看到《啼笑因缘》的巨大成功，报社立

刻又以千字8元的稿酬与张恨水签订了新的合同，就连他的旧作《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图书的稿费也升到了千字4元。《啼笑因缘》还卖出电影版权，由影后胡蝶主演。

张恨水在上海报纸上陆续发表了《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为止。

张恨水成了走红作家后，抄袭盗版蜂拥而至。据不完全统计，“在东北和华北沦陷期间，伪造的张恨水小说，竟达四五十种之多”，甚至还有一本假冒张恨水的自传《我一生的事情》。

【短命的《南京人报》】

饶有意思的是，《南京人报》不是南京人办的，而是安徽人办的。这是一张真正的由文人独立创办的报纸，所有资金全部来自于张恨水的个人稿费，这在民国报刊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1935年秋，张恨水应成舍我之约到上海创办《立报》，担任副刊编辑，约期三个月。张恨水10月到上海，替《立报》编“花果山”副刊，同时写一个连载小说《艺术之家》。三个月过后，张恨水正打算回北平，忽然接到北平两个急电，让他缓归——此时冀东出现了伪政府，日本人正四处捉拿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张恨水也在黑名单上，出于安全考虑，他只得放弃北归。

北平有家难归，上海滩又非所爱，放眼全国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去处，犹豫再三，张恨水把目光投向了六朝古都南京。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我虽然讨厌上海，我的生活，却靠了在上海发表的文字，要离开上海，而又不能离得到交通不便的地方去。于是我临时选择了个中止地点，南京。南京除了到上海很近，到故乡也很近，而尤其可以住下的，是朋友很多。”（《写作生涯回忆》）

1936年初，张恨水来到南京。最初的两三个月，除了写稿子就是和朋友们吃饭聊天，虽然南京是当时的首都，时间一久，他对这个城市的“六朝金粉气”也开始生厌。正犹豫间，老友张友鸾劝说他在南京办一张小型报纸。张恨水还在上海时，张友鸾就建议他到南京办报，此时，这一建议渐渐摆上了议事日

程。恰好此时张恨水身上有四五千元稿费，本来是打算在南京近郊购地建房的，听说办一张小报只要三千多，想到此前都是帮别人打工，这次能当一回老板，他自然十分兴奋，于是决定拿出四千多元创办《南京人报》。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张恨水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大到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又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报社便开张了，地址就在今天的南京中山路八条巷口。

1936年4月7日，《南京人报》出版试刊号，张恨水亲自撰写《试刊词》在第一版发表。4月8日正式出版创刊号，四开四版，当天就发行了一万五千份，对于一份新办的小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销量，张恨水个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张恨水不无自豪地说：“办《南京人报》，犹如我写《啼笑因缘》一样，震撼了一部分人士。”

在报社中，张恨水当老板，张友鸾当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张友鸾承担，只有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张恨水请示。这样做，是他们在上海时就商量好的——为了保证张恨水有足够的写作时间。

《南京人报》一时热火朝天，张友鸾说：“每天晚上八点多钟，编辑部就热闹起来。编辑、记者、校对，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往往引时还有不少朋友来访，电话铃声也响个不停，室小人多，于是更增加了紧张、繁忙的气氛。九时许，恨水先生来了，他是来看‘南华经’副刊大样的（他主编这一版）；同时要写两篇连载小说，一篇是《中原豪侠传》，另一篇是《鼓角声中》，每天大约发一千字；还要审发第二天排的‘南华经’稿子。”

这是张恨水第一次为自己的报纸写连载小说，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吸引读者，扩大销售与广告。

创办《南京人报》时，正是张恨水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当时四十开外，身材高大，常常是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张友鸾虽是老板，但张恨水也不是甩手掌柜，在许多事情上亲力亲为，像个拼命三郎。张的小说每天晚上要发稿时才写，写好后，与“南华经”副刊稿一并交付排字房，第二天才来看大样。张恨水写稿时不怕噪音

干扰，尽管临街窗户传过来卖馄饨的小锣叮当声、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汽车喇叭声、马车得得声……但他闹中取静，只顾埋头奋笔疾书。

当时为了办报，从老板到员工拿的薪水很少，总编辑只拿四十元一月的薪水，副社长支薪一百元，还要编一个副刊，又要写一篇小说。普通采写人员，月支二十元。张恨水干脆不拿钱，因为他带头苦干，许多朋友被他感动，也来帮忙，远在北平的张友渔无条件地给他写社论，张萍庐帮他编了一年的《戏剧》，只拿了一个多月的薪水，基本上是友情赞助。

【书生报国】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8月15日，日本人第一次轰炸南京。此后南京人开始跑空袭，看报人渐渐稀少，也断了广告来源，缺少收入，报纸捉襟见肘，员工的薪水很快发不出来，很多人为了抗战仍坚守岗位。随着风声越来越紧，为安全起见，张恨水对家人也作了紧急安排，全部家眷疏散到离城十几里的上新河去住。“我在报社，由下午办理事务和照应版面，一直到次日红日东升，方才下乡。下乡之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放倒头，补足这一夜睡眠。醒来之后，吃点东西，又赶快进城”。

战争越来越近，城里不时响起警报声，日本的飞机不时扔下炸弹，经常听到高射炮射击声，报社风雨飘摇。张恨水一边处理工作，一边筹钱维持运转，二十四小时处在紧张挣扎的状态中。因为焦虑加劳累，不出一个月时间，张恨水就病倒了，患上了恶性疟疾、胃病和关节炎，报社里的事只好交给他人处理，自己回到上新河养病。

最困难的时候，家人和逃难来的亲戚共三十多人，其中有十七个孩子，都靠张恨水一个人维持生计。南京已经没有净土，万般无奈之下，张恨水只好离开南京到芜湖弋矶山医院治病。病快好时，南京已经陷落，一家人在安庆会合，然后逃往潜山县城。“《南京人报》，于十二月初，南京陷落的四五日前停刊。由我四弟负责收束。结束了我自己办报的一页”。

（《写作生涯回忆》）

《南京人报》停办后，张恨水向朋友借了两千元，把机器用木船运到重庆去卖了还债。之后，他又辗转来到大后方重庆，作为知名报

人和著名畅销书作家，张恨水到山城的消息很快传遍业内，各报争相礼聘，《新民报》捷足先登，请他担任副刊主编。张恨水决定把副刊名定为“最后关头”，体现了他书生报国的良苦用心。

由于南京的亲身经历，这一时期张恨水小说风格也为之一变，大多转向抗日爱国题材。他每天写一篇杂文宣传抗日，同时开始构思小说《疯狂》，并为上海报纸创作连载小说《征途》。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把家安在北沟沿甲23号一个四进宅院。此时，《新民报》准备扩大副刊，仍然由张恨水主持，他设计了三个副刊：北海、天桥、鼓楼，自己主要负责北海，内容主要有新旧文学、掌故、轶事综合版。1946年4月4日创刊，后来又增加三个副刊：北京人、新世界、小家庭。还有一个画刊，也由张恨水负责。

抗战胜利并没有给国人带来安宁，随着内战爆发，物价飞涨了一千八百多倍。张恨水把积攒几年的稿费换成十两黄金，存在私人开设的大中银行经理王锡恒那里，以便救急。因为是朋友，连存折都没要，只写了一个收据。此时妻子周南将要生孩子，稿费已经难以跟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张恨水准备到银行取出黄金，等他急着找王锡恒时，只见银行大门紧闭，王锡恒早已带着黄金逃到台湾了。由于轻信，张恨水多年写作辛苦积攒的稿费被骗得一文不名，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

1948年秋天，贫病交加之下，张恨水无奈结束了他热爱的报人生涯。

对张恨水一生的职业生涯，著名报人、老友张友鸾做过一个全面的总结：“他终身职业是新闻记者。做过校对，做过新闻编辑、副刊编辑、做过电讯记者，做过主笔，做过总编辑、经理、社长……所有的新闻工作中，他干得最经常、最长久的，是主编副刊。经历各报，他编的副刊有：北京《世界晚报》‘夜光’，《世界日报》‘明珠’，上海《立报》‘花果山’，《南京人报》‘南华经’，重庆《新民报》‘战鼓’，北平《新民报》‘北海’。”（张友鸾《老大哥张恨水》）



（作者系文史学者）

老舍下厨



1954年老舍在家中与猫合影

文 | 颜坤琰

老舍从小养成了生活颇有规律的习惯，喜爱清洁、整齐是他的一大雅癖。抗战时期，老舍抵达重庆后，辗转迁徙，移住了好几个地方。即使住房是一间陋室，他也总是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犄角旮旯都见不到灰尘、纸片；书籍、衣服、清供、茶杯、文房四宝安放在一定位置，一切显得井井有条。老舍有一人生信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所以，在贫穷的少年时代，他就学会了做饭、洗衣、整理家务。

母亲言传身教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老舍自幼就学会了调羹做饭，有很强的独立生存能力。老舍是满族人，出身贫寒，父亲早逝，一家人全靠母亲替人家洗衣挣点微薄的收入过日子。老舍母亲去世之后，他写了两篇文章纪念母亲。他说：“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老舍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写道：“她们（指母亲与三姐）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我的母亲》）

老舍小的时候，要过年了，看见街上的小朋友举着小塔一样的蜜供，便兴奋地跑回家向母亲报告。母亲拍着他的头说：“咱们钱少，买不起。到时候，咱们自己包饺子吃！”日思夜盼的春节终于到了，母亲和三姐忙着包饺子，小小年纪的老舍也来凑热闹，像模像样地学着包。母亲对小儿子说：“别看这饺子菜多肉少，可是自己挣的，是自己包的，最好吃！”老舍望着脸上布满皱纹、慈祥 and 和善的母亲，微笑着会心地地点了点头。到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一到过节，他便里外张罗，要吃那自己包的“最好吃”的饺子，要亲手做最有北京传统风味的“芥末墩儿”和“豆儿酱”，还要把没有家的单身汉朋友都请来共享。所有这一切，后来都成了规矩。大年初二，一些老朋友相约而来，指明要“芥末墩儿”，老舍把手一举：“味儿很冲！管够！”

乡间自炊自饮

1938年8月14日，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负责人的老舍，携“文协”印信从武汉撤退到重庆，住在市区。重庆是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1940年至1942年间，每到炎炎夏日，老舍就应邀去冯玉祥将军位于巴县陈家桥石板场的冯公馆避暑。冯玉祥十分欣赏这位人品文品俱佳、充满一腔爱国热忱的作家，把他待为客卿。冯公馆的院坝前有一个草木扶疏的花园，花园中有一座两居室的平房，这就是老舍的小天地。冯玉祥为

了不影响老舍的饮食起居和写作生活，欢迎老舍与他们一块就餐，也同意他在小屋内自炊自饮，柴米油盐、瓜果蔬菜、鸡鸭鱼肉，一概由冯将军的副官送来。1942年6月，老舍在写给吴组缙的信《乡居杂记》中记述了自己富有情趣的乡间生活：

每日早五时即起，作太极拳片刻。七时早餐，以鸡蛋代肉，佐以面疙瘩菜叶汤，草草饱腹。饭后，净拭几案，洗砚泡茶；约在八时，开始写作矣。尽十行纸四张五张，在千字左右，停止工作；二年来，贫血症屡发，不敢多劳。午饭后，睡半小时，醒来，读诗答信而已。晚餐后，缓缓行千步，归来，烧土蚊香驱蚊近窗，聚而歼之，引以为快……

他还在《旧诗与贫血》中说：“夏天，能够住在有竹林的乡间，喝两杯白干，诨几句旧诗，不论怎么说，总算说得过来。”老舍在这里写出了著名长诗《剑北篇》，话剧《张自忠》《王老虎》等佳作。

北碚饺子待客

20世纪30年代初，画家桑子中与胡絮青、老舍结识于济南，老舍与胡絮青结婚时，桑子中以画作《大明湖》相赠；1934年5月，《桑子中画集》出版时，老舍写了序言，两人交情不浅。抗战爆发后，桑子中也流亡到了大后方四川，在绵阳县（今绵阳市）国立第六中学任美术教师。

1943年寒假，桑子中来到重庆。1月下旬，桑子中在复旦大学访问张默生教授之后，坐木船渡过嘉陵江到北碚。暮色苍茫中，在北碚街头，在人丛里仿佛听到了熟悉的老舍的声音，急忙看去，果然是他。几年不见，老舍的面容消瘦多了，桑子中几乎不敢相认。流亡年代的游子，遇到了老朋友，当然非常高兴，几乎流下泪来。老舍约桑子中第二天晚上到他家吃饺子，桑子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时，老舍住在离北碚闹市区不远的蔡锷路“文协”宿舍楼上的一间小屋内。桑子中初次造访，见室内布置得简单朴素，整齐干净，案头上放着文房四宝，一切皆秩序井然。此时，老舍正在厨房里包饺子，桑子中是山东人，包饺子也是行家里手，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北方吃饺子好比四川吃汤圆，逢年过节少不了。但是，这顿饺子宴与往年不同，正是在抗战的紧要关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人心惶惶，能吃上掺杂着稗子和谷子的平价米尚且不易，今天居然能吃上一顿家乡美食——饺子，哪能不感谢主人家的深情厚谊呢。老舍一再劝桑子中多来几个，桑子中只顾领会主人的盛情，差点忘记适可而止，吃得肚胀腰圆。

他们边吃边谈，从抗战局势到各自的生活情趣，无所不谈。老舍说，他最喜欢吃鸡蛋，不管是煎、炒、蒸、煮、腌、做汤、还有荷包蛋，他都喜欢吃。桑子中则更胜一筹，腌过了头的臭鸡蛋他尤为喜爱。老舍还介绍了自己规律的生活：早起，在院坝里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虚弱的身体，观赏亲手培植的花木，随后做一顿简单的早餐。餐毕开始写作，直到中午。午睡过后，访问朋友或朋友来访，以及进行其他社会活动，主要是“文协”的活动。晚上读书、写信、看报等。近些年，老舍患有贫血病，常感头昏，于是便早早卧床休息了。但他的生活原则是，今天的事绝不推到明天。由于桑子中也喜欢吃各种不同做法的鸡蛋，也习惯早睡早起，两人有诸多共同之处。

桑子中几十年后还对二人当时的谈话印象深刻，写出了翔实细腻的回忆录。他在回忆文章的结尾写道：“深夜告辞，主人借给我一个灯笼，我用这红纸糊的灯笼，照亮坎坷不平的道路，平安回到茶馆（即白天卖茶、晚上卖铺的茶馆）。”

在美下厨迎宾

1946年深秋，老舍在美国讲学期间，与日本著名女作家石垣绫子夫妇，在一个名为“雅斗”（Yaddo，也译为雅陀）的文创艺术中心里相识。

“雅斗”是一座大花园，占地一万多亩，在茂盛的松树和桤树林子中，有一潭荡漾着美妙涟漪的湖水，俨然一座偌大的园林，清幽而静谧。“雅斗”的主人名叫萨拉托加斯普林（Saratoga Springs），热心艺术。他去世后，继承人便专门用这里来招待艺术家、作家，他们在这如画的胜景中，一边休养，一边创作。

当时，日本作家石垣绫子也在此创作。

她后来回忆，老舍刚来时，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系着一条朴素的领带，“给人的第一印象，与其说是个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教师”。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正住在园内，她在撰写《朱德传》。

其时已是九月底，夏天里曾汇集了二十多位客人的“雅斗”，此时已人稀物寂。除了经常在这里创作的史沫特莱以外，就只有英国作家拉罗夫·贝兹和石垣绫子夫妇。他们很快就和老舍熟悉起来，史沫特莱因为正在撰写《朱德传》，因而与老舍有了更多共同语言。

石垣绫子在《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一文中回忆初识老舍的印象：

我们是在九月二十三日迎来了老舍。那天，秋风阵阵吹过松林，晴空爽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年四十八岁，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系着一条颜色素朴的领带，给人第一个印象，与其说是个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教师。后来我才知道这也是源出有因，老舍本来就在北京任过教，在伦敦留学期间也当过中文教员。

“我要和各位在这里度过三个星期左右，请多关照。”

他谨慎地向我们打了个招呼。老舍不是那种在众人面前喜欢多嘴多舌的人。初看上去他比较谨慎、胆小。可是，在眼镜片深处的瞳孔里却处处透射着自持坚毅的性格。

……

告别“雅陀”，回到纽约后，老舍经常邀请我们：“一齐尝尝中国菜去吧！”（夏姮翔译，载《新文学史料》第3期，1985年9月）

后来，因为种种缘故，老舍邀请石垣绫子夫妇一起去中餐馆大快朵颐的事迟迟未能如愿。直到有一天，老舍给石垣绫子打电话说：“我想请你们吃点我自己做的中国菜。”那时，老舍独自一人住在向友人借来的位于126街区（贫困家庭集中地区）的公寓里。

当石垣绫子夫妇走进寓所大门时，便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阵剁菜的声音，老舍正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他从唐人街买来了一些鸭、叉烧、中国蔬菜、豆腐等，做了几种美味佳肴。他们一边品尝着老舍亲手烹饪的佳肴，一边伸出大拇指，对老舍的厨艺赞赏有加。石垣绫子说：“我们对他的——一手好菜啧啧不已，饱餐

一顿。”这位享誉文坛、著述颇丰的作家居然有如此高超的厨艺，这完全出乎石垣绫子夫妇的意料。这一顿饭，也给他们夫妇俩留下了“中国男人喜欢做菜，并且也很会做菜”的印象。

制饌款待亲朋


老舍从美国回北京后，有了自己的小院。身为北京文联主席的老舍，每年都会请文联的朋友到家中小聚。这天，老舍会亲自下厨，为大家烹饪佳肴。他们认为，老舍喜欢烹饪，应该是在伦敦游学时养成的习惯。

老舍擅长油炸丸子、糖醋排骨、红烧肉、酱肘子、醋溜白菜、土豆丝、莴笋丝、芝麻酱炖黄花鱼。夫人胡絮青做的“芥末墩儿”也颇受欢迎。

胡絮青说，老舍对烹调美食情有独钟，常在家里试制一些北京的市井小吃，油炸丸子是他的拿手好戏。老朋友赵清阁曾说，抗战时期，寓居重庆北碚期间，老舍就亲自下厨炸肉丸子犒劳友人。老舍制作丸子馅料很有讲究，肉馅中要加蛋黄、芡粉，且比例要适当；下锅时油温要掌握好，高了低了都不行，油温适中才能炸出外酥里嫩的肉丸子。

对于老舍的家宴，汪曾祺在《老舍先生》一文中回忆道：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次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汪曾祺小说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老舍先生认为“吃在中国是一件大事”。但他的生活中或作品里，从来没有昂贵的珍馐美味，更多的是寻常果腹的食物。汪曾祺回忆，老舍请人吃饭，端出熬白菜，举起筷子，招呼大家：“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这句话，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作者系文史学者）

“兔子岛”的秘密

——一位反战人士的叙述



日军制造的毒气弹

文 | 张在军

今年，电影《731》于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上映，以侵华日军在中国秘密建立“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为背景，揭露其滔天罪行。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侵华日军的毒气战。毒气战和细菌战为两种不同的作战方式，均属违反国际法的战争手段，统称生化战。“731”部队不仅生产细菌，也生产芥子气等毒气。

15年前，笔者见过一位年轻时参与毒气制造的“鬼子兵”，听他揭秘日本毒气岛的来龙去脉。那是2010年8月17日，日中友好协会常任理事由木荣司率领的广岛民间访华代表团一行来到四川乐山，参加当地组织的“八一九”大轰炸纪念活动。我参与了“广岛一乐山心连心”座谈会，见到成员中最年长者、时年84岁的日本毒气岛历史研究所顾问藤本安马。藤本先生以自己早年的经历现身说法，带领大家走进历史深处。

从地图上消失的岛屿

1940年的一天，日本广岛县。14岁的藤本安马和一大批青春年华的“军国少年”突然被强制停课，被秘密带到一个神秘的岛屿。

在日本列岛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濑户内海，它是连接日本本土三大岛同东亚及西方国家交往的海上交通动脉，其间星星点点散布着500余个岛屿。那个神秘的岛屿，就是位于濑户内海中段、广岛南面海域的大久野岛，又被称为“兔子岛”。

大久野岛属广岛县竹原市忠海町管辖，

面积只有70公顷，周长约4公里，从陆地乘船20分钟就可抵达。岛上绿树丛生，但大部分是山地，最初只有7户种地的农民。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明治天皇把大本营移到广岛的第五师团内，广岛地区就成了重要的军事基地。大久野岛随之被建设成为军事要塞，部署了重炮队，建立了三座炮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岛上的一部分重炮被运到旅顺参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重炮队被撤销，岛上的军事设施就成为军队的仓库。由于这座海岛同陆地隔离，又长期为军队所使用，居民数量一再减少，到昭和初期只剩下4户居民，所以是进行秘密制造化学武器的理想地点。

1927年，日本陆军省命令在大久野岛上建立毒气制造厂，将岛上全部土地征为军用。这一选择是出于多方面的综合考虑：

选择制造毒剂的工厂的位置要考虑到对外部保守秘密和发生废气污水的问题，因此尽量与居民区地带隔绝，但是为作业上的便利距居民地带又不能过远。决定在离东京较远的地方设置这样重要的工厂的理由是：担心天灾和不测的灾害引起危险——毒气的泄露、污染等灾害殃及附近住民的缘故。在东京危险，在地方也同样危险。但是一般的人不知道“危险工作”的实际状况，为了能增加就业的机会，还欢迎兵工厂向自己的家乡迁移。……

在不景气的时代，挣扎在萧条状态下的人们，根本不知道给当地人带来希望的兵工厂在此是制造什么的。但不管做什么，只要

不用担心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就行。当地的人自不用说，就是附近的居民也同样的兴高采烈。（村上初一《毒气岛的历史》）

同年7月1日，陆军兵器工厂在忠海设立派出所，正式开始在大久野岛上建设毒气工厂。建设的第一步是将岛上居民全部迁出，同时将一批批工人派来进行基础建设。接着，军部下令，所有通过该岛附近的外国船只改道；在附近的市、町、村设立“防谍团”网络；小岛四周立起白底黑字“禁止入内”的牌子。于是，整座岛屿就变成了毒气工厂。

大久野岛上最先制造、其后占据生产王座的是“芥子气”。这是一种持久性糜烂毒气，皮肤接触其液滴或气雾后，逐渐出现红斑、水疱、糜烂、坏死，并易继发感染。吸入芥子气蒸气会损伤呼吸道，高浓度下可导致肺组织化学性烧伤、水肿和坏死。若通过皮肤、呼吸道等途径吸收芥子气，将引起全身中毒，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急剧下降和全身多器官损伤。

岛上还生产被称为“死亡之露”的毒气，即路易氏毒气（Lewisite，糜烂性毒气的一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美国发明的，有极强的毒性。例如使用兔子作实验，在去毛的皮上只滴上一滴路易氏毒液，立即被灼成黑色。大久野岛上还开发一种防冻的毒剂，它在-40℃的温度下也不会凝固，用在天寒地冻的我国东北地区以及苏联。另外，生产的毒气还有氰酸毒气（窒息性毒气）、喷嚏毒气、催泪毒气，等等。这些毒剂根据毒害程度不同，用绿、红、黄等颜色作为标记。黄色标记的是毒性最大的糜烂性毒剂，过去，在我国东北各地发现的就是这种。

毒气与生物细菌都是非人道的化学武器，自1899年、1907年诞生两个海牙公约，至1920年代的多个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条约，都禁止生产和使用化学与生物武器。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发展生化武器，完全违背了和平原则与国际法规则。

一个重要而知名的岛屿，在20世纪的近20年间从地图上消失了。据学者武田英子考证，在1932年之前出版的日本地图以及国家的地理测绘资料上，尚有大久野岛的标示，之后便看不到了。直至1947年版及其后的地图或测

绘资料，才重新恢复大久野岛的位置。武田指出：“战时的地图编纂，受参谋本部控制，要塞地带及重要地点消逝之例甚多。”

无法掩盖的罪行

藤本安马和他的同学们“因能边挣钱边学习”来到大久野岛后，就戴着防毒面具开始了毒气的生产工作，在无知无识中，被军国主义政府推进了反人道、反人性的罪恶深渊。

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大久野岛的员工人数由当年9月的194人，激增至10月的1009人，毒气生产进入鼎盛时期。日本整个兵工产业的员工人数（直接生产工和间接生产工总和）由前一年的20467人，增加到88124人。兵工厂当局同年确定了积极地扩大作业的方针，在各个兵器制造所开始了彻夜作业和女工夜间作业。

从1929年正式生产毒气，到1945年这16年间，大久野岛共制造了6000多吨毒剂。据统计，1933年的月产量不过2吨，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岛上的毒气生产量剧增，1942年便达到了月产450吨。另有数据表明，毒气岛共制造了装有绿2号毒剂的毒气筒287902支、毒气弹33700发；制造了装有红1号的毒气筒1597094支；制造了“茶瓶”208000个。如果扣除战后留在日本国内的866954支各种毒气筒，已经装备日本军队的毒气筒或毒气弹共达4669092支（发）。日本战败投降之时，大久野岛及周边地区遗留约3240吨毒气和1.6万多枚毒气弹，这个量足以把全世界人都毒死。

大久野岛生产的毒气武器最早使用是1930年，镇压台湾原住民同胞的“雾社起义”；使用最多的，则是在中国大陆各个战场，对付抗战力量。据研究战争遗留问题的权威专家吉见义明所发现的资料，仅武汉会战之中，日军就至少进行了375次毒气作战。记者北村浩司等人在大规模调查后得出结论，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战使用毒气武器达2000次以上，至1945年战败投降之际，遗留在中国大陆的生化武器多达230万件，化学制剂120吨。但是肯定不止这些，还有很多没被发现。

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内陈列的两份文件记载着日军发动毒气战的史实。其一是《中国使用武器战例教科书》，这是一本日本军校使

用的军国主义教材，里面清楚地记载着防毒、放毒和辨认毒性的方法，同时列举了日军在中国河北、山西等地发动的几场毒气战。其二是美国公开的日本陆军总参谋长载仁亲王1939年5月13日发给华北方面军司令杉山元的密令，令其在山西地区使用“黄剂（糜烂性毒剂）等特种资材”，“研究其作战价值”，并要求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措施“绝对保密”，特别是对第三国“更不能承认”。

其实，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当年7月27日，载仁亲王就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了“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以后又陆续向驻华北、华中各地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下达“可使用呕吐性和糜烂性化学武器”的命令。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大本营直接就使用化学武器发布的命令至少有15项，各级部队又向下级部队下达了更多的有关命令。

同时，为了掩人耳目，日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规定：“为保守秘密，将历来所称的特种发烟筒（即赤筒）、特种发烟弹（赤弹）统称为‘特种烟’；将筒及包装箱上的标记涂掉后再交作战部队使用；交接时应有特别手续，以防遗失；使用时适当混入发烟筒或绿筒，以便掩盖，起到保守秘密的作用；使用之际须不失时机，充分利用，以全歼为目的，不可留下隐患。……”

1938年4月11日，载仁还曾指令侵犯山西等地的日军使用装入迫击炮弹内的“赤筒、赤弹（刺激性毒剂）”，做到“使用毒气时严格秘密，不留痕迹”。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密令如今都成了他们罪行的铁证。

为历史作证

大久野岛的特殊历史，直接影响了其所属行政地域竹原市及整个广岛县的市民思想和社会生活，该地区的和平与民主运动力量格外活跃。1988年，由和平反战人士、毒气受害者以及附近村民出资修建的大久野岛毒气馆落成。日本政府没掏一分钱，而且还几次提出要全部销毁“毒气岛”上的遗迹、遗物，由于毒气受害者和当地村民的强烈反对，这些遗迹、遗物才保留下来。

出任大久野岛资料馆馆长的村上初一，年轻时曾在岛上毒气工厂工作，战后任当地公务员。他结合亲身经历，详尽地收集资料，进行系统的历史研究，连续出版《战争与和平之岛》《毒气岛的历史——大久野岛》等书刊，揭露毒气生产、管理内幕及罪行。村上指出，日本人固然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将战争灾难强加于中国等国家的民众身上，犯下了制造化武等非人道罪行，故包括广岛人在内的日本人同时又是战争“加害者”。村上初一的言论，成为批驳一些日本人“被害说”和反击逐渐高涨的右翼势力的强有力理论武器。

1996年，村上又同广岛地区及竹原市的部分教员、公务员一起，组建了民间性质的“毒瓦斯岛历史研究所”，招募了一百多名志愿研究者。他们时常组织讨论会，编写研究文章，并出版“会报”或文集。

中国学者步平曾前往大久野岛考察，在其中一间库房里，被一个特别的场景吸引住：地面上堆了许多雕刻成小人形的石头，旁边是一串串彩色的装饰，仔细看原来是彩纸折制的仙鹤，足有几千只。在日本，鹤同中国一样是长寿的象征，也是联系现世人间与幻想的仙境的媒介，在此地放置这样多纸鹤是什么意思？步平拿起一串纸鹤，下面布条上字解开了疑问。原来，这是来参观的日本小学生们在思想受到震动后动手做的，意在通过仙鹤祈求永久的和平。在他们的祈愿中，有这样的话：

用我们大家的力量保卫和平

在毒气工厂工作过的工人们

要用我们的力量建设和平的社会

虽然没有见到这些孩子们，但步平仿佛看到了他们一张张幼稚的小脸和一颗颗善良的心。

当年在大久野岛当过三年“养成工”的藤本安马活了下来，成为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顾问。藤本说，战争期间自己虽然没有去中国，但也是加害者，感到惭愧。他说当年参与制造毒剂的人差不多都有后遗症，最多的是支气管炎，患癌症、胃病、肺病的几率比正常人群要高四倍。藤本回忆，当时岛上到处都有宪兵监视，不想干的人马上会被送往战场。厂里工伤事故不断，不断有人在工厂被毒气烧伤，越到战争末期工作量越大，事故也越多。战

后，他们还被迫签了“誓约书”，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出毒气岛的秘密，否则就会被捕，所以在此干过活的人都不敢透露毒气厂的事。

和许多在毒气岛工作过的人一样，藤本留下了后遗症，长期患气管炎，还做过大手术。1990年代初，当他通过电视看到在中国发现的毒气罐时，气得浑身哆嗦，“这就是当年在大久野岛生产的，它还在害人！”藤本了解到，初步调查表明，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使用毒气弹2000次以上，战争结束时在中国各地丢弃的毒气弹约有230万颗，遍及中国十几个城市。他觉得历史没有完结，现在仍是“进行时”。自己作为毒气受害者之前，首先是加害者，于是从1994年开始，沉默多年的藤本安马开始主动为毒气岛上发生的罪恶作证，同时也开始向中国人谢罪。

2004年8月，藤本安马和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同事访问中国，来到北疿村现身说法，揭露日军暴行。北疿位于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境内，为定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42年5月27日，日本陆军华北派遣军第110师团第163联队（联队长上坂胜）所属第1大队（大队长大江芳若）率500多名日军和1500余伪军，包围了北疿村，对钻入地道躲避的平民百姓和武装人员施放毒气，兼以枪杀、烧杀等手段，共残杀同胞800余人，史称“北疿惨案”。

藤本见到了惨案的幸存者李庆祥，紧握着他的手谢罪：“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在那场毒气战中一家八口死去四人的李庆祥平静地回答：“侵略是铁的事实，但日本人民也是受欺骗走上战场的，让我们一起尊重史实、争取和平吧！”

2005年12月14日，藤本安马和以由木荣司为团长的日本“反侵略、誓友好”中国访问团，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邀请，在南京理工大学举行了“藤本安马先生证言会”，控诉日军罪行。


2010年8月17日，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在乐山“八一九大轰炸”纪念日前夕，84岁的藤本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有严重的慢性气管炎，但从第一次到中国回日后释放了压在心中多年的压力，藤本安马精神特别矍铄。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揭露历史真相做一名“证言者”。

他说：“我出生的那一年，日本经济很不景气，而扩张的军费又十分紧缺，所以日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侵略扩张来摆脱困境。”作为一个深受军国主义教育毒害的日本人，藤本认为，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就是让人鬼化的一个过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开始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比如说日本是神之国，为天皇战死是荣耀，男人就应该上战场等等这样的思想。而且随着学龄的增加，洗脑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最后就成了一个完全鬼化的少年，以至于到后来你觉得对外扩张并不是侵略”。

藤本还说：“我以前是鬼，有了加害者的意识才重新变成人；我以前是作为鬼为侵略服务，现在作为人要为真相而战斗。”在乐山的座谈会上，他向与会者透露一个细节，早在2003年他就检查出了胃癌四期末期，也就是濒临死亡了，但就是一种揭露事实真相的信念支撑着他活到现在。他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到中国来，继续为历史作证。

2017年8月13日晚，日本NHK电视台播放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纪录片播放后，引发日本社会的舆论，有的人态度暧昧，看见了却装作没看见。也许他们是在等，等所有人忘记，等所有参与了战争的人老去，等所有受害者死去，等所有知道真相的人离开。而90多岁的藤本安马不顾病痛的折磨，嘴里一直念着：“我要活下去，一直活下去。我死了，就没有人会向中国人道歉。”

2022年5月，藤本安马作为曾经参与制造毒气的“养成工”，在接受日本新闻网（JNN）采访时表示：“我们是被精心培养的养成工，要学化学方程式。忘记毒气的方程式，就等同于忘记自己曾是战争中的一员。即便被要求忘记，也忘不掉，根本没法忘。”他还说：“当被问到‘和平是什么’，我答不上来。必须反思大久野岛制造毒气的过往，不能就这么被一带而过。”他一边与疾病抗争，一边将毒气的非人道性作为“加害历史”，向年轻一代讲述。12月11日，藤本安马在医院平静离世，享年96岁。

（本文根据藤本安马发言记录，并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撰写而成。）

（作者系文史学者）



朝鲜战场上的情报战

文 | 章慕荣

1950年至1951年，在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除了进行激烈的军事对抗外，在情报领域也展开了鲜为人知的较量，打起了没有硝烟的情报战。

识破仿冒的志司信号

美军高度重视情报工作，为各级情报机构配备了先进的设备设施，企图通过压倒性技术手段源源不断地获取志愿军情报，从而在战场上始终占据优势。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作为当时美国政府最大的情报机构，专门从事电子通信侦察工作，负责搜集和分析各国的通信资料，以从海量的信息中找出对方的蛛丝马迹。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也积极参与其中，利用其遍布全球的情报网络收集有关志愿军的情报。

美军还专门成立了侦察中朝军队情报的804部队。804部队战前属于南朝鲜军，朝鲜战争爆发后，划归美军驻韩国总部指挥，成为美军的一部分。804部队设有无线电联队和有线电联队。其中，无线电联队主要通过按中朝军队电报信号特点临时摹制的收信机，对无线电通信实施监听，手段相对隐蔽且效率较高；有

线电联队则主要在中朝军队前沿部队附近活动，使用感应音频收信机、录音机等电磁技术器材窃听电话，为美军提供情报。

美军还利用先进的空中侦察设备，对志愿军阵地、部队调动等情况进行侦察。美军RF-86佩刀侦察机，具备高速飞行和高空侦察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大面积区域进行侦察拍照。同时，美军还派遣亚裔间谍潜入志愿军后方。这些间谍经过严格训练，具备较强的侦察和情报搜集能力，常伪装成朝鲜平民或朝鲜人民军，混入志愿军的驻地或活动区域，秘密搜集情报。

志愿军的情报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所用通信设备也经常因信号不稳而易受干扰。美军凭借先进的电子监听设备，多次严密监听志愿军的通信。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机构于1951年夏截获了一批美军发往华盛顿的电讯，从中分析出志愿军通信存在被美军窃听的可能，便立即向志愿军司令部通报。

志愿军通信处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更新设计了敌我识别暗令，并要求各部队电台相互联络时，必须首先使用一次性敌我识别暗令进行身份识别，确认无误后才能往来通电。但即便如此，狡猾的敌人还是找到了空

子——恰好在这个当口，志愿军60军奉命在二线休整，敌人便利用伪造的志愿军司令部信号建立了与该军的联络。

当时，由于二线休整部队暂无作战任务，与志愿军司令部的电讯往来相对于一线部队要少很多。志愿军通信处起初没有在意，直到中断联络3天后，通信处处长杜牧平猛然发觉存在异常，便让参谋乔俊到60军了解情况。乔俊找到60军通信科科长刘文波，问他这几天为什么一直不与志愿军司令部联络。刘文波非常震惊，再三强调通信科一直与志愿军司令部保持联络，从未失去联系。

我军已采取一次性的敌我识别暗令，敌人伪造并干扰通信联络的可能性不大，60军此时又不在前线，怎么会发生被敌人截断信号的现象？乔俊马上意识到问题可能出在电台上。他拿过报话器，让对方这个仿冒的“志愿军司令部”先拍发敌我识别暗令，对方当然发不出来。乔俊立即校正收发频率，重新呼叫志愿军司令部电台，并拍发敌我识别暗令，对方立即拍了回令。刘文波这才知道，60军这几天居然一直在和敌台联络，险些造成严重后果，不禁吓出一身冷汗。杜牧平当即让3名报务员带着一部15瓦电台赶到60军驻地，重新与志愿军司令部总部建立通信联络。

破获敌特分队

除了通信易被窃听，志愿军在情报搜集方面也面临诸多挑战。由于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志愿军在朝鲜当地获取情报的难度原本就很大，而美军和南朝鲜军还会利用亲美势力和特务组织袭扰志愿军的情报侦察工作。为了应对这些难题，志愿军组建了专业的侦察部队，由经验丰富、素质过硬的侦察兵组成。他们具备侦察、情报分析、格斗、审讯等多种技能，经常深入敌后，伪装成朝鲜平民或敌军，巧妙避开敌人的巡逻和侦察，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志愿军还成立了专门的反间谍组织，加强对内部的审查和对外部的监控，严厉打击敌人的间谍活动。1952年，志愿军在东海岸抓获了一名重要间谍朴北，从他身上搜出了信鸽和情报，成功挫败了美军的一次情报行动。通过

审讯朴北，志愿军还掌握了美军的情报传递系统，为后续的反间谍斗争提供了宝贵线索。

一天，通信处突然接到42军的紧急报告，称他们成功捕获了一个侦察志愿军通信的敌特分队，希望通信处能派人前去了解详细情况。时任通信处处长杜牧平深知此事的严重性，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便趁夜色驱车前往42军司令部。经过一番详细审讯，这个敌特分队的秘密终于被揭开。

原来，这个有11人的敌特分队来自804部队有线电联队，装备的是美式特工15瓦电台和感应音频收信机、录音机等设备，试图秘密获取志愿军反击敌秋季攻势的决心部署、具体计划等重要情报。这个分队的行动十分隐蔽，他们化装成朝鲜人民军的样子，从西海岸登上半岛，平时就在42军后勤部驻地一带活动，通过种种手段骗取附近朝鲜村民的信任。白天他们和朝鲜人民军一样出操、训练，与老百姓的关系也十分融洽；晚上就以巡逻为名四处窃听志愿军的通信，就这样昼伏夜出地在中朝军队的眼皮底下蒙混了半个月之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伙敌特中间有一个来自平壤的年轻特务，想趁夜色潜回家里看看，正巧被志愿军巡逻分队发现，当即被逮捕。经过审讯，这个特务交代了他们侦察分队的详细情况，并愿意带路去抓捕。志愿军立即成立搜捕队展开行动，但当他们赶到时，狡猾的敌特已经提前撤离了。志愿军搜捕队没有放弃，在友邻部队的协同下，连夜派出多路巡逻队围追堵截，最终将这个敌特小分队一网打尽。

杜牧平在参与审讯的过程中，详细了解了敌特分队的装备、任务和活动方式，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情报。他意识到这些情报对于志愿军反击美军秋季攻势至关重要，便立即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进行专题汇报。彭老总非常重视，立刻根据最新情况及时调整作战部署，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敌人的情报侦察活动，彭德怀要求志愿军通信处立刻改进各类反侦察手段，对敌我识别暗令进行不间断的优化升级，并增设通信线路巡逻队，实施24小时机动巡逻。从此，志愿军再也没有出现过被敌人窃取通信情报的事。

（作者系文史学者）



林迈可、李效黎夫妇

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

——国际友人林迈可

文 | 钟兆云

1942年，晋察冀军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身着八路军军装的英国学者林迈可，同行的还有他的中国妻子李效黎。彼时，担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的江一真，热情接待了这对夫妇。

英伦学者眼中的“八路军一把刀”

林迈可，原名Michael Lindsay（迈克尔·林赛），出身于英国的名门世家。其祖父是知名历史学家、神学院院长；父亲则是哲学家，在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担任院长，还是英国上议院议员。林迈可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先于牛津大学研习自然科学，后又涉足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领域。

1937年底，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之邀，他奔赴沦陷后的北平，在燕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并协助燕大社会系主任吴文藻教授，开展牛津大学式导师制实验。经吴文藻夫人、燕大教授冰心建议，他为自己取了中文名“林迈可”。

林迈可生性好动，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教学生活。他常常利用假期，秘密前往华北、冀中抗日游击区，亲身感受中国人民的抗日斗

争。在那里，他先后受到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将领的接见，甚至参与游击队破袭铁路的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林迈可来华途中，在从温哥华到横滨的船上与加拿大援华医生白求恩相识。当时两人在横滨分别，各奔前程，没敢奢望还能再次相见，毕竟一人是前往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一人则奔赴抗日前线。没想到，1938年8月初，他们竟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五台山重逢。初来乍到的林迈可和随行的美国友人戴德华都患上了痢疾，成了白求恩的病人。戴德华急于返回北平，林迈可则与白求恩共同度过了一周时光。他目睹白求恩在战场附近的破庙、戏台、废砖窑里紧张忙碌地抢救伤员，还拍下了白求恩弯腰手术的经典照片。

抗日游击区的种种见闻，让林迈可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充满同情。回到北平后，他如同白求恩一般，毅然投身于支持中国抗战的行动中。凭借外籍人士的特殊身份，他冒着巨大风险，将医药物品、无线电台零件等日军严格管控的稀缺物资，不断送往根据地。这些举动，引起了日军谍报机关的警觉。1940年，他曾在重庆的英国使馆担任新闻参赞半年，之后又返回燕大继续执教。

1941年12月，林迈可从短波收音机里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的消息。联想到日军谍报机关的监视，他预感不妙，果断带着新婚妻子、一同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燕大学生李效黎，以及外籍友人班威廉夫妇，驾驶着司徒雷登提供的汽车，在日本宪兵冲进家门的前十几分钟离开了燕园，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1942年至1944年，林迈可一直在晋察冀军区，全身心投入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工作，并在这期间认识了江一真。

15岁就在家乡福建走上革命道路、参加过长征的江一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医生，有“红军一把刀”“八路军一把刀”之誉，是白求恩眼中执掌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后改名白求恩卫生学校）的不二人选，后来在遗嘱里专门提及他。初次接触，江一真就给林迈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被林迈可写进了文字里：

我们先去了第三军分区司令部，后又去了冀中司令部。这两个司令部彼此离得很近，附近还有一所白求恩医务学校（按：白求恩卫生学校），这样我们有机会和部队医务部门的负责人、“白校”校长江一真先生成了好朋友。他曾是白求恩的主要助手，有着非常令人感叹的经历。江一真是福建人，很小时就参加了红军。开始时在部队里担任“小鬼”工作（即勤务兵），后来跟着一个被俘的国民党部队的医生学医。以后他又从白求恩那里学到了很多。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医务训练，但他已成为一名技术熟练的优秀外科医生。

战斗生死情

林迈可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后，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成为八路军中声名远扬的无线电专家。李效黎在江一真任校长的白求恩卫生学校住院，生下孩子。

彼时，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出身英国贵族家庭的林迈可却毫无怨言，甘愿扎根于此。面对电台急需的关键零件难以为继的困境，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因地制宜，综合利用各种资源，想尽一切办法，确保抗日电台能够持续运转。他主动承担起培养无线电人员的

重任，空闲时还和妻子挂起一方简陋的小黑板，耐心地为电台工作人员教授英语。

当林迈可通过努力让电台发出清晰的声音，成功冲破敌人封锁，将抗日根据地的声音传递出去时，江一真则身背药箱带领卫生队伍，穿梭于山岭沟壑之间，争分夺秒地救死扶伤。江一真十分关心林迈可一家，经常前去为他们检查身体。闲暇之时，他也会凑到人群中，饶有兴致地听林迈可讲解无线电知识、教授英语，笨拙地反复模仿那些生疏的发音，有时逗得林迈可夫妇开怀大笑。

林迈可热爱摄影，为江一真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中，江一真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印度援华大夫柯棣华之子小印华，尽管抱姿略显生疏，流露出的关心与爱护之情，却无比真切。另有一张照片，是江一真夫妇和军区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的合影，尽管当时局势紧张、生活艰难，但他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笑容，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让林迈可深受触动。

面对日军的又一次“扫荡”，白求恩卫校接到转移命令。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黄永胜为江一真和“白校”教职员举办了一场告别宴，林迈可夫妇也受邀参加。

随后，江一真接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与林迈可夫妇的接触也日益频繁。在晋察冀，林迈可走遍了每一个军分区，精心改装整修无线电台，与众多八路军将士结下了深厚情谊，江一真便是其中最为亲密的友人之一。有一次，江一真凝视身穿八路军军装的林迈可许久，笑着对他的妻子李效黎打趣道：要是迈可的鼻子再矮一点，眼睛没那么蓝，那可就完全像个中国人啦。在一次转移途中，一行人与日军遭遇，为了保护林迈可夫妇，近一个班的战士英勇牺牲。后来，战地文工团据此创作了一首悲壮的歌曲《保护国际友人林迈可》，在根据地传唱，成为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

延安的英文广播

在晋察冀根据地相处久了，林迈可对江一真的经历愈发敬佩。两人在一起时，总绕不开一个共同的名字——白求恩。白求恩的遗嘱提及，把部分遗物寄给加拿大、美国的同志及友人，“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

费”，这个“林赛”，正是林迈可。

坦诚的交流，让林迈可更全方位了解了江一真。这位老红军不仅以“酒量和麻将技艺高超”闻名，更展现出一位资深革命者的独立思考与务实作风：

在共产党的组织中，像江一真先生这样的老红军战士，往往比新加入的人员有更多的主动权。如果他们认为党的某些主张是不明智的，也许他们可以试试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有一个时期，共产党中央指示所有的根据地都要尽量实现自给自足。部队的医药卫生部门要减少从日军占领的城市和走私商人那里购买药品，并竭力增加当地中药的生产。江一真坚持认为，在当地制药，需要使用正在全力以赴进行抗日的医务力量，其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何况，同进口药比起来，当地产的药疗效很小，敌后游击区的多数病号患的是疟疾，从外面买来的金鸡纳霜，比自己产的药，疗效要大得多。他的意见被采纳了，并因此受到表扬。

其实，江一真并非反对自力更生。他深知在封锁下，根据地不可能全靠从外面采购药品，自制药品是解决部分需求的必要途径，且实践也证明其作用。他的核心主张在于策略性选择：应集中力量，优先生产那些成本低、易制造且确有疗效的药品。林迈可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学习八路军自力更生的精神。

1944年5月，林迈可夫妇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在这片黄土微尘弥漫却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凭借担任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的见闻和在中国的深刻观察，林迈可提出了关键建议：“必须冲破新闻封锁，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这位“中国通”随即发挥技术专长，用简易材料成功组装出发报机，并架设天线。

同年8月，延安的英文广播开始向世界发声。林迈可加入新华社刚组建的英文部，负责编辑英文新闻稿。他如同呵护婴儿般精心调试自己组装的设备，妻子李效黎则熟练地承担着中英互译工作。当美国情报人员监听到纯正牛津腔播报的中国战场捷报，并确认信号来自延安时，既兴奋，又感到不可思议，迅速将重要内容整理成册报送白宫。新华社的英文电讯，有力地改变了当时美国高层对中国共产党

的抗战认知。

这年10月，根据中央安排，江一真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学习，准备赴苏联深造。得知林迈可用电波冲破封锁、将延安的声音传向世界，江一真由衷地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林迈可爽朗回应：我们虽在不同战线，却都在支撑着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同一个艰难的黎明。江一真看着眼前这对夫妇，忽然幽了一默：迈可和效黎在一起，这就叫当然可以拥有黎明！

林迈可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止于技术层面。早在抵达中国数月后，他就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详尽的局势报告。英国驻华大使在转呈时特别指出：“这份报告提供了我们过去所不知晓的关于延安政府运作的关键细节，如税收方法和‘三三制’的实施。”这些信息，成为英国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

抗战胜利前夕，因林迈可曾有重庆工作经历且李效黎父亲属国民党阵营，夫妇二人前往重庆。中共领导人在延安设宴，为他们饯行。抗战胜利后，基于对中国时局的分析，林迈可预测：“若国民党发动内战，其胜算堪忧……此地共识是蒋介石无法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这些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采取了与美国有所区别的对华政策。

1945年底，林迈可携妻子李效黎及在中国出生的女儿爱丽卡、儿子詹姆斯，举家返回英国。1952年，林迈可从过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伯克勋爵爵位。虽远在英伦，他们始终密切关注新中国的发展。

“第二次握手”

1954年8月，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温斯顿·丘吉尔的继任者）率团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随行人员中，包括曾在抗战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过的林迈可及其夫人李效黎，李效黎在访华期间担任翻译。在北京，林迈可夫妇特意致信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的老友江一真，告知访华消息。这份跨越重洋的问候，也让江一真感受到林迈可在英国政界的影响力。

然而，好景不长。国民党政权驻英国“使馆”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情报，声称林迈可

夫妇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并造谣李效黎是中共党员。这导致两人返英后遭受怀疑与冷遇。英国政府甚至对林迈可当年在延安所受特殊照顾——每月领取四斗小米津贴展开调查，试图追查他从共产党方面获得的“好处”。迫于压力，林迈可一家最终移居澳大利亚，并就此致信告知江一真。

受制于当时环境，林迈可的访华愿望未能实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向世界释放特殊意义后，已定居美国的林迈可夫妇于翌年终于踏上中国土地。但江一真对此不知情，无缘与老友相见。

作为一位活跃的国际社会活动家，林迈可在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生活游历期间，常遇到华侨华裔人士询问他对中国抗战的印象。有感于此，林迈可撰写了《抗战的中共》（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一书，于1975年在英国出版。这部著作连同他拍摄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有力地向世界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侵略者斗争的历史事实。

改革开放后，1983年秋，林迈可、李效黎夫妇自费访华，并明确提出希望拜会老友江一真。对外友协将消息告知已从河北省委书记任上退居二线、担任中顾委委员的江一真。

这引起了江一真的高度重视。他始终铭记周恩来总理逝世前通过罗青长留下的嘱托——不要忘记给中国人民做过贡献的国际友人和其他老朋友。江一真决定在家中款待林迈可夫妇。事前，他特意向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聂荣臻作了汇报。

1985年国庆前夕，时任中顾委委员的江一真收到李效黎的海外来信，表达了她与丈夫林迈可渴望再回中国探亲的愿望。李效黎还提及了回国后的住房与工作需求，表示愿意教授英文。几乎同时，北平沦陷期间曾受林迈可夫妇掩护的中顾委委员钟子云，也收到了内容相似的信函。

为了向中央提交一份扎实的报告，江一真系统性地搜集材料：从公安部调阅林迈可档案；从国家全部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复印台港报刊关于林李夫妇的报道；还建议李效黎提供林迈可的著作。很快，《抗战的中共》以及

《冷战与中国》《和平共存》等书送到江一真手中，他立即组织人手翻译成中文。

在江一真坚持不懈地奔走呼吁下，有关部门终于为林迈可、李效黎夫妇落实了他们作为国际友人的应有待遇。1986年底，林迈可如愿受邀访华。江一真联合吕正操、钟子云等人，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老友们共叙晋察冀和延安的峥嵘岁月，林迈可感慨道：晋察冀和延安都是艰苦的，但那里的信念最明亮。

访华期间，林迈可应邀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他动情回顾了1937—1945年间，作为极少数深入根据地的外国人，亲眼见证并参与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他特别提到，在日寇“扫荡”中，是八路军和当地百姓的舍命保护，才使他们一家得以脱险。

林迈可夫妇还重返晋察冀等故地，欣喜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他们向江一真等老友表达了希望在北京有个固定住所，以便常来常往的愿望。江一真再次积极协调，最终帮助他们解决了住房问题。事后，他欣慰地对秘书说：“这事办妥了，我心里也踏实了。这也是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影响是国际的。周总理生前嘱咐不能忘记国际友人，将来我向他报到，就不会挨批评了。”

这次访问，让林迈可夫妇的名字为更多中国人所熟知。1987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林迈可所著、内容与《抗战的中共》基本相同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一书。

1994年春，林迈可与江一真相隔一月先后辞世。李效黎回到北京，住进了政府为其安排的住所，在故土安度晚年，其回忆录《延安情》1991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200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林迈可著作、更完整的图文版《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图文见证八路军抗战史》。2003年，李效黎回到美国，儿女均已去世，她同外孙女一起生活。作为美国一家著名杂志的驻华记者，李苏珊曾多次采访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2010年，李效黎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他们的故事，始于中国抗战烽火中的相遇与互助，这份超越国界的深厚情谊，历经半世纪风雨，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温暖而永恒的见证。



（作者系文史学者）



“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中国人

文 | 张 玮

1912年4月18日晚，纽约港第54号码头。随着一艘邮轮在远处海平面出现，聚集在码头上的近4万人开始骚动起来。邮轮慢慢驶近码头，码头上原本寂静的人群中忽然传来了一声哭泣。仿佛是开了一个头，哭泣声、哀鸣声、呼唤声开始此起彼伏，很快就让整个码头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中。

即将靠港的这艘邮轮，是隶属于英国卡纳德公司的“卡帕西亚”号——这艘船在4月15日午夜接到了另一艘邮轮的求救信号，率先抵达事故地点。那一晚，他们救上来700多名幸存的乘客。而那艘发出求救信号后不久就沉没的邮轮，叫“泰坦尼克”。

很快，船上走下来的幸存者们就被前来迎接的人群淹没了。这些幸存者的去向也随之分成了几拨：最幸福的自然是已经有亲朋好友等在码头上的，他们拥抱，哭泣，亲吻，然后离开；那些在纽约没有人接的，开始通过各种方式离开码头，寻找旅馆先作休整；一些伤员和病人被第一时间送进了附近的圣文森特医院。有一批重伤员暂时还没法下船。此外，还有6个“身份特殊”的人，他们也没法下船。

很快，一个颇为惊人的消息通过媒体记者——他们甚至事先包了一艘拖船跟在“卡帕西亚”号后面，跟踪采访拍摄第一手资料——传了开来：幸存的还有6个中国人！

“6个，中国人？！”很多人重复这句话

的时候，带着意外、不解，甚至有人还带着莫名的愤恨。

“中国人怎么幸存的？”尽管“泰坦尼克”号上有700多人幸存，其中有各种肤色和各种国籍的人，但“中国人”能幸存下来，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意外。

很快，《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给出了所谓的“答案”：这6名中国人，在沉船时用披肩假扮成女性，在船员高喊“女性优先”的时候，混入救生艇从而得以幸存……他们中的一个甚至还试图剥下一名乘客的救生衣。英国的《布鲁克林鹰报》在1912年4月19日的报道中声称：“没人能说清这些中国人从哪里冒出来的，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了救生船的，但他们却好好地坐在里面。”该报还称他们可能是先藏到了救生艇座位底下，并且有两个躲藏的中国人被活活压死了。《丹佛邮报》则似乎在作出解释：“在中国，他们先救男人，而非女人。”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证人的证词——来自“白星公司”的主席兼总经理约瑟夫·布鲁斯·伊斯梅。伊斯梅一直表示，自己是最后一个登上救生艇的，他说在船上至少看到了4个中国人（或菲律宾人），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就藏在座位底下！”

那么多媒体的报道和所谓的目击证人证词，多少有些抚平了当时对这起沉船事故深表惊愕的西方民众情绪——这样的“事实”符合

他们一贯以来的想象：盎格鲁撒克逊人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表现，依然是那么勇敢和绅士，那些黄皮肤果然自私……

西方媒体的报道也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媒体。《申报》在报道这件事时就写道：“有华人六名，潜伏于救生艇底，直至诸艇升至‘卡配西亚’号后，始经人寻出。”直到1936年，由林语堂任顾问编辑的上海《西风》杂志还发表了一篇《铁达尼上的国耻》：“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

“‘泰坦尼克’号上有6个丢脸的中国人”——这个说法由此传播了100多年。

事实果真如此吗？

求生

时间回到1912年4月14日，晚上11点40分。

三声凄厉的警铃划破了北大西洋宁静的夜空，伴随着瞭望员弗雷德里克·弗利特一声让人胆战心惊的尖叫：“正前方有冰山！”37秒之后，号称“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一头撞上了一座巨大的冰山。

“泰坦尼克”号全长269.06米，宽28米，可以载客3000人，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载人邮轮，也是最奢华的。撞冰山前，它正以23节的高速行驶，因为这艘船的拥有者白星公司希望能创造从英国到美国的最快航行纪录。

撞击发生后，船的右舷和冰山底部碰撞后猛烈摩擦，右舷前部吃水线下的铆钉断裂，所有货舱和六号锅炉房开始迅速渗入海水，受影响范围近百米。

“泰坦尼克”号当初被称为“永不沉没”，是有道理的：这艘船的底部有16个水密隔舱，任意4个进水，都能让船保持漂浮状态。但船上的哈兰沃尔夫公司（“泰坦尼克”号的承建公司）首席造船工程师托马斯·安德鲁在仔细查看了船底的水密隔舱后发现，进水的舱房达到了5间。在确认无误后，安德鲁对史密斯船长平静地说：“这船没救了。”

4月15日凌晨0点5分，船长史密斯宣布放下救生艇。甲板上的乘客开始越聚越多，大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自己搭乘的“永不沉

没”的巨轮，即将沉没。

救生艇通过升降机被缓缓放下，不少乘客慌乱的心情稍稍平复。但此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泰坦尼克”号上所有的救生艇加在一起，只能装进1178人，而船上的乘客加船员，总共有2224人。

0点40分，“泰坦尼克”号出现了第一批遇难者，他们是在底层抢救邮件的船员。海水无情地淹没了他们。

与此同时，救生艇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7号艇成了第一艘被放下的救生艇。事实上，“泰坦尼克”号上配备的救生艇，一艘能装载65人，但当时船员们认为如果装得太满，救生艇放下去时会倾覆，而先上船的人也一再催促放船，所以一开始的救生艇都是只装了一半人甚至不到一半，就被放进了海里。

无论如何，救援工作还是开始了，并且按照严格的命令执行——船的左舷，只能让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艇，船的右舷，在妇孺上完之后，男士可以登船。

有人安静地等待，有人绝望地呼喊，有人野蛮地推搡，有人悄悄地插队，一场场残酷又真实的活剧开始上演。在这样的生死时刻，人类社会的高低贵贱法则似乎依然在起作用：由于相关法规规定，为了防止传染性疾病，三等舱的旅客必须和二等舱、头等舱旅客有一个明显的隔离，而他们的逃生通道上也被设置了一些铁门和障碍，由专人看守。头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允许优先登上救生艇，而三等舱的旅客则必须排在后面。有生还的旅客回忆，甚至



反映“泰坦尼克”号逃生场景的漫画

有船员用枪顶着三等舱的旅客，逼他们先让头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登艇。

正是在这一刻，8个在三等舱的中国人，开始四处寻找生路。

来 历

这8个中国人，是正儿八经的合法旅客。

在“泰坦尼克”号的旅客登记名录上，至今仍清清楚楚地留有当年的记录：这8个人拥有一张编号为1601的三等舱共用船票——这是允许的——价值是59英镑9先令11便士。旅客登记名录上也清楚地记着这8个人的英文名字：Fang Lang, Lee Bing, Ah Lam, Change Chip, Choong Foo, Lee Ling, Ling Hee, Len Lam。按照音译，他们的名字后来被记作：方荣山（当时登记为方朗，后改名），李炳，亚林，钟捷，胡中，李林，严喜，林伦。后来除了少数确认的名字如方荣山等之外，剩下的人的名字，人们至今不知道正确的汉字写法。

这8个人原本受雇于英国的唐纳德轮船公司，是轮船上的锅炉工。当时由于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轮船无煤可烧，所以公司派他们前往美国，去一艘名为“安妮塔”号的轮船上继续当锅炉工。那是一艘“水果船”，来往于美国东海岸与古巴之间做水果运输。

由于当时从英国前往美国的横跨大西洋的船只有“泰坦尼克”号，所以公司为他们8人买了一张三等舱的通票。他们就这样登上了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巨轮。

灾难发生的那一刻，方荣山等8人所住的三等舱位于船头底部，由于通往甲板的通路被封锁，所以他们一开始无计可施。过了一段时间后，三等舱通往甲板的通路被打开了。那时候，“泰坦尼克”号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沉船姿态——船头开始缓慢下沉。

当大家都惊慌地集中向船尾跑去的时候，这几个中国人却跑向了船头。在船头的右舷，有一艘可折叠的C号救生艇。按照船上的规定，左舷的救生艇只能上妇孺，而右舷的救生艇在上完妇孺之后，可以上男性。此时，“泰坦尼克”号已经接近完全沉没，除了已经放下的救生艇之外，C号救生艇是船上的最后一艘了。

在这艘可以承载47人的救生艇上，最终

Ticket Number	PASSENGERS	Adults	Children	Infants	(whether or not contracted to land)	Passengers have	the names of
1601	Ah Lam	1	1			THIRD CLASS	NEW YORK
	Fang Lang	1	1				
	Lee Bing	1	1				
	Change Chip	1	1				
	Choong Foo	1	1				
	Lee Ling	1	1				
	Ling Hee	1	1				
	Len Lam	1	1				
	Sea Ling	1	1				
		52	11				

记录8位中国人名字的名单

只坐了34人，其中包括白星公司主席兼总经理伊斯梅。伊斯梅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指责，但他坚称自己是最后一批上艇的，没有挤掉妇孺的名额，已经仁至义尽。但不知为何，他却坚定地认为船上的4名中国人肯定是自私自利上船的，甚至认为他们是事先藏在座位底下的。

后来证明，李炳、钟捷、严喜和亚林登上了C号艇，胡中登上了另一艘救生艇。林伦和李林没有出现在幸存者名单中，应该是遇难了。还有方荣山，在船沉没的那一刻，他不在任何一艘救生艇中，他掉入了冰冷刺骨的海里。

后 续

1997年，电影《泰坦尼克号》全球热映，但其中被删减了一个镜头：在沉船后的搜救工作中，有一个穿着白色短褂的中国人，趴在一块门板上。所有救生艇中唯一折返搜救的第14号艇发现了他，负责指挥的五副哈罗德·罗伊把他救上了船。这个中国人的原型，正是方荣山。后来，电影出于全片统筹的考虑，删减了这个镜头。不过，导演卡梅隆称，最后杰克和露丝趴在门板上等待救援的情节，就是受到了这件事的启发。

方荣山落海后，找到了一块漂浮的门板，爬了上去。为了防止被海浪颠落，他把自己绑在门板上，以惊人的意志力苦苦撑到了救援到来。但因为方荣山是中国人的身份，一开始救生艇上有不少人嫌弃他，但很快，他们就对他产生了敬佩之情。

1912年5月，一位二等舱乘客、名叫科丽

尔的生还女性在美国参议院作证，她当时就坐在救起方荣山的第14号救生艇上，她回忆得非常详细：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一块门板漂浮在海面上，这一定是沉船时脱落的门。门板上躺着一个小小个子日本人，脸面朝下。他把自己绑在门板上，绳子拴紧在门的活页上。我们看样子他已经死了，门板随海浪起伏，海水冲刷着他的身体，被冻僵了。我们呼叫，他不回应。官员犹豫是否要去救他。

罗伊先生说：“还有什么用，他可能死了，就算没死，与其救一个日本人还不如救别的人更值得！”他本来已经调转船头了，然后又改了主意回来了。日本人被拉上了船，一位妇女揉搓着他的胸前，其他妇女们搓热他的手脚。

没多久他就睁眼了，说着自己的语言，见我们不懂，他就蹬蹬双脚，高举双臂，五分钟后就恢复力量了。他见到身边的划桨人精疲力竭，就推开了他，接过桨，像个英雄般地一直划到我们最终被接应上船。

没错，她误以为的那个日本人，就是中国人方荣山。后来有多份证词证明，方荣山一直奋力划桨，帮助了全船的人。

然而，包括科丽尔在内的所有幸存者，在4月18日晚抵达纽约港码头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包括方荣山在内的6名中国人了——他们没下船。当码头上上演着一幕幕亲朋好友重逢的温馨场景时，在“卡帕西亚”号的舷窗里，有6双眼睛正在注视着这一切。无从得知他们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但看到万家灯火和亲人团

聚的场面，应该还是会让他们感到有一些羡慕——毕竟他们虽然同样大难不死，却远离家乡和亲人。

此时此刻，尽管他们疲惫，贫穷，渴望休息，但他们根本不被允许踏上美国的土地。美国于1882年实施了《排华法案》。根据这个法案，来自中国的华工被禁止入境——哪怕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为美国西部大开发作出了血汗贡献。

6名中国人在“卡帕西亚”号上与重伤员一起住了一晚，就被带到了9号码头送上了船，随后被送去了古巴，他们将被送上那艘运输水果的“安妮塔”号，继续当锅炉工。

余 絮

这些中国人的诉求，是卑微的。1913年3月，纽约南区法院接到了一桩索赔诉讼，6名幸存中国人中的5名，在律师的帮助下，向“泰坦尼克”号隶属的白星公司提出了索赔。其中索赔金额最高的是钟捷，索赔172.14美元，最低的是严喜，索赔91.05美元；5个人损失的东西基本都一样：穿在身上的衣服。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对随身损失现金的索赔——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多报一些，但每个人都如实填写，没有一个人报的现金损失超过7英镑。作为对比的是，记录显示，“泰坦尼克”号上有一个生还的夫人，她提出的索赔金额是27888美元。

那些索赔清单，是这些幸存的中国人留给公众的最后痕迹。之后，他们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直到百年之后，纪录片团队千辛万苦地追寻到了其中几个人的下落：

李炳，后来去了加拿大，开了一家咖啡馆；

严喜，作为水手后来在印度下船后，不知所终；

钟捷，1914年死于肺炎，葬于英国伦敦；

方荣山，1920年以海员身份重返美国，成家立业。

其余的人，有的最多被追踪到在古巴有过短暂记录，之后都不不知所终。

然而，在这100多年时间里，关于“6名肮脏的中国人用无耻的手段偷偷上了救生艇”的媒体报道，在西方世界一直流传。好在，随着



“泰坦尼克”号的救生艇



《六人》纪录片海报

时间流逝，随着一批又一批人去追寻答案，真相渐渐浮出了水面：100多年前的那天晚上，这6名中国人完全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正相反，其中有的人还应该被视为英雄。

让这6个中国人“沉冤得雪”的这件事，要感谢两个人。一位是美国人史蒂文·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海事学家，旅居中国。他在研究英国水手的历史时，发现了“泰坦尼克”号上有8名华人这一线索。一位是英国人，中文名字叫罗飞（Arthur Jones），旅居中国。他从好朋友施万克那里了解到这件事后，立刻产生了很大兴趣。两人随即开始筹备拍摄一部纪录片。

这是一场艰辛的拍摄。摄制组走遍了芝加哥、威斯康星州、多伦多、伦敦、香港和台山等地寻找各种线索，寻访那些中国人的后人。在威斯康辛州，摄制组找到了方荣山的儿子方国民；在中国，他们找到了方荣山的外甥孙朱红品。

一条条线索、一块块记忆碎片，被摄制组耐心仔细地拼接了起来，并且力求任何一个推测和结论都经得起考验。为了感受方荣山当时落海后遭受的痛苦和惊人的毅力，摄制组专门搭建了一个零下2摄氏度的水池，罗飞亲自跳进去记录温度和身体感受。为了证明4名中国人不可能事先藏进C号救生艇，摄制组专门以一比一的比例搭建了这艘救生艇，并请北京一所中学

的34名学生坐了进去，模拟当时的情景。真相终于大白：在狭小的座位底下，根本不可能躺下一个人而不被发现，事实上，如果有人藏在座位底下，坐在上面的人连脚都没有地方放。他们还专门请来了《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担任纪录片的监制。最终，这部名为《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THE SIX）的纪录片于2021年4月16日在中国大陆公映。

虽然并不是有很多人知道这部纪录片，但它已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下了一个锚：关于“泰坦尼克”号上幸存的6名中国人这件事，会被这个锚牢牢固定在应有的位置，呈现本来真实面貌，再也不会以讹传讹。


看完整部纪录片，有两个关于幸存者方荣山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纪录片摄制组在采访方荣山的后人时，后人回忆起方荣山写的一首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另一个来自方荣山儿子方国民的回忆：当时方国民4岁，已经生活在美国。方荣山带着他一起去租一套房子。房东打开门，打量了他们，说了一句：“我怎么可能把房子租给你们这种卑鄙的黄种狗！”方荣山听了，二话不说，一拳就砸在了房东的脸上。方国民说，那房东当时就跪了下来。中国人崇尚隐忍，善于自嘲，提倡宽容，但在被深深伤害和侮辱的时候，并不会放弃抗争和反击。但有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更多技巧和表达方式，让更多人能够拨开迷雾，看到真相。

在这部纪录片的结尾，方国民的儿子在摄制组的牵线下来到英国，拜访了当年救了方荣山的那位五副罗伊的孙子。两个后人看了罗伊当年的很多资料，然后紧紧握手，罗伊的孙子很感慨：“这个圆终于画完整了。”

这一刻，让我想起了1912年5月，那位叫科丽尔的女士在美国参议院的证词。她在证词的最后一段，回忆了当时船上罗伊看到方荣山拼尽全力划桨后说的一句话——之前罗伊说过不如放弃方荣山的话——“我看到罗伊先生惊讶得目瞪口呆，他嘟囔着：‘啊呀，我真不好意思说了那些话。只要有会，我保证还会救他！’”



（作者系作家、资深媒体人）



孟宪承：中国现代教育的探索者和开拓者

文 | 张 砾

2006年5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遴选出第一批共18位“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他们的思想言行对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有的曾任中国著名大学校长，有的曾任教育部领导，有的是国内乃至国际的顶尖科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孟宪承便是其中之一。

“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孟宪承，字伯如，又字伯洪，1894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武进区）一户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早年去世后，母亲杨氏便将他带回娘家抚养。杨家是常州当地望族，家学渊源让孟宪承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最初，母亲教他读书习字，他6岁时送去私塾上学，后来进入常州府小学堂读书。幼年孟宪承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陪伴母亲和刻苦读书上，杨家人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用功的孩子，夸赞他“真是孟夫子家的后代”。

1908年，14岁的孟宪承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预科，因为学习刻苦和成绩优异，直接升入中学部学习；4年后又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校，是当时公认学习英语最好的地方。圣约翰大学教学要求严格，每年的毕业率很低，孟宪承入学时，同班同学有20多人，到了毕业时

获得文学学位的仅8人。学习刻苦认真的孟宪承读书期间成绩一贯优异，“试必冠其曹，恒以退还学费为奖”，在获得学位的同学中名列第一。当年他的同窗中还有后来成为中国现代作家、语言学家的林语堂。

1916年，孟宪承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北上来到清华学校担任中等科英语教员。清华学校是庚款公费留美的预备学校，而走出国门，“藉资历练，稍获新知”正是孟宪承长期以来的愿望。1918年，他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进入华盛顿大学，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主修教育学，辅修哲学。1920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他又转赴欧洲，到英国伦敦大学继续深造，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和教育哲学。后来因为需要工作挣钱养家而不得不中断学业，于1921年11月回到国内。

孟宪承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祖国的崛起和民族的强盛始终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回国后，孟宪承受聘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教育学教授，开始投身于教育改革和教育理论建设，并很快成为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在中国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他始终走在教育改革的前列，与其他教育家一起共同引领潮流。1923年，受黄炎培之邀，孟宪承参与创办并主持《申报》教育学术专栏“教育与人生”。1929年，孟宪承受聘为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委员，负

责制订《实行整顿并发展全国教育之方案》，并与诗人、文学史家刘大白等人草拟《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语文科的初中部分，与胡适等人草拟高中部分。1933年1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孟宪承被选举为15名理事之一。

1923年，孟宪承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回到母校担任国文部主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爱国学生运动浪潮迭起。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也组织罢课等抗议活动，但遭到校方阻挠。孟宪承不顾个人前途，与卜舫济据理力争，并率领中国籍教师坚决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

后来，校内发生了“国旗事件”：在师生们的争取下，卜舫济被迫同意学生罢课、降半旗向死难者致哀，后又出尔反尔，擅自撤去学生们在校图书馆前升起的国旗。当学生代表前去向卜舫济索要国旗不得、取出自备之国旗悬挂时，卜舫济突然冲出来夺走国旗，并挥手驱赶学生。之后，卜舫济宣布学校提前放假、禁止集会、学生即日回家等强制性措施。孟宪承与钱基博等教授在调解学生与校方之间的矛盾无果后，为了抗议校方的无理规定，登报声明集体辞职，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而后，他愤然率大学和附中部分师生500多人离校，表达对校方及其背后外国教会势力的强烈抗议。

此后，孟宪承信守诺言，拒绝和外国教会学校再有任何来往，也没有再回到母校任

教。他还拒绝工部局的礼聘，不去担任待遇优渥的华人教育总管。这次事件让孟宪承彻底认识到，“国民教学之不可寄托于外人也，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

秉持这样的信念，离开圣约翰大学后，孟宪承联合一些教育界人士，在短短三个月内，发起筹备创办了光华大学，寓“光我中华”之意。1951年10月，在大夏大学（由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300余名师生于1924年在上海发起建立）原址上，大夏大学文、理、教育学科与光华大学相关系科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孟宪承出任第一任校长。20世纪50年代，他与历史学家吕思勉同为华东师范大学最早的两位一级教授。

“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

通过高等教育培养精英人才与通过民众教育启迪民智，是孟宪承认为“教育救国”的两条途径。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探索者和开拓者，他不仅在高等教育理论领域成绩斐然，同时也非常关心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实行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新式教育已有一段时间，但社会发展和民众生存状况依旧不见起色。不少学者开始反思，要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必须依靠民众力量，而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规划势在必行。学者们纷纷走出象牙塔，到城市和乡村开展民众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20年之久，从最初的城市平民教育运动逐渐演变为轰轰烈烈的乡村教育运动。

1936年夏秋之际，孟宪承前往江苏无锡，主持“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开展以一个自治区域为单位的民众教育实验，围绕培养民众的基本能力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开展学校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地方自治与自卫、卫生保健、移风易俗等方面的民众教育试验和社会推广。

孟宪承对城市和乡村民众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前后历时8年。对于民众教育，孟宪承有着自己独特的理念和方式。他觉得农村的问题在于农民不会过自己的生活，因此民众教育就是“使民众能适应其继续不断的生活”。



孟宪承1916年大学毕业照

他分析说，民众是绝大多数的直接生产劳动者，他们每天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是劳动，小部分时间是休闲。他们劳动为的是维持生计，休闲要的是一点娱乐。他们最需要的教育，是“增高生计的知能”和“满足娱乐的兴趣”。

孟宪承认为，教成人识字读书，要从他们的工作和娱乐活动出发，呆板的教科书式教学，不如“先教成年民众看洋钞票上的字，看路上布告招牌的字，教他们记账、写信、开发票”。他主张举办“民众职业补习学校”来教育民众维持生计，“乡村注重农业补习，县市注重商业补习”。他还主张“用艺术的手腕”让民众的闲暇时光更有意义。于是，他在江苏无锡的“北夏普及民众教育实验区”设立民众茶园、俱乐部和图书阅览室，组织戏剧、曲艺、国技和民众音乐会，以及巡回电影放映等活动。

“大学三理想”

孟宪承读过旧式私塾，上过西式学校，还曾留学欧美，这样的经历让他既中西贯通，也让他能以国际眼光审视中外教育。他的民众教育理念是接中国地气的，而他的高等教育理念则是站在人类教育史的高度，思考中国现代大学的未来。从1921年任教于东南大学起，孟宪承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几乎都与大学相关联，他主要担任教育学教授。因此，对大学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

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孟宪承的重要代表作《大学教育》。书中从大学的组织、管理体制、学位和教学制度等方面，探讨中国大学有别于西方大学而应具备的精神，呼吁大学成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推进器，参与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孟宪承认为，大学作为最高学府，其“高”不仅是处于教育体系的高层，而是因为人类将智慧运用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它代表了人们最高的努力。因而，大学的理想，包含着人们对于文化和社会的最高理想。

孟宪承心中的“大学三理想”包括：“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学的三项任务，即研究、教学和推广。“智慧的创获”是大学的最



1951年，孟宪承校长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

高理想，大学之精神首先在于发挥研究精神，致力于发明创造。“到现在，没有哪一国的大学，教师不竞于所谓‘创作的学问’，学生不勉于所谓‘独创的研究’。”因此，“研究”是大学的最高任务。对于“品性的陶熔”，他引用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话来解释：“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和少壮，而谋成熟的知识与生命的热情的融合”。因此，师资的培养十分重要，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大学的根本，同时还必须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对于“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这一理想，孟宪承认为，大学义不容辞地承担着用文化来推进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必须将其创获的知识推广于学校围墙之外，由此实现对民族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孟宪承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著作等身。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即便孟宪承已经身为一校之长，事务再繁忙，也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以教书育人为乐事。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他的要求很明确：“一是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多接触前人的历史文献，二是要读一手的文献资料，知晓中国文化的源流，只有把握源，才能理解流，才能在学术界立稳脚跟，才具备发展的潜力。”孟宪承曾形象地说，吸收别人的花果，而自己却没有生长能力，结果还是不行。原始材料很多，古代原著又多是文言文，初学者不易得其门而入。大家可以结合课程进展阅读一些教育文选、资料选等书籍。

由于学识渊博，旧学功底深厚，孟宪承授课条理清晰，简明精要，对史料信手拈来，深深吸引着学生们。当时曾是他学生的梁实秋多年后回忆他的教学：“孟先生凝重细腻。”1931年2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将已在浙江大学任教授的孟宪承请来担任院长。6月，由于数月来“京杭分驰，身心交敝”，孟宪承向时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提出辞去院长职务，引发学生“不满”。教育学院学生会代表全体学生致函朱家骅，恳请孟宪承继续担任院长且不再兼任他职，可见学生对他的爱戴。

才识与风骨

孟宪承作为近现代知识分子中最有号召力和实践精神的人物之一，他的才识与风骨受到人们的钦佩和敬仰。认识孟宪承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很强的自尊心，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生活中，他宁静沉稳，睿智儒雅，又淡泊随和，处世行事十分低调。

孟宪承总是穿着夫人谢纫惠手制的布鞋，即使出洋，外面套的是西服，里面穿的还是妻子手缝的粗布衣服。他的早餐必定是妻子用铁丝夹在煤气灶上烘焦的面包，加上一点奶油和一杯牛奶。在旧上海，有一次，孟宪承去看牙医，因为身着土气的布衣而受到身旁洋人的轻视。候诊时他拿出外文书来看，洋人见了过来搭讪，没想到他以一口纯正的英语作答，让洋人顿时刮目相看。

孟宪承从不随意评判别人，但他对认真

读书、研究扎实的人常会毫不吝啬地赞赏。孟宪承与吕思勉是同乡，也是互相敬重的挚友。当时住在苏州的吕思勉，每次到上海上课，必定要去拜访孟宪承，在孟家品尝“孟太太的菜”，而后与孟宪承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两人总是交谈甚欢。吕思勉去世后，便很少有人能够与孟宪承一起做如此自由而深刻的学术探讨。老友离去让晚年孟宪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落寞的心境。

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也是江苏常州人，他曾经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读书。他对孟宪承十分敬重，认为孟先生是自己的恩师。晚年，周有光依然不忘孟宪承先进教育思想，对他的教育实践由衷赞赏。

孟宪承一生先后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光华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后，他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并任第一任校长，直至去世。在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孟宪承始终兢兢业业，把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探索和建设。

1967年7月19日，孟宪承逝世。“从古不知有多少‘悲天悯人’的教育家，耗尽了他们的心力，甚至贡献了他们的生命，才把我们的教育史，装点成这样的灿烂庄严”——孟宪承在《新中华教育史》中写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教育人生的最佳注脚。

（作者系文史学者）

欢迎订阅2025年《作家文摘》合订本

—— 2025年第9期要目 ——



全年订价200元



【纪实】

毛泽东的数字思维
密战中的红色夫妻
亲历滇西细菌战

【文史】

宋代女性的择偶标准
百年前的“爱情大讨论”

民国史上最强的外交使团
文学家的衣着

沈从文《忆玉兰花》之谜
宫崎骏与百年文坛悬案

【忆文】

高洪波：我的文坛师傅们
张学良的亲学生

邮发代号：82-321 拨打 11185 或至全国各地邮政营业厅均可办理订阅
咨询电话：010-65000042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抗战中的捐机者

文 | 王厚明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中国能作战的飞机只有305架，而日本陆海军共有飞机约2700架；而且，日本具有完整的飞机生产线，而中国所有的飞机都需要进口。尽管中国空军将士顽强奋战，在1937年开战的头4个月就击落了230多架日本飞机，但中国空军同样损失惨重，到1937年12月南京陷落时，中国空军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由于战机敌众我寡，日本军机四处肆虐，频繁轰炸我前方阵地和后方无辜居民，中国人只有挨炸的份，完全是凭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钢铁炸弹。因此，中国军队的当务之急是购买更多的战机，夺取制空权。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于1933年5月组建“全国航空建设协会”，负责充实空防，发展航空建设事业，以及经收各地汇缴的飞机捐款。其时，物资匮乏，人们连温饱都没法保证。但在1932年和1936年分别开展的“航空救国”“献机祝寿”运动，以及各省市开展“一县一机”活动的背景下，海内外华人民众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阶层，纷纷慷慨解囊，为国捐机。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人们的报国热情更加高涨，由此也涌现了一大批贡献良多的仁人志士。

【华侨踊跃响应】

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1937年10月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并任主席。他出面联络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南洋800万华侨为祖国出

钱出力支援抗战。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还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

在陈嘉庚的积极推动和影响下，华侨踊跃捐款、捐物、捐机。菲律宾华侨为国献机的气氛异常热烈，除了一般侨团商会捐机外，华侨庄东里个人单独捐献飞机一架；侨校中小學生集资捐“学生”号飞机一架；华侨妇女捐“妇女”号飞机一架；连马尼拉屠宰业的华侨和小杂货店店员亦集资各献机一架，合计下来，菲律宾华侨共捐飞机50架。缅甸爱国侨领梁金山捐赠了80辆卡车和一架飞机，认购了一半以上云南发行的“救国公债”，还坚持每月捐款直至抗战胜利。

在大洋彼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华侨募款购买军用运输机8架，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献给祖国。1942年，美国俄勒冈州“华侨救国统一会”筹款后，买了3架战斗机，供中国训练航空生使用。斐济群岛仅有华侨2000人，也为祖国献机3架。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至1940年10月，全球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多数为南洋华侨所捐献。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于1937年至1945年中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1.6亿多元（国币）；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捐款高达7.7亿元（国币）。

【边区捐机】

黄正清，藏族，藏名洛桑泽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采玛村人。早年习读汉文。1920年，黄正清和父亲随着弟弟第五世嘉

木样活佛（汉名黄正光）从四川到甘南拉卜楞寺，协助处理寺内事务。1926年前后，黄正清组建“甘青藏民大同盟”，任番兵司令部游击司令、拉卜楞保安司令。

抗战爆发后，黄正清和嘉木样活佛多次利用身份鼓舞边区人民抗日救国。1943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六周年纪念日，嘉木样活佛发表了题为《为宣传抗日告蒙藏同胞书》的演讲，动员各族人民参加抗战，成为著名的爱国宗教领袖。

1943年冬天，嘉木样活佛委派其兄黄正清组织了一个名为“拉卜楞致敬团”的团体，亲自率领队伍前往重庆，向政府捐赠了90万银元，用于购买飞机。当时，一架飞机的价格约为3万银元，可购买30架。据当时报刊记载：1944年1月9日，由团长黄正清向国民政府“（一）献‘哈达’，（二）献机三十架，（三）献方物……创造了‘边民向国家献机的记录’”。这一举动立即在重庆引起轰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蒋介石特意接见了黄正清等人。除了颁赐拉卜楞寺“输财卫国”匾额外，还任命黄正清为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正清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国共两党的“双料少将”。

【杜月笙捐机】

杜月笙早年投身黄金荣门下，后自立门户，涉足金融、航运、报纸、影视等诸多行业，是上海滩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积极投身抗战，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在上海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救治了数万名受伤的中国军民。同时，杜月笙还出钱出枪参与组建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配合中国军队对日作战，2000多名弟子伤亡。

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蔡廷锴血战淞沪，杜月笙和史量才等人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月笙任副会长，办公地点设在福照路181号。杜月笙带头为十九路军募捐，亲自开车为十九路军军部运送食物。

1935年，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控制的飞机总数不过150架。就在这一年，杜月笙出资向美国柯蒂斯-莱特公司订购了120架军用飞机，全数捐赠给国民政府。

为了响应“航空救国”运动的号召，杜月笙组织了“航空宣传周”，通过报纸、商会、学校向民众大力宣传，鼓励同胞积极捐赠。同时，他还决定以个人名义捐赠4万块银元，从国外订购两架飞机，赠予上海飞行社，用于专门训练和培养青年飞行员。1937年3月18日，杜月笙捐赠的飞机“月辉”号、“月文”号，以及另外两架由吴蕴初先生捐赠的“天厨”号、“天厨”副号，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了命名捐赠典礼。“月辉”号由杜月笙的门生孙桐岗驾驶，“天厨”号则由“空军战神”高志航驾驶，分别进行了飞行表演。

【吴蕴初用公司营利购机】

吴蕴初，上海嘉定人，原名吴葆元，近代化工实业家、我国氯碱工业创始人，在我国创办了第一个味精厂、氯碱厂、耐酸陶器厂和生产合成氨与硝酸的工厂。

目睹日军铁蹄肆虐神州大地，一腔爱国热血的吴蕴初积极支援抗战。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吴蕴初带领天厨员工为前线输送军需品及慰问品，同时和技术人员积极研究战争中的化学技术，与康元制罐厂合作制造防毒面具，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1932年底，吴蕴初在欧美各国考察参观时，有感于各国“咸均讥吾国只有假名考察，而无购机图发展航空者”，于1933年决定将天厨厂1932年度的营业利润9万余元，加上他自己及股东张逸云先生捐献的2万元，共计11万余元，通过德国禅臣洋行购买了一架德国容克K-47攻击机，送给中国空军支援抗战。

1933年，这架容克K-47攻击机成功进口，由容克斯公司派驾驶员试飞，其间不慎误落机场外的农田中，飞机损坏，只好运回瑞典工厂返修。一个月后，飞机修好，但已经不能算是新机，且延误了交货日期，厂方便奉送了一架容克A-50教练机作为补偿。随后，这架容克K-47攻击机被命名为“天厨”号，容克A-50教练机被命名为“天厨”副号，在命名典礼后分别送给了中国空军和中国飞行社上海分社。

【关德兴义演捐机】

关德兴是著名艺人、武生，祖籍广东开平，生于广州，后改名“新靚就”。关德兴早年参加祝华年和大罗天剧团等演戏，以武技出众大受好评，有“生武松”之誉，后来又以中年黄飞鸿的形象为观众所熟知，在海内外享有盛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香港同胞积极行动，准备募捐2架飞机。关德兴积极响应，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自己的“士刁必驾”小汽车，上书“新靚就捐出此车，响应献机运动”。

关德兴心怀“粤剧应该上火线”的信念，走出香港，四处募捐。1938年底，他赴美国筹募抗日基金，不惜放下粤剧名伶的身段在街头卖艺，“神鞭灭烛火”“飞刀绝技”“拉硬弓”“大寒天赤膊”等节目轮番上阵。义演之外，他还联合一些爱国华侨成立了“三藩市救国总会”，专门负责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义卖也同步举办，他连自己珍贵的结婚金戒指也捐献出来义卖，华侨深受感动，纷纷解囊捐助。

在关德兴的努力下，1937年至1938年两年间，30万美元如江河汇聚，香港同胞原本计划捐赠的2架战机增至7架，外加7辆救护车、32箱寒衣。关德兴因此被誉为“爱国艺人”，郭沫若曾赋《水调歌头·赠关德兴君》一词赞扬他的爱国精神：“国内劳戎万里，海外征捐千户，此气似虹岚。兴亡匹夫责，岭表此奇



关德兴年轻时

男。”日军方面下令悬赏4万元军票追杀他，他都不为所动。

【西域爱国志士沙里福汗】

沙里福汗·精思汗，哈萨克族，新疆阿勒泰人，出身于贵族世家，其祖上库库岱家族世为克烈部落的统治者，曾被清政府封为“镇国公”。

1937年12月15日，时任阿山区（主要指阿勒泰地区）行政长的沙里福汗在《阿勒泰新新疆》杂志发刊词上发表文章，号召阿山各族人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祖国统一，支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沙里福汗的带动下，1939年，阿勒泰地区人民共捐献了5架飞机、100匹马及20多万元，另外还有大量皮袄、皮鞋，支援抗日前线。这5架飞机被分别命名为：“新疆承化”号、“吉木乃”号、“布尔津”号、“哈巴河”号、“布伦托海”号。阿勒泰地区人民积极支援前线，体现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

【湖南居全国之冠】

抗战时期，为国捐机者形形色色、千千万万，上至中央要员，下至黎民百姓，归根到底都出于一颗爱国心。飞机的名号也因此五花八门，“银行”号、“学界”号、“盐工”号、“记者”号、“妇女”号……各种名号的捐赠飞机不断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在“捐机”运动中，湖南的贡献被誉为“居全国之冠”。在衡阳，船山中学的童子军队员伍文章、周恒等人，向全国发起捐献“中国童子军”号飞机，并发动本校童子军队员节衣缩食，共献金1931元；私立陶淑小学发起筹募“儿童”号飞机，致电全国小朋友，节省糖果费，响应运动；泉溪一位85岁的李老太太将家中2万银元全部捐出。在长沙，“献机”最多的是湖南第一纺织厂，至1943年1月，员工共捐献飞机15架。

“捐机”运动轰轰烈烈，是抗日救亡中感人的一幕。如今，硝烟散去，国力日渐富强，唯爱国情怀不变，在奋进的航迹中闪耀着民族精神之光。📖

（作者系文史学者）



林国祥

林国祥：矢志一生捍海疆

文 | 王 戡

1909年6月，清政府广东水师巡阅南海，是中国近现代海洋史上的重要事件。巡海105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刊发文章称，“这是对西沙群岛实质性的行政管辖，效应巨大，意义不凡”。1993年4月，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其中一处岛礁命名为“李准滩”——纪念领导这次巡海的清政府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李准却把功劳给了另外一个人，他回忆，“此次之探险，以极旧行不过十海里之船，数百人之生命，付与林瑞嘉之手，实乃天幸，非尽人力可致也”。（《李准巡海记》，《申报》1933年8月16日）林瑞嘉，即林国祥，是此次巡海的航海总指挥。同时，他还是极少数参加过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巡阅南海三大近代海军军事行动的海军军官。

【驾驭“海上巨兽”者】

1867年，清政府在福州马尾设立的船政前、后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课程上，前学堂以造船为主，后学堂以驾船为主。后学堂的创立，比日本海军操练所还早了2年，海军史学者陈悦称之为“东亚国家设立的第一座规范化的近代海军军官学校”。

后学堂第一届学生，是中国第一批系统接受近代海军教育的年轻人，其中不少人在中国海军史乃至近代史上留下了名字。翻看同学录，可以看到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日后血战黄海的北洋海军舰长，还有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担任过驻英国公使的罗丰禄等。

林国祥也是这33名毕业生之一。

林国祥列籍广东省新会县（今新会区），他的父亲早年下南洋，在马来亚槟榔屿经商致富。1851年，林国祥出生在槟榔屿，是家中第二子，少年时被送回广东读书。1867年，福建船政前、后学堂开始招生。后学堂原本只招收福建籍学生，但传统士人家庭不愿将子弟送上学“洋学”，于是后学堂将招生范围扩展到通晓英语的广东籍学生，林国祥以及正在上海洋学堂读书的邓世昌等人投考入选。

5年时间里，林国祥等人不仅学习英语、代数、航海学，还登上训练舰担负观测、测量、驾驶等任务，北上上海、烟台、天津、牛庄，南下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外国教官特别在“台风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定如何”，训练他们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

当时洋务运动兴起，沿海省份已经开始改革传统水师，外购蒸汽轮船，承担缉捕海盗、巡逻海岸的任务。但由于缺乏海军人才，往往采取中国武官担任管驾、外国船员担任船主的模式。后学堂毕业生出仕后，迅速改变了这一境况，驾驭起这些被视为“海上巨兽”的军舰。

1873年，从后学堂毕业仅一年的张成，担任炮舰“海东云”的管驾，晋升速度之快令人惊叹。第二年，23岁的林国祥出任福建船政新造炮舰“琛航”号的管驾，成为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中的第四名舰长，邓世昌是他的大副。

这一年，日本借口台湾民众杀死琉球船民一事，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林国祥指挥

“琛航”号往返大陆与台湾之间，担任巡航和运输任务。事后停泊上海期间，《申报》报道了船上景象，“该船到沪后适有西人赴船游览，谓其气象严整，修治清洁，督饬工役，训练士卒，井井有条”。

1875年，清政府筹议海防，决定将新式海军建设的重点转向北洋。福建水师的发展速度逐渐落后。林国祥还在指挥千吨级木壳炮舰的时候，他那些前往北洋海军任职的同学，已经开始接管更新锐的战舰：刘步蟾赴德国监造船只回国，后来担任巨舰“定远”号的管带；邓世昌赴北洋后，成为英造装甲巡洋舰“扬威”号的管带。

不过，比起北洋海军的同学，林国祥将更早接触真正的海战。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近代中国海军第一次海战即将到来。

【马尾海战的耻辱】

没有人会想到，中法两国军队在越南北部的地面交战，会影响到集中在马尾附近的福建水师。1884年，法国因战事延宕，和谈屡屡不成，转而出兵袭击台湾基隆港，并将军舰集中到了福建马尾。

此时，中法两国尚未宣战，清政府基于过往条约，没有阻止法国舰队进入闽江。到了8月22日，法国海军已有9艘军舰集中在船政附近水域，福建水师也调集了11艘军舰与之对峙。其中，林国祥指挥的“济安”舰，和“飞云”舰、“振威”舰一道，与3艘法舰在闽江南岸闽海关附近对峙。身临前线的舰长们，当然知道这一场面有多么凶险，但没有清政府和船政大臣的命令，谁也不敢先开第一炮。

1884年8月23日午后1时56分，法舰突然向一艘从上游驶来的小艇开炮，战斗全线爆发。林国祥指挥的“济安”舰及“飞云”舰，都是1000吨级的木壳军舰，“振威”舰是500吨级的小炮舰。与他们对峙的3艘法舰，则是2000吨、3000吨级的巡洋舰；中法双方的舰炮对比是11门对21门，装甲防护上也不是一个数量级。

更为不利的是，炮声传来时正逢退潮，清军各舰按惯例将船首转向上游，舰尾正对着法军各舰的主炮。听闻炮声，林国祥立即下令起锚，但船还没有移动就中了弹，冒着浓烟烈

火顺流漂走，最后焚毁在青州港附近。“飞云”舰、“振威”舰也遭击沉。

整场海战只持续了40多分钟。“济安”舰乘员166人中死亡85人、负伤49人。11艘清军舰船中9艘被击毁，6名舰长战死，许多都是船政后学堂第一届的毕业生。其中，“振威”舰管驾许寿山，目睹“济安”“飞云”遭到炮击后迅速下令起锚。或许是因为吨位较小，“振威”舰没有被法舰列为第一轮炮击目标，但出航不久便迎头遭遇驶入闽江的法军重巡洋舰“凯旋”号，又陷入被4艘法舰交叉射击的困境，许寿山中弹阵亡。“建胜”舰管带吕瀚是林国祥同学中第二位担任舰长的人，也在马尾海战中牺牲。全身而退者寥寥无几，林国祥是其中之一。

此后，中法战争持续了半年多，以清廷失败告终。清政府对这场败仗的指挥官给予严厉问责。福建船政大臣张佩纶（张爱玲祖父）被革职发配张家口。福建水师实际指挥官、船政后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张成被判处斩监候，被赦免后赴台湾效力。

林国祥侥幸逃脱了追责，但福建船政学堂、工厂、舰队全被摧毁，他没有任何军舰可以指挥，只得以借调身份前往广东，管带只有439吨的小炮舰“安澜”号，在钦州一带巡航，缉捕水匪和走私客。

转眼间5年过去了。1889年，林国祥以“熟于驾驶，兼通测绘之学，频年奉差往来南洋各海口，熟悉风涛沙线，教练兵勇枪炮，甚资得力”，被两广总督李瀚章上奏以原官在广东留用，总算再度获得正式官身。

【甲午战争的沉浮】

1892年，重建的福建船政建造的铁甲巡洋舰“广乙”号入列广东水师，林国祥出任管带。相隔8年后，他再度成为千吨级战舰的舰长，此时距离他第一次担任舰长已经18年。林国祥在北洋海军的同学都已成为高官，刘步蟾是二品的北洋海军右翼总兵，邓世昌也成为三品的北洋海军中军副将，而林国祥的官衔仍然是没有实缺的四品尽先补缺都司。尽管发展各异，这些同学很快再度相遇，并肩战斗。

两广总督李瀚章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兄长，“广乙”“广丙”入列广东水师

后，他奏请将这两艘新式军舰北开，随同乃弟麾下的北洋海军一起训练，直至1893年底返回广东。按照海军章程，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每三年校阅一次海军。1894年初，“广乙”等三艘“广”字舰再度北上，参加5月间在大连湾至威海卫组织的会操。

这一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起义。4月间，东学党已经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威胁汉城（今首尔）。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要求派兵增援。海军会操后，“广”字三舰被留下，编入北洋海军战列参加巡弋和护航。

朝鲜局势很快演变为中日两国的角力，日本借口10年前《天津会议专条》约定出兵朝鲜，在仁川登陆，并出动海军进入黄海，局势日趋紧张。1894年7月22日，林国祥率领“广乙”舰，随同后学堂第一届同学、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方伯谦带领的“济远”“威远”两舰组成护航队，从威海开赴牙山，掩护赴朝清军登陆。

7月23日，护航队观测到有日本军舰出没在驻地附近。方伯谦派遣“威远”舰前往仁川，打探消息。次日，“威远”舰带回了日军攻入汉城、控制了朝鲜国王的消息。方伯谦判断战争一触即发，下令“威远”先行返回威海，“济远”“广乙”两舰待协助登陆任务完成后立即返航。

7月25日清晨4时许，“济远”“广乙”两舰从牙山启程。7时许，在丰岛附近海面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3艘军舰相遇。7时45分，日舰“吉野”开火。7分钟后，“济远”开炮还击，甲午战争第一战就此爆发。

虽然“广乙”的吨位在北洋海军中敬陪末座，但林国祥却是舰长中唯一拥有实战经验的人，想必也以马尾海战败于战前逡巡不定为耻。护航出发前，他曾请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指示，“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

开战仅几分钟，“济远”舰司令塔、前主炮相继中弹，大副沈寿昌和前主炮炮手多人阵亡，开始撤离战场。“广乙”同样遭受重创，回撤至朝鲜西海岸搁浅。经过战场的两艘清军运兵船中，“高升”号被击沉，近千名官兵殉难，“操江”号被俘虏。

局面急转直下，但林国祥没有轻易放

弃：“济远”舰受创后，继续向威海撤退，但跟随其后的“广乙”舰突然调转航向，向日军旗舰“吉野”号发起冲锋。“吉野”意识到“广乙”想要逼近后施放鱼雷，立即大幅转向躲避。“广乙”舰乘机转而冲向“秋津洲”舰，一度逼近至600米处。此时日军游击队第三舰“浪速”号前去支援，“广乙”转而冲向“浪速”，逼得后者急忙转向规避。

这是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做到的事情——“广乙”是一艘只有3门火炮、4具鱼雷发射管的小军舰，却犹如长坂坡的赵子龙，左冲右突，逼得数千吨级的3艘日舰纷纷躲避，为“济远”的撤退争取了时间。面对3艘日舰30门火炮的轰击，“广乙”受创严重，司令塔、主甲板、鱼雷发射管均遭炸毁，被迫向朝鲜西岸方向撤退。冲滩搁浅后，林国祥下令焚毁军舰，带领幸存官兵从陆路撤退。

方伯谦逃离战场后，报告“广乙”舰系“自行驶去”，但各方后来陆续认识到了林国祥的英勇。清政府上谕称他是“以孤船当劲敌，战阵奋勇，力竭船沈”。李鸿章给兄长写信，也称赞“林国祥中外咸称其奋勇”。

林国祥带队赶赴清军在朝鲜的驻地牙山，不料到达时清军已经撤离，日军正在源源登陆。后来，他得到驻仁川英国军舰“阿察”号舰长罗哲士的帮助，带队乘舰回到烟台。英国为表示中立，要求他和其他“广乙”舰员签署不参加战争的保证书。黄海海战后，方伯谦因临战逃亡被撤职，李鸿章指示林国祥改名林天福，接任“济远”舰管带。

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后元气大伤，林国祥虽然成为了2355吨级巡洋舰的舰长，却没有任何表现机会。1895年2月12日，困守刘公岛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林国祥随北洋海军残部投降，指挥了几个月的“济远”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战后，清政府颁发上谕，将林国祥以下幸存的北洋海军军官、文官16人一并革职。林国祥落了个革职留营的处分，留在北洋服务，后曾赴英国监造为重建海军而采购的“海天”“海圻”两舰。

【巡阅南海的光荣】

1900年，林国祥开复原官，返回广东，

担任水师左翼分统。此后10年间，他一直在广东水师服务，管带的都是几百吨的小舰，所做的是巡航、捕盗一类的事。马尾、丰岛这样炮火连天的海战，已经久远得像历史一样。

林国祥在船政后学堂的同学们，许多都死在了战争中。邓世昌在撞击“吉野”失败后沉海；刘步蟾、林泰曾在刘公岛战败前后相继殉国；方伯谦在黄海战败后被斩首。“来远”管带邱宝仁、“平远”管带李和、“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黄建勋，都是林国祥的同学，同样战死在黄海。

这时恐怕连林国祥也没有料到，自己竟然还有率舰出海远征的机会。

1908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登上东沙岛，招募工人采集鸟粪、海藻，捕捞海龟、玳瑁。此事引发外交纠纷，清政府对领海岛屿的失控引起国人普遍不满。两广总督张人骏与署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商议后，决定由李准带领3艘军舰踏勘南海，测绘海图，勒石刻碑，重申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李准是办团练的文官出身，他担任水师提督，可视为晚清官制改革的一个标志。但水师提督的官好做，真正的远洋航行还是要靠专业人才。他选中的“航海之主”，正是广东水师资深管带林国祥。

这次巡海的军舰，是广东水师中吨位最大的三艘：“琛航”号、“伏波”号、“广金”号。对于这支船队，林国祥想必百感交集。23岁的他初次担任舰长，便是在刚刚下水的“琛航”号上。如今他已是58岁的老人，却又回到了这艘船龄35年、马尾海战后被修复的老船上，还要带着它穿越万里江波。“伏波”舰也是林国祥指挥过的军舰，舰龄甚至比“琛航”还要老上几年。“广金”舰是林国祥回到广东后指挥过的军舰，舰龄虽短，但排水量只有560吨，远洋能力堪忧。

林国祥告诉李准，“此二船（‘琛航’‘伏波’）太老，行驶迟缓，倘天色好，可保无虞，如遇大风，殊多危险”。见李准坚持，林国祥便亲自下到船内，逐一检查锅炉、机器、桅杆、船帆、绳索，指示应当修理之处，甚至将船底铁链全部拉出，拿锤子逐一敲击检查，标记应该修整补强的部位。

远洋航行对林国祥也是一个挑战，在他

主持下，这支踏勘南海的小舰队装载煤炭、粮食、饮水，雇佣需要的木匠、漆匠、缝工，做好了出行准备，转往海南岛南部的榆林港。出航日期也是林国祥选定的。据李准回忆，一天，他看到“港内水波不兴，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以为正可直驶西沙矣”，但林国祥建议“天气不可恃。须看天文，有三五天之西南风，乃可放洋”。

1909年5月29日，踏勘舰队出发，驶向远洋深处，历时约半个月。由于舰船所载的燃煤、淡水、食物有限，李准的小舰队仅踏勘了西沙诸岛，对其中15座岛屿查明位置、标明经纬、依次命名，并树立巡阅碑和龙旗。岛屿中，有以军舰名称命名的“琛航”“伏波”“广金”岛，还有以李准及幕僚籍贯命名的“邻水”“宁波”“番禺”岛，有一座“新会”岛，便是以林国祥的籍贯命名。

林国祥主持航海，“经夜不睡，行于甲板上，监视舵工”。他还告诉李准，近海暗礁多，稍有不慎就会撞碎船只。他还是众人海上生活和岛屿状况的头号顾问，他建议所有人都准备一根木棍，用来防鸟。众人问他，鸟有什么可怕，他说西沙的大鸟不怕人，甚至还与人相斗，没有木棍打不过。后来他们果真在一座岛上遭遇一群大鸟袭击，不但用上了棍子，甚至开枪击倒了30多只才赶开。

林国祥其实并未到过南海，想必他是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在李准的回忆里，林国祥成了一位生物学者。李准不知是何物的海洋奇物，林国祥都能说出一二。出海不久，李准见到一座山在似隐似现地行走，林国祥解释，这里没有山，那是鲸鱼，我们要绕道规避一下。登岛夜宿，听到“水中暂暂有声”，林国祥说这是乌龟在下蛋，并讲“从此不忧乏食矣”。众人捡拾了不少乌龟蛋，开水烫过后，“撕开一口，吸而食之，其味厥美”。（《李准巡海记》）

15天后，探勘舰队返回广州。这一次行动，成为日后中国政府宣示南海主权的重要证据，意义深远。这次远行也耗尽了林国祥的气力。1910年农历七月，林国祥病逝。他的一生与近代海军相伴，屡经血战，矢志不渝，奉献海防，是近代中国海军捍卫蓝色疆土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文史学者）

苏东坡的岭南行

文 | 李怀宇

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居家的日子里，《苏东坡全集》常读常新，近日常读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又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重读了一过。苏东坡一生多病，更多风波，然而他因病得闲，安心是药更无方；因祸得福，谈笑于死生之际。苏东坡留下的不朽文字，千百年来依然安慰人心，如今重寻苏东坡的岭南行，别有一番亲切感。

【此心安处是吾乡】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黄州。牵连受罚的数十人中，王巩（字定国）是第一名，处分重过主犯，谪官监宾州（今广西宾阳）酒盐税。当年宾州为广南烟瘴之地，比黄州更为荒僻。苏轼至为内疚，复书：“……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元丰六年（1083年），王定国先自宾州放归，苏轼作《次韵王巩南迁初归二首》：“归来貌如故，妙语仍破臈。那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王定国有一歌姬宇文柔奴，眉目娟丽，其家世住京师，从王定国南迁，苏轼问她：“广南风土应是好不好？”柔奴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心如电震，立刻填词《定风波》一阕：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多年后，苏轼亦有岭南之行。

时局大变。哲宗诏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1094年），新皇帝决然要绍述神宗时代的新政。

绍圣元年闰四月初三日，苏轼奉到新命：“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今广东英德）军州事。”于是，他开始南下。

当年苏轼五十九岁，闰四月已甚炎热，以为“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必死无疑。行至陈留，眉州乡邻杨济甫派儿子杨明（字子微）千里赶来相送。杨明自言懂得“术数”，可相面占卜，他看苏轼绝对不会死在岭外，会活着北归——这给了前景灰暗的苏轼极大的心理暗示，他笑道：“你这预言若成真，我一定为你书写《道德经》一部，以当酬谢。”

行至距当涂六十五里的慈湖夹，船被大风所阻，停了下来。这条水路，是韩愈当年贬谪潮州时所走过的路，韩诗中记述的地方情景，如今一点没变。苏轼在船舱中写下《慈湖

夹阻风五首》，其三云：“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千顷桑麻在船底，空余石发挂鱼衣。”颇有“异代同命”之慨。

到了当涂县时，苏轼接到新的安排：“苏轼，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此际，他已坦然：英州（广东英德）、惠州（广东惠州），皆在广南，都是岭外，毫无计较。苏家商量后决定，由二十三岁的幼子苏过侍父远行。次子苏迨带领二、三房的家眷到宜兴跟大哥苏迈同居。苏轼的姬妾，唯有朝云在患难中坚决要随侍南行。

绍圣元年九月，苏轼度大庾岭。唐张九龄开山径，植梅岭上。宋时立关名“梅关”，时人以为岭外便是蛮荒瘴恶之地。苏轼作《过大庾岭》诗云：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受长生。

在路上，苏轼于林麓间遇见两个道人。他们看到苏轼，便退回茅屋里去，深入不出。苏轼诧异，对押送他的使臣说：“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进了屋子，这两个道人都在，气度潇洒，问使臣道：“此何人？”“苏学士。”道人说：“得非子瞻乎？”使臣说：“学士始

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两道人相视而笑，说：“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苏轼默付：“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

曹溪南华寺，是六祖慧能的道场，原名宝林寺。苏轼为题“宝林”二字，作《南华寺》诗云：“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舟行至清远县，苏轼遇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此际苏轼已神往惠州了，更有“便向罗浮觅稚川”之意。

到了广州，苏轼游白云山上的蒲涧寺、滴水岩。蒲涧藏于山林之中，溯溪而上、青苔石阶、飞泉挂壁，风景甚是优美，东坡为此作诗《广州蒲涧寺》：

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
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
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蔔祖师禅。
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

白云山的泉水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绍圣三年（1096年）冬，苏轼在惠州时，得知那时的广州人民正饱受瘟疫之苦，有钱人可饮用洁净的井水，而穷人只能喝咸苦水，很是煎熬。他突然想到白云山上的溪泉清澈干净，可引水给百姓，于是设计了一套“自来水系统”，被称为“土自来水”。在给挚友——时任广州太守王敏仲的书信上，苏轼写道：“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

在白云山滴水岩下凿一石槽，承蓄百尺飞涛之水，再用五管并排的大竹筒，顺着地势将泉水分引到城内各个小石槽，即可方便居民就近引水。苏东坡除了文学造诣超高，还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过人的想象力，这套设计方案不仅实用，而且建造费用很低。于是广州太守采纳并修建了这套“自来水系统”，当地百姓得此之惠，瘟疫很快就消失了。

从广州到惠州路上，苏轼专程上了罗浮山。罗浮是岭南第一名山。绍圣元年九月



王朝云

二十六日，苏东坡一家乘坐的船停靠在泊头镇。第二天早晨，父子两人便乘肩輿直至罗浮山。他们游览了长寿观、冲虚观，饮了卓锡泉，还为葛洪的丹灶题了字。此游虽然只有一天，但苏东坡作有七古《游罗浮一首示儿子过》和七篇笔记，他盛赞罗浮山“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

苏轼南行，一路上寻佛问道，诗文中多是追求心灵的慰藉与解脱。贬谪之路，也是修行之道。

【不辞长作岭南人】

绍圣元年十月初二，苏轼一行到达了惠州贬所。

佛印托人捎信给苏轼：“……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贵，转盼成空……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什么？三世诸佛，则是一个血性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佛印的这番话，真是苏轼的知己之言。这是二人的最后交往。绍圣四年（1097年），佛印离开了凡尘。

苏轼开始适应惠州的生活。“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可视为苏轼的定居宣言。他南来时已是秋天，至第二年四月，方得初食荔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诗云：“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矣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自注：“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鲙柱、河豚鱼近之耳。”这个比喻，后人另有解读：有人问苏轼，杜甫似何人？苏轼说似司马迁。因为，诗人中无人可比杜甫，如史中无人可比司马迁。此理近乎荔枝似江鲙柱、河豚鱼。荔枝产于四川、福建、岭南三地，闽蜀之产，须在六七月间方才成熟；而四月可食的早熟荔枝则在岭南。苏轼说：“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

苏轼适应了岭南的饮食，更结交了岭南的朋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吴复古（字子野，号远游），为“潮州八贤”之一。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四十一岁，在密州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年底赴济南想和苏辙相聚，不料那时苏辙在齐州掌书记的任期结束，匆匆回京，上书神宗，力主废除青苗、保甲、免役、市易四法。苏轼欲在济南见弟弟而扑空，却受到齐州知州李常的款待。李常向苏轼介绍了自己的外甥黄庭坚，也向苏轼介绍了吴复古。当年苏轼正受眼疾和痔疮的困扰，很信道家的养生修炼，吴复古“以长生不死为余事，而以练气服药为土苴也”，两人相见恨晚，成为至交。

以后在苏轼的人生低谷时，吴复古总是适时地出现。在黄州时，吴复古托人带来建茗等妙品问候苏轼。初至惠州时，吴复古的儿子吴范仲从潮阳送了许多食物来。苏轼将广州所买的数斤檀香，分了一半回赠。苏轼买这些檀香，原是预备定居惠州之后，杜门烧香静坐所用。

葛洪生于三国时代的吴国，精于炼丹，天下大乱之际，准备往交趾寻找最好的丹砂。行至广州，爱罗浮山之幽静，遂在山中修炼，终于罗浮，留下《抱朴子》等名著。苏轼一向神往炼丹求仙之事，一到惠州，在嘉祐寺落脚时，绍圣元年十月二十日作《思无邪丹赞》：“饮食之精，草木之华。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不仅炼丹，苏轼说有一海上道人传授“以神守气”的吐纳方法，写成《海上道人传以神守气诀》以示吴复古。

绍圣三年（1096）十一月，吴复古偕陆道士惟忠到惠州看望苏轼，同好相聚，饮酒谈道，炼丹打坐。吴复古形容枯槁，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寒夜中，苏轼与吴复古畅谈，腹中饥饿，吴复古便给他煨了两个芋头吃——古人冬日常常通过煨芋的方式，用炉火营造出温暖美好的氛围，增添诗意。吃了芋头的苏东坡十分欣喜，特意写下《煨芋帖》，以记录这种寒夜里吃的美食——“惠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瘴”。

在写下《煨芋帖》后，苏轼仍不过瘾，又作《除夕访子野（吴复古字子野）食烧芋戏作》一诗：“松风溜溜作春寒，伴吾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这篇诗作看似平平无奇，实则隐含着唐代邕侯李泌的政治典故。相传李泌被权臣李林甫等排挤，辞官归隐衡山时，曾遇到一个因“性懒而食残”的和尚，此人平日里喜欢用

干牛粪煨芋头。一次，和尚正从牛粪灰里扒出个芋头吃，看到李泌来了，二话不说，把啃了一半的芋头递给他。李泌也不嫌脏，两三口就吃完了。和尚见状笑道：“甚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果然，日后李泌东山再起，真的做了十年宰相。

苏东坡借此典故作诗，表面上看是以李泌自比，实则揶揄朝中打压自己的宰相章惇等人。三年后，他被章惇以“虽谪岭南，责尚未足”的罪名，进一步贬往儋州。

苏轼在惠州时，妾中唯有朝云随侍。早在苏轼事业鼎盛之际，一日退朝还家，食罢，按照他的养生法，在室内扞腹徐行。旁有侍儿，苏轼忽然指着自已的大肚皮对她们说：“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都是文章。”“都是识见。”苏轼摇头不以为然。唯有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如今贬谪岭南，朝云成为苏轼晚年重要的心灵港湾。

绍圣三年七月初五，朝云三十四岁，瘟疫夺走了她的生命。八月初三，苏轼葬朝云于丰湖栖禅寺东南。

贬谪岭南后，苏轼的心灵更亲近陶渊明。他赞道：“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在惠州两年间，苏轼和陶诗近百首，他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

【九死南荒吾不恨】

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苏轼与苏辙兄弟海滨诀别。苏轼从雷州徐闻县渡海，七月初二，到了昌化军贬所。昌化，古儋耳城。苏轼初至，致友人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晚年的苏轼，不善下围棋，却乐于观棋。遂作《观棋》：

……

纹枰坐对，谁究此味。

空钩意钓，岂在鲂鲤。

小儿近道，剥啄信指。

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金庸《碧血剑》第三回《经年亲剑铗，长日对楸枰》中说：

围棋一道，最讲究悟性，常言道：“二十

岁不成国手，终身无望。”意思是说下围棋之人如不在童年技成，将来再下苦功，也终为碌碌庸手。以苏东坡如此聪明之人，经史文章、书画诗词，无一不通，无一不精，然而围棋始终下不过寻常庸手。成为他生平一大憾事。他曾有一句诗道：“胜固欣然败亦喜”，后人赞他胸襟宽博，不以胜负萦怀。岂知围棋最重得失，一子一地之争，必须计算清楚，毫不放松，才可得胜，若常存“胜固欣然败亦喜”的心意下棋，作为陶情冶性，消遣畅怀，固无不可，不过定是“欣然”的时候少，而“亦喜”的时候多了。

在儋州，苏轼种菜煮食，说：“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乃作《菜羹赋》，讨论的是家常美食的选材、加工、制作与食用。苏轼写道：“东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称家之有无。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芥而食之……而有自然之味。”在儋州，他连吃饭的器皿都置备不全，更何况“水陆之味”，买不起鸡鸭鱼肉，只能“煮蔓菁、芦菔、苦芥”，而且没有调味品，被迫吃“自然之味”，可见他在儋州的生活艰难。

一次，家里没有东西吃，眼看要挨饿，邻居给了些蔬菜，于是苏轼便用这些蔬菜做了一顿美食。他陈述了美食制作的方法：先用山泉水洗净菜叶和菜根，放在锅里用油炒。然后，加入粳和豆，搅拌均匀，反扣上陶甑，不要频繁搅动，不要使用醋和酱油，也不要放花椒、桂皮之类的香辛料，只保持原味。等到水开始沸腾，再用均匀的大火，菜蔬便随开水翻滚，这样就煮成了酥烂的菜羹。盛上一碗作为早餐，香味不由得令人口舌生津，几可与牛、羊、猪、鱼、麋五鼎媲美。

又有一次，苏过忽出新意，以山芋做羹，名为“玉糝羹”，苏轼尝了，拍案叫绝：“色香味皆绝，天上酥酡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这时候苏轼品尝的是小儿的一片孝心，人间有味是清欢。

人类的历史上不仅有饮食史，也有饥饿史。饱食终日，未必知味，而饥饿时对美食的回味与想象，反而创造出文学上的无限空间。苏轼的《老饕赋》便是证明：“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洁，火恶陈（江右久不改火，火色皆青）而薪恶劳。九蒸暴而日燥，

百上下而汤麇……”苏轼一生，在世人眼里还有一个“美食家”的形象。在他最困顿之际，《老饕赋》对美食的文学性总结，文字之外，更有人生况味。

他通过《老饕赋》告诉人们，高档美食的烹调方法有一个通则，那就是：水要新鲜的水，锅一定要洗干净；柴火相当有考究，火候一定要把握好；有些食物要经过多次蒸煮、晒干才能用，有些要在锅里慢慢地熬。选择猪肉要选小猪颈后部的那一小块肉；选螃蟹要选霜降前最肥美的螃蟹；蜜是樱桃捣烂在锅中煎熬而成的；糕点一定要用杏仁浆蒸；吃蛤蜊要趁半熟时就着酒吃；螃蟹要和酒糟一起蒸，不要太熟，蒸得稍微生些才更美味……

当然，这还不够。接着，苏轼描述了应该怎样在豪华的筵席上食用这些美食。闷头闷脑地吃缺乏情调，一定要有歌舞相伴——音乐应选择艳若桃李、端庄大方的美女演奏，饮酒时要用珍贵的南海玻璃杯斟上凉州的葡萄酒，酒足饭饱之后再倒一缸雪乳般的香茗。美食应和美的艺术结合在一起，不仅是为追求口腹之欲，还要追求精神的满足。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渐渐融入儋州的百姓生活，诗中说：“莫作天涯万里意。”海南“百物皆无”，书更少。苏轼偶尔借得《柳宗元集》数册，如久渴之人得见一瓯清泉。陆游说：“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柳子厚、陶渊明二集，谓之南迁二友。”苏轼《和陶拟古》云：“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第一位跨海来访的朋友是吴复古。旧年他们还在惠州欢聚，如今在儋州重晤，恍如隔世。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九，哲宗崩逝，年仅二十五岁。徽宗即位。

吴复古在广州，听到朝中消息，知道苏氏兄弟将内迁，即刻渡海，告诉苏轼。此际苏轼已看淡风云。苏轼、苏过父子与吴复古同行北归，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登船渡海。这一夜，苏轼心潮与海潮一同起落，作诗云：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元符三年九月，苏轼到了广州。苏迈、苏迨兄弟带了孙子辈到广州相会，一家人东分西散，如今得以团圆。谈起朋友们牵连受累，苏轼说：“小人只能坏他的衣服，至于其不可坏者，遭逢困厄愈大，当愈有胜境。”

净慧寺是广州名胜。寺有九级浮屠，八棱飞檐，高二十七丈。萧梁大同三年（537年）敕建，本名宝庄严寺，后改净慧禅寺，俗称花塔寺。端拱元年（988年）开始重建，寺中供奉六祖慧能铜像。殿前有六棵大榕树，饭后，苏轼憩息在榕树之荫，应寺僧之请，提笔顺手题写“六榕”，落款“眉山轼题并书”。从此，大家都称之为“六榕寺”，净慧寺之名几乎无人知晓。

苏轼书“六榕”之际，也许瞬间想起朝云安葬之“六如亭”。昔日苏轼《六观堂赞》中则说：“自一至六，六生千万。生故无穷，一故不乱。”

在广州，苏轼得一新识，推官谢举廉（字民师）。苏轼一生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对谢民师大为称赏。离开广州，舟抵清远峡，吴复古与几位道士、和尚朋友从广州一路追来，为苏轼饯行。这时吴复古忽然生病，笑而仙逝。苏轼《祭吴子野文》中说：“呜呼子野，道与世违。寂默自求，阖门垂帙。兀尔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壶子，杜气发机……”

苏轼在大庾岭上准备北归。村店有一位老翁问从仆：“官是谁？”“苏尚书。”“是苏子瞻吗？”“是的。”老翁上前向苏轼作揖：“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地陷害您，而今北归了，真是天佑善人！”苏轼笑而谢之，在村店壁间题诗：“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唐代韩愈谪放潮州，而潮州人立庙崇祀至今。苏轼谪放惠州、儋州，心中自然不时想起韩愈。《过岭》诗中云：“当日无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

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苏轼北归至金山寺，自题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岭南，占了苏轼平生功业的三分之二。

（作者系文史学者）

冰心与燕大

文 | 孙玉祥

【与燕大结缘】

冰心与燕大的缘分，跟胡适颇为相似——胡适曾在中国公学读过书，后来又服务于中公，冰心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后来也在燕大教书。

不过，冰心上大学时，最赏识她的还是校长司徒雷登。

作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他在中国最大的贡献，当属创办燕京大学。1918年，北京汇文、协和两所教会大学达成协议，合并为燕京大学，拟聘一位与两所学校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做校长。当时执教于金陵神学院的司徒雷登，成为双方看中的人选。

当时，面对这个“一无可取”的摊子，不少朋友劝司徒雷登回绝，但他却选择了走马上任为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筹资金、建校园、揽师资、抓教学，一时间成为最忙碌的人。经过10年的努力，燕大不仅拥有了“世界上最美的校园”，而且进入中国当时一流大学的行列。据后人统计，燕京大学办学33年，尽管入籍学生不到一万人，却培养出了55名两院院士；二战期间，中国在各国的新闻特派员十有八九系燕大毕业生。其办学成就，至今为人称道。



1938年，冰心和小女儿吴青

冰心正是在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时与司徒雷登相识的。1918年，冰心从北京贝满女中毕业后，按照父亲“不为良相，要为良医”教导，进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医。协和与汇文合并时，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她“弃医从文”，成为燕京大学文学系的学生。那时候，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司徒雷登根据《圣经》上的两句话结合简化而成：“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一校训在冰心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1921年冰心撰写了《自由·真理·服务》一文，对这个校训作出解释。

1920年夏，百年不遇的大旱降临至北方五省，受灾民众数以万计。本就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众，遭遇这场罕见的天灾后，生活过得更是贫困不堪。

燕京大学的学生得知情况后，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募捐活动。当年10月，燕京大学女校青年会理事部决定，和男校青年会携手同行，组织一个文艺募捐会，进行演剧救灾。此时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冰心，则被选为女校新剧委办主任。

当时的冰心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她被推选为新剧委办

主任，也是众望所归。大家经过商量后，决定演出比利时戏剧家莫里斯·梅特林克创作的戏剧《青鸟》。因为冰心翻译能力出色，于是，众人决定将这个光荣任务交给她来完成。冰心不负众望，几天后，便顺利地将该剧翻译成汉语。最后，她请人担任剧中主角，而自己则在剧中出演了一个小角色。

经过一个月的彩排，当年11月27日，剧组在北京米市大街青会进行了第一次公演。演出非常成功，首场演出便为灾民募集到了12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同时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不过，在演出救灾的过程中，燕京女校的学生们听到一件非常令人气愤的事情：一些人贩子竟然借灾情趁火打劫，将受灾群众家的多个女孩子拐卖到了外地。于是，冰心联合同学们一起向校方建议，在北平城以外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设立一个“幼女赈灾所”。校方听后欣然同意。

经过这次赈灾，燕京大学女校学生们认为：“想要完全救助一个人，不但要救她们的肉体，还要救她们的灵魂，更要增进她们的知识。”于是，学校派专人教灾区幼女做各种手工，还教她们读书识字。

随后，燕京大学女校又准备创办一所“注音字母学校”，招收成年不识字的妇女，冰心又被派当校长。注音字母学校的授课效果很好，1920年那班毕业的学生，后来大都成了北方各注音字母学校的老师。

大学四年里，冰心不仅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而且迎来了她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先后在《晨报》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庄鸿的姐姐》《去国》等小说和出版《繁星》《春水》两个诗集，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不可小觑的青年女作家。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对冰心自然很是赏识，而美籍英文女教师包贵思，对冰心更是厚爱有加，经常邀她到家里吃点心、谈诗文。包贵思还根据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协约规定，推荐冰心到这所曾经成就中国宋氏三姐妹的世界顶级女校留学。

1923年8月，冰心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到达学校后，由于浓郁的乡愁、繁重的功课，不多久的时间，她身体出了问题，大口地

吐血，随即住进了医院，同学们和朋友们闻讯后都赶来探望她。此时，正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闻讯也赶来医院看望她。在大体了解病情之后，司徒雷登对她说：“在这里有什么不便，都告诉我，我可以与医院进行交涉。”针对冰心对疗养时间太长会影响学业的担心，司徒雷登安慰她说：“安心养病，至于功课，以你的才智，病愈后是能很快补上的。”他还与冰心约定，毕业后回燕京大学任教，为母校服务，并说：“我是美国人，但也是中国人，我需要你的合作。”到医院探望冰心之后，司徒雷登很快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向全校师生述说了冰心的病情，告诉他们冰心正在疗养恢复之中。这些关心，对于病中的冰心而言，如同雪中送炭，让她暗暗决定了回国后的工作去向。

【燕大成就的爱情】

也正是燕大安排的这次出国留学，促成了冰心的终身大事。

1923年8月17日，冰心乘美国邮轮杰克逊号赴美留学。冰心贝满女中同学吴梅事已自费赴美，她写信托冰心在船上寻找自己的弟弟、清华学校留美学生吴卓。上船的第二天，冰心请燕京同学许地山代寻吴卓，许却阴差阳错地找来了吴文藻。此时冰心正和燕京同学玩丢沙袋的游戏，只好将错就错地请吴文藻加入。

空闲时，两人倚船栏看海攀谈，互相询问将在美国学什么专业。当冰心说自己是学文学，并说想选读一些有关19世纪英国诗人的课程时，吴文藻列举了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著作，问冰心是否读过，冰心回答没有。当时，冰心的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已很流行，是位颇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船上的许多人（仅清华学校就有100多人）常对她说些“久仰”“久仰”之类的恭维话，吴文藻却能从文学的阅读上独树一帜，并且还进一步“教导”冰心：“如果你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是白来了。”冰心初闻此言，未免感到刺耳，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是从未听过的逆耳忠言。多年后，他们的女儿吴青说：我爸爸很“狡猾”，他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追求我妈妈。

有此良好开端，吴文藻当然“乘胜追击”。他原本就酷爱读书买书，到美国后，每逢买到

一本文学书，看过后便寄给冰心，冰心收到后，赶紧阅读并向吴谈心得体会，就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认真。这样的交流，使得冰心导师盛赞她的阅读范围广泛，学术视野开阔。

1925年，以梁实秋为首的中国留学生决定在波士顿公演一部中国戏剧《琵琶记》，并邀请冰心出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冰心在激动之余，最想把这个消息和吴文藻一起分享，所以随信给他寄了张演出入场券。此时，他们已经书来信往了一年多，接到冰心的信函，吴文藻先是迟疑了一番，最后才以学业忙为由推辞了——然而，这又是他高明之处——据冰心说：“剧后的第二天，到我的休息处……来看我的几个男同学之中就有他。”其实他那天是来看了表演的，拒绝只是为给对方一个惊喜。

同年夏天，冰心独自到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补习法文，发现吴也去了，同样也是补习法文，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风景如画的大学城内，两人几乎每天课后都一同游山玩水，每晚从图书馆出来，头顶着明月繁星，一起散步谈心。就在这细水长流的日常交往中，彼此感到双方契合的地方越来越多，各自都把对方看成自己的知音，渐渐发展到互托终身，他们计划完成学业之后，回国举办婚礼。

1926年冰心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到燕京大学任教——这当然是兑现3年前，冰心在美住院时对前来看望他的司徒雷登校长的允诺。冰心到燕京大学当老师时，学生时代的那些老师还都在——沈尹默、刘廷芳、包贵思等，开会时，教授群里就多了个“娃娃”——表面看起来，冰心的年龄与外形和学生差不多。

1928年，吴文藻也从美国学成归来。他本是去清华应聘，但清华只答应让他做副教授，而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对吴文藻说：你来燕大吧，我让你当教授，而且你会是社会学系的创始人和系主任。吴文藻就此来到了燕大，住进了66号小楼。

66号小楼是一座美式风格的独栋小别墅，类似的这片别墅，是当年燕大专门为名师打造的。砖瓦水泥就地取材，但做窗户框的红松和做门把手的黄铜是从美国运来安装的，房间里铺设着打蜡地板，屋角有壁炉，卫生间冷热水分路供应，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设施十分精良。



1922年，燕京大学女子学院大门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的临湖轩举行了西式婚礼。下午四时整，婚礼开始，“客厅里缀满了鲜花。所有的东西都是纯白的——白丁香、毛樱桃梅、白玫瑰、海薯、梔子等，而且新郎新娘走在用纯白缎子铺的通道上。全体来宾站在仪式台前这条白缎子通道的两侧。仪式台上放置的两个缎垫也是纯白的，宣誓时跪在上面。因为我们是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婚礼，所以司徒雷登先生为我们做了主持。音乐是钢琴与四把小提琴的合奏，十分悠扬肃然”。（冰心《纯白的婚礼》）

婚礼上，吴文藻身着深色西装，戴同色系玳瑁圆眼镜，温文尔雅又不失英挺帅气，被花童和伴娘拥在中间的新娘冰心，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幸福笑意偎依在吴文藻身边。到场嘉宾无不赞他们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

【“书呆子”吴文藻】

婚后的冰心在燕大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吴文藻也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书呆子”的生活。他搬进燕南园66号之后，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在一楼书房的北墙打造了一个“通天大书架”，而家务活几乎都是冰心在操持。夫妻俩订阅了很多期刊，按时更新，他们家的书架是开放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只要想参观阅读，都可以前来，号称是“燕大的开放期刊阅览室”。

燕南园时期的冰心，有过两次长途旅行。一次是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邀请，利用1934年的暑期，冰心、吴文藻发起组织了一



燕京大学宿舍公共活动室里的女生在看报纸

个旅行团，沿着平绥铁路，开展社会、文化、政治、民族等方面的考察。团员有文国鼎、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陈其田、赵澄，包括冰心、吴文藻，一共8人。

旅行团从清华园站出发，沈昌派出公务专列，设备齐全，服务周到。车刚开出，旅行团便在车上的会客室开会，顾颉刚根据各人的专长明确分工：陈其田注意沿线经济状况，雷洁琼关注宗教状况，文物古迹自然是郑振铎，民族历史方面由顾颉刚承担，蒙古包归吴文藻，文国鼎写英文导游手册，赵澄担任摄影，冰心则记载沿途印象。这次旅行，教授们都大有收获，郑振铎写了《西行书简》，以书信的方式详细记录了西行的情景。吴文藻以社会学的观察完成了《蒙古包》的论文。冰心除了长篇游记《平绥沿线旅行记》外，还根据这次旅行得来的素材，写作了小说《二老财》。

另一次是1936年至1937年，冰心用了一年的时间随吴文藻游学：东京、西雅图、波士顿、纽约、巴黎、罗马、伦敦、柏林、莫斯科等，待周游世界一圈回到北平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

吴文藻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在生活中却过于“痴傻”。当年冰心去美国，特意拍了自己的照片寄给父母，婚后，吴文藻特意向岳父讨要冰心的相片，打算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冰心问：“你真的每天要看一眼呢，还是只是一件摆设？”吴文藻说：“每天都要看。”一天，冰心趁着吴文藻去上课，偷偷把相框里自己的相片换成了阮玲玉的相片，过了好几天，吴文

藻都没发现。冰心忍不住“提示”他：“你看桌上的相片是谁的？”吴文藻这才发现，笑着把相片换下来，说：“你何必开这样的玩笑。”

几十年后，吴文藻应邀写了一篇大概9000字的自传，冰心看后表示：“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两处：我们何时相识，何时结婚，短短的几句。至于儿女们的出生年月和名字，竟是只字不提。”后来，吴文藻去世，学生写文悼念，说：“吴师曾感慨地说‘我花在培养学生身上的精力和心思，比花在我自己儿女身上的多多了’。”

冰心曾在文章中写道：“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然后是‘情投意合’。”她包容了吴文藻的“一团傻气”，吴文藻也包容了冰心的“小调皮”，或许这就是他们婚姻美满的缘由吧。

【在燕大的教学生活】

冰心回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国式的建筑，翠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进门是小桥流水，景色美轮美奂。据说这校址是从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原是他在北京的房产之一。

那时未名湖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舫。冰心住的是燕南园53号英美国籍女教师居住的小楼，因为普通的女生宿舍会客室里是“男宾止步”的，男宾来访女生，只能在院门口谈话，而燕南园53号的会客室可以招待男宾。

此时的冰心，已从一位才思敏捷、温柔恬静的女学生，成长为一名严肃端庄、为人师表的女助教。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是《燕大季刊》编辑部国文组的编辑，本科毕业时，她获得了“金钥匙”奖，以及留学的奖金。当她留学归来，被燕京大学同学会推举为执委会常务委员，成为燕大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中的校友代表。《燕大季刊》编辑部在聘请一些名流学者当顾问时，把年轻的冰心聘为诗歌顾问。《燕京学报》不甘落后，也将她聘为刊物的编委，1927年出版的创刊号上，第一篇是大学者王国维的文章，第二篇便是冰心的毕业论文《元代的戏曲》。

冰心到燕京大学教书以后，她的父亲谢葆璋随即南下，迁回了上海，并在那里定居。于是，只留下冰心一个人在北京，住在燕园的朗润园里。这座小园别有洞天，曲径通幽，安静美丽，很合冰心的口味。虽然她很是想念南方的双亲和分散在各地求学的弟弟们，还有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青年学者，也是她心目中的恋人——吴文藻。

冰心一生都具有谦逊的美德，哪怕到了晚年，她仍然自谦地说：“我个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没有什么‘学’可‘讲’。‘不学’，就是没有学问，如果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是得不到的；‘无术’，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如果大家希望听我讲完以后，就能知道怎样写作，而且写得很好，那也是会失望的。”

冰心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她在美国听讲时记的笔记本。班里有位三年级的同学焦菊隐，只比冰心小三四岁。一天早晨八时，焦菊隐来上课——燕大文学系里的教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冰心的功课表都排到八时至十时之间。焦菊隐进门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冰心看见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还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

后来，冰心跟焦菊隐成了好友，课外常常在一起谈论京戏。焦菊隐毕业后，创办了一所中国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他特地为冰心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厢，说谢先生可以随时来看戏。

冰心的班上还有个学生叫郭德浩，笔名高兰。在《高兰评传》一文中，曾提及冰心这么一段教学生作文的往事：

冰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学生都写“我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坚贞而洁美……

冰心的教学方式注重与学生的沟通，而不是单纯的评分。在批改作文时，她更愿意通过与学生的谈话，了解他们的写作意图，进而给予反馈。这种方式不仅让学生感到被尊重，

也让冰心得以深入了解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和背景。而在“习作课”上，她鼓励学生们尝试各种文学形式的创作。期末时，她要求每位学生交一本“刊物”，鼓励他们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和个性。学生们对这种新颖的作业充满了热情，纷纷提交了富有创意和活力的作品。

在幽雅的校园中，冰心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美满的。但在燕京大学高高的院墙外，一切却很不平静。不久，日本等国为阻挠中国军队的布防，炮轰了天津大沽，接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与此同时，各派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也愈演愈烈。1926年4月，直、鲁两系军阀趁段祺瑞被迫辞职的时机，进逼北京。5月，吴佩孚企图组阁，遭到了奉系军阀的反对……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越过了大学的院墙，把火与血的残酷现实，摆在了当时的知识分子面前。这种情景和世态，必然会影响到冰心的思绪，她后来说，1926年回国以后直至1929年，她“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

冰心在燕京大学的这段生活，写作的确不多，主要是当孩子的妈妈、丈夫的贤内助。然而，纵使这样，她也没有放下自己手中那支笔，她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这时候，她有三部作品值得一提。首先是《分》和《冬儿姑娘》，这两部作品在茅盾看来，体现了冰心新的思想与新的追求。尤其是《分》，写一个教授和一个屠夫，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产房，生下了他们的孩子。作品通过婴儿的视角，教授的儿子和屠夫的儿子对话，道出了阶级与阶层的分野。在同样的环境里出生，但所受到的待遇，尤其是在离开医院之时，便有了天差地别：一个是坐在小车里，看着眼前飘过的雪花，一个是在风雪里抱在手上，嘴角被冻得翘起。

作家舒乙在回忆冰心时说：“冰心……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她是一个真人。真正做到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求真，所以冰心的思想是自由的，其作品亦因之愈放光华。📖

（作者系文史学者）

“诗为禅客添花锦”

——禅诗小史



文 | 郑连根

针对禅与诗之间的关系，元好问曾用“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予以概括，可谓精准。在中国诗歌史上，从印度佛典中的“偈颂”东传，到在中华大地上孕育出独具特色的禅诗，这一历程生动地展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

禅诗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和形式，更反映出佛教修行理念与中国诗人创作理念的高度融通。

【魏晋：从印度“偈颂”到中国禅诗】

印度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国度，早在吠陀时期的《奥义书》中，便能感受到其深厚的诗歌传统。佛教经典中，诸多文字呈现出鲜明的诗的形态。释迦牟尼佛说法时，善于运用比喻、诗偈、故事等多样方式，使得佛经蕴含丰富的文学性与独特的表达效果。

偈颂，作为佛经翻译中的特殊文体，起初与中国古典诗歌相去甚远。它多采用固定的句式与韵律，服务于阐释佛理、宣扬教义，相对而言，原始的偈颂文学性不强。但随着佛经翻译事业的推进，偈颂开始向中国诗歌的形式慢慢靠拢。

东汉到魏晋这一时期，是诗与禅在中国初步“交涉”的阶段。东汉时，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经大师开启了大规模的译经工作。起初，东汉文人对佛教理解不深，但到了晋代，随着玄学兴起，玄学与佛教中的思想开始汇通，中国文人对佛教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西

晋高僧竺法护译经时，得到了文人聂承远父子的协助，译文水准显著提升，这开启了名僧与文士往来、合作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精神上渴望寻求慰藉，佛教借此得以广泛传播。这一时期，诗与禅之间也呈现出水乳交融的态势。

在文人创作方面，谢灵运是诗、禅融合的重要代表。他喜好佛教，尤其推崇竺道生的“顿悟成佛”之说，并将其巧妙地融入诗中。他在《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诗中写道：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

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

……

观此遗物处，一悟得所遣。

皎然在《诗式》中称赞谢灵运“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从谢灵运的诗作中，能明显感受到山水诗因佛理的融入而呈现出的澄澈、高远的境界。此外，颜延之、沈约、梁武帝萧衍、徐陵、江总等诗人，也都有不少礼佛赞佛、以禅入诗的作品。

在诗僧群体中，康僧渊、佛图澄、鸠摩罗什、释道安等都有诗作留存。这些作品，有的阐释佛理，有的表达修行感悟，虽然在诗歌艺术的成熟度上参差不齐，但已初步展现出禅诗的特质。此时的禅诗，处于萌芽阶段，虽未

形成宏大的创作潮流，但诗与禅相互渗透的趋势愈发明显，为后世禅诗的繁荣积累了经验。

【唐代：禅诗的成熟】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全盛时期，也是佛教发展的繁荣阶段，二者相互激荡，共同推动禅诗走向成熟。武则天当政时期，禅宗六祖慧能横空出世，他革新了佛教修行理念，使禅宗更加贴近大众生活，禅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这无疑为禅诗创作提供了强大助力。

从僧人创作来看，唐代涌现出王梵志、寒山、拾得、皎然、贯休等众多诗僧。王梵志的诗在敦煌残卷中多有发现，内容多阐释佛家教义，语言浅近通俗，以直白的方式劝人为善，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甚大。

中唐时期的寒山，诗作风格独特，大量模仿梵志体，以质朴的语言表达对人生、佛理的深刻思考，充满了机趣与智慧。

皎然不仅是一位诗僧，更是一位诗论家。他在《寻陆鸿渐不遇》一诗中写道：

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
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
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

通过对寻访友人不遇过程的描述，营造出一种清幽、闲适且充满禅意的氛围。

在文人创作领域，王维是当之无愧的“诗佛”。他的诗作深受佛教影响，达到了诗、禅合一的极高境界。他的禅诗以空灵静谧的意境著称，字里行间流淌着禅者的澄明心境。比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短短二十字，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出一幅清幽孤寂的画面，诗人在与自然的相融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禅境。再比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花在高高的枝头绽放，无人欣赏，也无人在意，它只是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奏，静静地开放，又静静地飘落。在这首诗中，王维没有刻意去描绘自己的情感，而是将自己融入到自然之中，让辛夷花的生长与凋零自然呈

现。这种对自然的客观描绘，体现了一种“无我”的境界，即忘却自我的存在，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在禅宗思想中，“无我”是一种超越自我、摆脱尘世烦恼的境界。

王维的《终南别业》更是禅诗中的典范：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堪称禅诗意境最美的佳联。因为它不仅是王维山居生活的细节表达，更传达出了一种极高的禅意——人生模式随意切换、精神境界峰回路转、陡然升华。“水穷处”与“云起时”看似没有联系，实则暗含一种空灵的转化：云是水升腾到天空做的梦，水是云降落到地上写出的诗。

这首诗的最后，王维写他遇到了山中的一位老者，两人开心地谈笑，忘了回家的时间。这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实则深合禅理。山中的隐居生活，随意漫游是偶然，水穷云起是偶然，遇到林叟是偶然，与林叟相谈甚欢是偶然，因相谈甚欢而忘了回家还是偶然。这一切都没有事先的规划、设计，更没有苦心的经营、部署，都是自然而然、浑然天成地发生的，这种处处“随缘”“无意于佳乃佳”的自在状态，不正是“禅”吗？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王维不仅禅诗写得



苏轼与好友高僧佛印



终南山，王维的隐居之地

好，他与高僧的交往也十分密切。道光禅师是唐代著名的高僧，擅长禅法，王维曾多次向他请教禅理、禅法。此外，王维还与神会大师有过交往。神会大师是六祖慧能的弟子，也是六祖法脉的重要传人。安史之乱爆发后，为帮助朝廷平定叛乱，晚年的神会捐献一大笔香火钱做军需，为平叛立下了大功。唐肃宗李亨召其入宫，封为国师，并下诏为其建菏泽寺，因此，后人亦称神会大师为“菏泽大师”。

结识神会大师后，王维接受了神会大师“顿悟”的禅学思想，神会大师也十分赏识王维的才华，特意请他为六祖慧能大师撰写了碑文——这也是唐代大诗人为六祖慧能大师撰写的第一篇碑文。一段高僧与大诗人交往的佳话就此诞生。

王维之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深通佛理，其诗作中也常常流露出禅味，传递出超然脱俗、闲情适意的情调。他的禅诗风格平实浅近，多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于平淡中蕴含禅理，充满了世俗的温度与闲适的意趣。《大林寺桃花》写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问刘十九》写道：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诗歌在简单的邀约场景中，展现出一种随遇而安、享受当下的禅心，不追求外在的繁华，只珍视眼前的温暖与惬意。

与王维相似，白居易的一生，也与众多

高僧交往，其中他与鸟窠道林禅师的故事一直被传为佳话。鸟窠道林禅师居住在杭州秦望山的一棵大树上，如鸟筑巢，故而得名。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前往拜访，问禅师：“大师住处甚险。”禅师回答：“太守危险尤甚。”白居易不解，禅师解释道：“薪火相交，识性不停，得非险乎？”这番话让白居易深受启发。

白居易又向鸟窠道林禅师请教：“到底什么是佛教？”鸟窠道林禅师的回答极为经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通过与鸟窠道林禅师的交往，白居易加深了对佛教的认识，他后来参禅修道，成为著名的香山居士。白居易后来作诗酬谢鸟窠道林禅师，题为《赠鸟窠和尚》：“空门有南北，相去几千里。不知白太守，何苦到庐山。”

到了唐朝，禅诗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的禅诗，在内容上丰富多样，既有对佛理的直接阐释，也有通过自然景物、生活场景传达出的禅意、禅趣；在艺术表现上，诗歌格律更加精严，对仗工整，意境营造空灵悠远，诗味醇厚，真正实现了禅意与诗境的完美结合。有人统计过，《全唐诗》中，入选的诗僧就有115人，禅诗2800首，可见当时禅诗创作的盛况。

【宋代：禅诗的鼎盛期】

有宋一代，儒释道三教高度融合，文人墨客深受佛学影响，僧侣们也深谙儒学和诗词，这种文化氛围为禅诗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使其创作进入鼎盛时期。

宋代诗僧数量众多，他们与士大夫阶层联系紧密，相互唱和，他们的作品在继承唐代禅诗风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内心世界的细腻表达，以及对生活琐事中禅意的挖掘。如北宋的参寥子，其诗清新自然，充满禅韵，在与苏轼等文人的交往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禅诗作品。

当然，宋代禅诗的创作主体还是学禅的诗人，比如苏轼、王安石等，他们既是诗人，又是士大夫阶层在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

苏轼的禅诗创作成就最大。他的禅诗风格豪放洒脱，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与豁达的处世态度。比如《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他以庐山的不同形态为喻，揭示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蕴含着禅家超越表象、直悟本质的智慧。

再比如《和子由浔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与弟弟苏辙从四川老家启程，一起进京赶考，走到河南，他们骑的马死了，只好骑驴到了浔池，在一家寺院借宿。老僧奉闲殷勤地招待了兄弟二人，弟弟苏辙还在寺院的墙壁上题诗留念。

五年后，苏轼从开封赴陕西溪凤翔做官，再次路过浔池。此时，老僧奉闲已经去世，骨灰葬入新塔；寺院的墙壁毁坏，再也看不到苏辙当年的题诗了。短短数年之间，人亡物迁，让人不得不出世无常之叹。苏轼感慨，人生就像飞鸿一样飘忽不定。飞鸿过处，或许会在雪地上留下抓痕。但天地苍茫，飞鸿翱翔天空，任意西东，本来就不在意雪地上留下的抓痕。苏轼在这首诗里创造出“飞鸿踏雪”的意象，显示了他对人生偶然性的深刻领悟。

宋代的天衣义怀禅师在讲“禅”的境界时曾说：“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修禅要达到什么样的心境？就是要像大雁飞过天空，影子投射到水池上，大雁并非有意留下自己的踪迹，水池也无意留下大雁的身影。禅者就是要在内心体悟这种干净的“空性”，不被红尘中的名利与欲望所染污，这才符合《金刚经》中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理念。

王安石的禅诗善于将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禅理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思辨色彩。他的《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以登飞来峰的感受为切入点，表达了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哲理，其中蕴含着禅家超越世俗、洞察本质的智慧，鼓励人们摆脱束缚，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在宋朝，随着士大夫参禅队伍的空前庞大，朝廷重臣纵使政见不合，也不妨碍大家不

约而同地热衷于禅修。一些遭受政治打击的朝臣，更是在佛法里寻求心灵慰藉。正因如此，宋代的禅诗，题材更加丰富，风格上也更加多样，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当异域的佛理与华夏的诗心相遇，犹如春风拂过草原，催生出文化交融的奇花异草——那是寒山拾得的平易率真，那是王维的随缘自在，那是苏轼的豁达超脱，更是无数高僧和诗人以生命体悟浇灌的精神之花。

“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诗赋予禅以优美的文学形式，使其更易于传播；禅则为诗提供了深邃的思想内涵与独特的审美境界，提升了诗歌的精神品质。禅诗，以诗为舟，载着禅的澄澈与通透，在千年文脉中缓缓穿行，为中国文学宝库晕染出空灵而深邃的底色。

（作者系文史学者）

书屋 2025年9期目录		
书屋讲坛	认识柯林伍德 对境聊观梦身	汪荣祖 刘芝庆
学界新论	徐梵澄《老子臆解》管见 独树一帜的民国清华“高考”作文题	闫林伟 何晓木
红色记忆	“时代的鼓手”——田间	章梓良
人物春秋	疑古玄同，向光而行 常任侠购书和保护文物 梁漱溟与伍庸伯 金九经的北京朋友圈 李渔叔的“以文载道” 刘啸虎 郭 俏 林长民与徐志摩的忘年交	邵红能 倪平方 周允中 杨海亮 黄艳芬 谭怡文 赵志庸
书屋品茗	吾心自有光明月 读莫理循书信集点滴 一部深度的传记力作 残雪比卡夫卡走得更远	靳新来 张祚臣 刘金祥 孙仁歌
灯下随笔	想起顾城谢烨 丰子恺与《子午山纪游册》 书屋·山房·书院 书人自牧	非 马 张 南 刘鸿洲 曾纪鑫
说长论短	话说“伦敦糕” 《搜神记》四题 通天河之难 从小人物看施耐庵的笔法 写信，也曾是一门生意	张建智 周 实 韦 钦 汪玉环 万益君
域外传真	战火中的伊夫林·沃 “死亡吓不倒我”	欧阳耀地 余凤高
史海钩沉	王朝更替的嬗变律 当农学进入日用百科	苏露锋 周朝晖
前言后语	一甲子对香港文学的关怀 身处走出乡土的历史进程 “兰陵笑笑生”是谁？ 《私语》自序	黄维樑 陈心想 向继东 睦达明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10.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85486812 0731-85791300 邮箱：1245297948@qq.com		



傅斯年

“丝毫不通融”的傅斯年

文 | 魏邦良

傅斯年有一个特点：爱才如命，求贤若渴。他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四处网罗人才，不惜代价，费尽周折，请来了赫赫有名的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分别担任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的主任。

不为老师破例

1929年史语所迁北平后，所中学者纷纷去北大、清华兼课，贴补家用。课兼多了，研究院的本职工作难免受到影响。于是，傅斯年提出，史语所成员不得在外兼课。可赵元任、陈寅恪对清华大学感情极深，坚持在清华兼课，否则，宁可辞去史语所工作。为留住两位大师，傅斯年只得对自己的话做了如下修正：“只有你们二位可在外面兼课，别人都不许。”但傅斯年的妥协也有底线，赵、陈二人可破例在外兼课，但不能拿专任研究员的薪水，只能拿低一等的特约研究员薪水。

1930年，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12月7日，北大出现一份匿名宣言《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其中写道：“自从入朱希祖主宰下的史学系以来，无一事不令我们失望，课程指导书的屡屡变更，书籍设备的因陋就简，阴险手段的排斥教授，敷衍

愚弄的欺骗同学，已竟不是再三再四，而是再七再八，以至于难以数计，我们热烈到达极点的求知欲，现在降临到零度以下了。”宣言还列举了朱希祖作为系主任种种“专断把持及嫉贤妒能的行为”，表示“我们忍无可忍，所以才发生这一次的全体驱朱运动”。

遭学生如此激烈痛斥，作为系主任的朱希祖实在丢脸，斯文扫地之余，向时任代理校长陈大齐“坚请辞职”。虽被极力挽留，但朱去意已决，随即找昔日弟子、时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另谋饭碗。之前，朱希祖已是史语所特约研究员，此时既打算从北大辞职，就想改为薪水更高的专任研究员。

傅斯年告知朱希祖，任专任研究员的前提是，不能在别处兼职。朱希祖在给傅斯年信中同意辞去所有兼职，保证“此后愿移忠于北大精神以忠于研究院，助兄发展史学事业”。

此后，为入研究院任专任研究员，朱希祖和傅斯年有过多交流。1931年1月25日，史语所召开的会议中，聘朱希祖为专任研究员一事作为决议写入会议记录中，薪酬为每月500元（研究院最高档）。本月，北大时任校长蒋梦麟致函朱希祖，允其辞职。

2月10日，北大史学系学生致信朱希祖，对“驱逐事件”表达歉意。朱希祖接受了学生

们的道歉，随即给新任校长蒋梦麟写信，改辞职为请假。但他并未将此事告知傅斯年，故3月史语所正式聘朱希祖为专任研究员。如傅斯年知道朱希祖已不想从北大辞职，决不会聘其为专任研究员。在北大复职，又在史语所任专任研究员，不符规定。

严守规矩办事

4月7日，朱希祖致信蒋梦麟，“拟销假复职”，并道出其不舍北大的原因：“希祖查研究所中别无教授担任明清史指导，明清史料整理会亦无人指导整理，故不忍决然舍去。”另外，朱希祖还表明自己“已专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所以，在北大不支薪。

朱希祖明知中研院专任研究员不能在别处兼职，但留恋北大丰富的明清史史料，一旦辞职，就无机会接触，于是提出不拿薪水白干活，且只保留在北大研究所导师的兼职。傅斯年是他昔日弟子，他以为弟子会为老师破一回例，未与傅商量就给蒋梦麟写了这封信，想来个先斩后奏。没想到蒋梦麟也知道史语所的规矩，专任研究员不能有兼职，于是便把这封信转给了傅斯年。傅阅后当然不快，即致信朱希祖重申规矩，同时也表明对其出尔反尔的不解与困惑。

信中，傅斯年表示，既然朱在北大复职，史语所也就希望他安心在北大工作，不再聘其为专任研究员了。朱希祖回信说，自己辞去了北大所有教职，“惟因南明史材料关系，一脱离北大，阅览抄录甚难，固商请可否兼任北大研究所指导功课两小时”。这样的辩解似乎是自欺欺人，既然拿了专任研究员的高薪水，就要辞去兼职；想在北大兼职，便于阅览抄录南明史材料，就要做出牺牲，只能任特约研究员，拿低一点的薪水。

傅斯年没有接受这样的解释，5月初，他将朱希祖的专任研究员改为特约研究员。朱希祖业已辞去包括北大在内多所大学的教职，只保留北大研究所导师一职，在史语所只能拿特约研究员的薪水，收入锐减，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但他没意识到，这是自己“三心二意”所致，反归咎于傅斯年的不讲情面。其实傅斯年不过照章办事，并无不妥。



北海公园静心斋（镜清斋），曾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驻地

1932年，罗家伦邀请朱希祖远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因不能就任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朱希祖怀揣愤懑，踏上远行之旅。1938年8月7日的一则日记，仍流露出朱对傅斯年不讲情面的耿耿于怀：

……民国十九、二十两年构傅斯年逢蒙（传说中夏代神射手羿的弟子，因忌恨弑师——编者注）之祸，北京大学及中央研究院两被夺位，二十一年夏不得已出居广州，播迁失所……书籍既分散于南北，饥躯又偏走于东西，著作不能着手，皆蒙此影响也。（《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

这番话说得不够公正。傅斯年只是严守史语所的规矩，而朱希祖贪恋北大丰富的明清史材料，想脚踩两只船，才两脚均踩空，所谓“播迁失所”，实在不能怨傅斯年。

陈寅恪的格局

对于傅斯年之不讲情面，朱希祖耿耿于怀，而陈寅恪则完全理解。

傅斯年与陈寅恪私交甚好，两人在柏林大学读书时就交往密切。抗战时期，傅斯年虽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但却拖着病体无微不至关心陈寅恪。有时跑警报，别人往外跑，他却晃着肥胖的身子往楼上爬，因为他要把陈寅恪搀下楼。

两人堪称知音密友，即便如此，傅斯年对陈的“特别关照”也没有逾越史语所的规

定。比如，在外兼课可以，倘若陈寅恪不能在所中上班，则只能拿兼职薪水，而不能领专任薪水。

1942年6月，陈寅恪人在桂林，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致信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打算聘陈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叶企孙关心战乱中贫病交加的陈寅恪，傅斯年当然也支持，但他提醒叶，由于陈远在桂林，不能在史语所驻地四川李庄上班，所以只能聘陈为特约研究员亦即兼职研究员，拿兼职的薪水。为使叶明白自己的苦心，他在信中有这样的解释：

……寅恪来敝所专任其职，原为本所同人所渴望。但寅恪家庭情形或者不肯来李庄，弟亦不能勉强。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故寅恪不能住在桂林而领本所专任研究员薪，必来李庄而后可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叶企孙复信同意，“尊见甚是”。然而，7月下旬，傅斯年从某办事员的信中获悉，叶企孙直接函商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600元（外加薪40元），院长已批准照办。



陈寅恪先生

说好的事又变动，且事前未沟通，傅斯年愠怒。他想，等聘书寄到史语所驻地四川李庄，先将其扣留，再和叶企孙理论。没想到，叶企孙索性将聘书直接寄给了桂林的陈寅恪。这下傅斯年坐不住了，向叶企孙发了一串声明，表示对任何违反史语所规定之举都“丝毫不通融”：

弟绝不能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人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傅斯年遗札》）

为避免误会，傅斯年还写信给陈寅恪，详细解释前因后果：

……此事错误在何处，俟企孙兄信到，或可知之。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法在本所之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不可不说也。（《傅斯年遗札》）

其实，陈寅恪非常理解傅斯年的难处，对他的做法完全支持。即便傅斯年顾念私情，破例聘他为专任研究员，以陈的性格和做派，也绝不会接受的。事实上，他确实这样做了。在回信中，陈寅恪告诉傅斯年，自己接到中研院寄来的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

陈寅恪表示：

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刘正、黄鸣《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对傅斯年的“丝毫不通融”，陈寅恪无丝毫芥蒂，理解且支持，其格局和境界，由此可知。📖

（作者系文史学者）

欧阳修为范仲淹撰神道碑

文 | 陈季冰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在徐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消息传至京城，全城震悼，朝廷特意辍朝一日，以哀恤这位天下士大夫共同的精神领袖。

当年十二月，范文正公被安葬于河南府（即洛阳）尹樊里万安山下。早在他染病不起时，仁宗皇帝便不时派人前往送药和探视；得知他逝世后，仁宗帝感伤嗟叹许久；到下葬时，皇帝又为他的墓碑御笔亲题“褒贤之碑”的碑额……

为这位后世公认的“有宋第一名臣”撰写一篇叙述他一生事迹的神道碑，就成了一项无比光荣而沉重的使命。它自然落到了欧阳修身上，这并不全然因为他是天下共推的文坛宗师。

“累年未成”的神道碑

欧阳修和范仲淹分别是古文运动的旗手与政治革新的中坚，故而当时没有谁比欧阳修更适合来为范仲淹“盖棺定论”的了。欧阳修自己也视之为责无旁贷。他比范仲淹小十八岁，可以说是后者的下一辈了。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欧阳修从年轻时就是范仲淹的追随者，是与他同进退、共甘苦的同志和挚友。

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平生第一次遭遇贬谪，从朝廷中枢的馆阁要职外放夷陵县令，就是为遭排挤的范仲淹鸣不平而受的牵连。

后来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中，时任监察御史的欧阳修是核心成员之一。他这篇力透纸背的疏奏——《朋党论》，正是作于新政遇挫之际。当时，新政的反对者们将皇权历来最敏感的“朋党”指控指向了范仲淹和他的同僚身上。

然而，这篇神道碑却让一代文宗写得格外别扭和痛苦，以至于“累年未成”。范仲淹的几个儿子忍不住数次催促，欧阳修回信说：“此文极难作，敌兵尚强，须字字与之对垒。”按生活于两宋之交的著名文人叶梦得的说法，这是因为范仲淹政治上的对手——仁宗一朝长袖善舞、深得皇帝信赖的宰相吕夷简的门生们当时依然遍布朝野。

既为了秉笔直书、经得起历史考验，同时又不挑起新的政治纷争，欧阳修不得不字斟句酌、慎之又慎。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推测更有说服力，叶梦得还说，他曾在范家亲眼看过这封信。

目前存世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又称《褒贤之碑》）不过两千字出头，居然花了一年还写不成，足见欧阳修落

笔时的心态是多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在叙及范仲淹担任边帅镇守宋夏边境时与吕夷简修好言和一事，欧阳修写道：“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没想到范仲淹的儿子、数十年后的“元祐更化”时期出任宰相的范纯仁收到这篇文章后断然说道：没有这样的事，我父亲至死都没有与吕公和解。

范纯仁请欧阳修对这部分内容作出修改。欧阳修很不高兴，对范纯仁说：“此吾所目击，公等少年，何从知之？”欧阳修不肯修改，范纯仁于是自行删去二十多个字，刻石立于范仲淹墓上。欧阳修得知后愤然对人说：“这不是我的文章！”（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

关于这件事，时人还留下了好几个不同版本的记载，内容主旨差别不大。《邵氏闻见后录》中说，欧阳修曾因为范纯仁擅自改动自己的文章，向苏洵表达过自己的强烈不满。但苏洵的儿子苏辙却说，这场口水战自己是从张方平（字安道）那里听来的。与叶梦得差不多同时代的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还增添了另一个重要细节：当欧阳修得知范纯仁擅自修改自己的文章时，叹息说：“我亦得罪于吕丞相者，惟其言公，所以信于后世也。”

与范家、欧阳家乃至苏家后人有多重直接交往的叶梦得在剖析这桩“悬案”时，采取了调和折中的立场。他认为，范仲淹大半生仕途的确受到吕夷简的一再打压甚至刻意陷害，不然他能成就更多伟业，所以范纯仁的坚持并不为过。然而，在面对西夏这样的外敌时，吕、范二人都能搁置纷争，自觉地以国家利益为重，他们在此事上同心协力的确是事实，所以欧阳修的文章也不能不说是具体事实的忠实还原。

叶梦得还提供了看待这件事情的另一个视角：欧阳修的这篇神道碑作于仁宗朝末，当时非但“吕党”和“范党”中的大部分骨干都依然在朝，与“吕范党争”有直接和深度关系的仁宗皇帝也还在世，这也让欧阳修下笔时更加左右为难。

吕、范分歧

纵观范纯仁日后的政治生涯，他绝不是一个党派意识强烈、小肚鸡肠的人。相比于父

亲范仲淹的疾恶如仇，范纯仁更像一个包容大度的谦和君子。在后来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所谓“旧党”阵营中，范纯仁是最愿意变通和妥协的一位，也是对反变法领袖司马光提出过最多不同意见的人。据此推测，范纯仁的坚持显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不惜得罪父亲的故交、当时文坛第一人欧阳修，一定也是为了捍卫自己认为必须公之于世的真相。

从苏辙的记载看，对于吕、范二人最终有无“解仇”的问题，当时的主流舆论似乎是倾向于范纯仁而非欧阳修。所以，更多非议反倒是指向欧阳修，而不是未经同意擅改欧公大作的范纯仁。苏辙之所以故意不提自己的父亲，而要搬出二苏兄弟的第一位伯乐张方平，可能也正是因为张方平在政治立场上属于“吕党”，是范仲淹的反对派，素与欧阳修不睦。作为一个后辈，他想以这种方式来淡化自己同样尊敬的前辈之间的爱恨情仇。

范仲淹身后另一篇重要纪念文章——墓志铭，是他的另一位同志和挚友，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数度出任宰相的富弼（字彦国，著名词人宰相晏殊之婿）撰写的。他的态度就比欧阳修要黑白分明得多。

在写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富弼还委婉地批评说，文章就该明辨是非、扬善惩恶，那种隐晦委婉的春秋笔法，非孔子那样的圣人不可为之。他说，自己写的《希文墓志》中，所诋奸人皆指事据实，尽是天下人闻知者，即非创意为之，彼家数子皆有权位，必大起谤议，断不恤也”。（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言下之意似乎是，欧阳修是在和稀泥，其实完全不必顾虑那么多。

我猜想，富弼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对于文学和学术缺乏直觉敏感和深刻思考，他专注于写作在当下的社会功能。而欧阳修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他下笔时想得更多、也更远。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富弼对欧阳修的《范公神道碑铭》还提出过一个细节上的意见，他认为欧阳修没有写清楚范仲淹一生仕途中所任官职的升迁情况，让人看得不够明白。这对于时人来说，大概是很重要的。但欧阳修回答：这篇神道碑写的是“天下国家之大者”，后来人才不会感兴趣范公的官场履历表呢——同样是写文章，纪念一个共同熟知的

人，欧阳修和富弼关注的重点是截然不同的。

放到千年以后的今天来审视，范仲淹的高风亮节自不待言，但要因此便把吕夷简说成一个奸臣和小人，恐怕是为偏颇的。不说别的，以宋仁宗之英明睿智，能够如此长久地信赖和倚重他，就是对吕夷简人品道德与政治才干的有力背书。吕夷简与范仲淹的分歧固然不能完全排除利益之争，但更多的是对当时局势判断以及执政理念方面的个人分歧。

吕夷简未必是一个勇于站在时代潮头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但在和平守成年代，他绝对是一个务实干练的能吏，总能够把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处理妥帖。“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这就是以审慎克制闻名的仁宗皇帝选择他的原因。

在对形势判断的大方向上，宋仁宗是站在吕夷简一边的。不到迫不得已，他不会支持范仲淹的全面更张计划，即使偶尔支持一下，也是三心二意、有所保留的。宋仁宗并非不知道范仲淹的忠鲠与才华，但在他的政治路线图中，老成持重的吕夷简是比激进求治的范仲淹更趁手的棋子。事实上，宋仁宗也一直在努力给范仲淹寻找适合他的角色。

从时人留下的许多记载看，吕夷简虽然确有贪权恋栈的短处，但他的肚量一点也不差，就算谈不上“肚里能撑船”，也显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总之，吕范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善恶是非之分；“吕党”与“范党”之争，也不是君子与小人的斗争——正如后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争、“旧党”与“新党”之分（至少在徽宗朝蔡京等执政之前）那样。亲身卷入过酷烈的改革与政争的梁任公独具慧眼地指出：“中国前此之党祸……后此之党祸，皆可谓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不肖者固争焉以营其私，即贤者亦争焉以行其志，争之既急，意气自出乎其间，彼此相诋，而以朋党之名加入，于是党祸遂与宋相终始矣。”（梁启超《王安石传》）

一个时代的土风

作为一个深具人性直觉与历史洞察力的文学家，欧阳修对自己的文章寄予更远的抱负。欧阳修与富弼、范纯仁一样，都是局中



宋仁宗篆额、欧阳修书《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拓片

人，他能够跳出自己身处的时代和社会，努力留给后世更高层次上的“客观真实”。具备这种自觉意识的人凤毛麟角，说到底，这就是后世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都能从醉翁的文章中获得独特感悟的原因。

据说有个叫江休复（字邻几）的官员兼文人，不知为何与欧阳修气场不合，晚年著笔记《江邻几杂志》，对欧阳公多有诋毁。好友梅圣俞得知后告诉了欧阳修，但他始终不去打听。后来江休复去世，欧阳修前往吊唁，痛哭不已，并且主动对他儿子说：“你父亲的墓志铭，就由我来写吧。”以欧阳修的文坛身份，这可是千万人求之不得的殊荣。在欧阳修写的这篇墓志铭中，没有一句贬低江休复的话。知情人说，这绝不仅仅是展现了欧阳公的大度与包容。其中更深之意在于：后人读到这篇文章，能够感知欧阳公对江休复的始终如一，就不要再轻信江休复在《江邻几杂志》中对欧阳公的诋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的确，这种历史使命感贯穿于欧阳修文学生命的始终，让他从未有过片刻的马虎与懈怠。📖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双六节”的由来

文 | 李开周

1935年6月6日，上海教育界庆祝教师节，除了教会学校以外，多数大学和中小学都在当天放假，一些学校还组织教师聚餐，餐后去浦东游玩。

看到这条旧闻，现在的读者可能大惑不解：几十年前上海的教师节，为何定在6月6日庆祝呢？其实不止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地方都在6月6日过教师节，以至于当时的人们把教师节称为“双六节”和“六六节”。

1942年5月3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日报》刊发短讯：“六六教师节即将来临，延安市三科、延安市小学教师联合会、市商会、市青联，特联合组织延市第一次教师节纪念会，联合市内各有关机关置备慰劳品，于六月六日慰劳延市全体小学教师，届时将在南门外市立完小召开纪念大会。”

由此可见，从大都市上海，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都把6月6日作为教师节。

邵爽秋发起“敬告同胞书”

6月6日的教师节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追溯到一位名叫邵爽秋的教育家。

邵爽秋是江苏人，出生于1897年，1913年就读江苏第五师范学校，1918年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去美国留学，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他去英国、法国、德国考察，1927年回国，

先后在南京中学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来改名“国立中央大学”）任教。

邵爽秋在南京工作期间发现，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普遍紧缺，教师薪水常常欠发，教室、教具等硬件设备严重不足，于是他倡导了一场“庙产兴学运动”——没收寺庙资产，用来补充教育。由于当时宗教与迷信思想盛行，庙产兴学阻力极大，邵爽秋受到宗教界和一些国民党元老的攻击，有人还扬言要暗杀他。他被迫去广州避难，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不久又去上海任教。

1931年5月，邵爽秋联合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等高校教授，倡议设立教师节，首要目的是让教育界有识之士团结起来，跟反对庙产兴学的传统势力做斗争。

1932年2月，邵爽秋得知主政河南的冯玉祥正在开封推动庙产兴学，便接受邀请，到开封担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与河南教育厅合作，调查教育经费问题，还成立“开封教育实验区”，在开封东郊的大花园村和西郊的杏花营村办起半工半读的学校。

当时的内陆省份都很穷，河南也不例外，开封的教育经费问题比邵爽秋工作过的南京更严重。1932年6月，邵爽秋再次发起设立教师节，这回他联络了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廉方、中央政治学校教授程其保等352名教授，在报刊上联名刊发《提倡六月六日为教师节敬

告同胞书》，明确提出以6月6日为教师节，呼吁全国教师一起行动，争取达到三项目标：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地位、增进教师修养。

这份“敬告同胞书”指出：“小学教师之俸给，不足以仰事俯蓄，此固尽人皆知，即大学中学教师，时因欠发薪水，生活每起恐慌，疾病而不克医药，学校复靳其俸给；年高而不胜繁剧，学校复解其职位；生活代价与家庭负担与年俱进，而学校并无年功加俸之制；不幸在职病故，身后萧条，任其妻子冻馁，而学校又无抚恤之条……至言教师之地位，征诸事实，恒视学生之好恶，及其他特别原因为进退……而复因政局变化，校长更换，党派倾轧，社会排挤，时有朝不保夕之势。”

教师薪酬等级

低薪、欠薪、教师职位没有保障，邵爽秋说的是事实吗？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

20世纪30年代，女作家苏青大学毕业后，在宁波的一所小学教书，月薪20块大洋。婚后，她的丈夫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月薪30块大洋。而根据《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记载，当时上海码头苦力的平均月薪为7块大洋，熟练技工的平均月薪为35块大洋，上海老县城一所小平房的平均月租为5块大洋，法租界一所石库门小院的平均月租为40块大洋。苏青夫妻做教师的薪水高于码头苦力，但略低于熟练技工，在老县城租小平房绰绰有余，但去法租界租小院就力不从心。

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要比中小学教师高得多，抗战前的大学教授几乎都是高薪阶层，但欠薪现象就比较严重了。《鲁迅日记》记载，从1919年到1925年，鲁迅一边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上班，一边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理论上每月可以进账几百块大洋。但从1920年起，鲁迅的薪水就被欠发、扣发，到1926年他从北京南下广州时，总共被欠了9240块大洋的薪水。与此同时，鲁迅又要养活母亲、妻子、兄弟，又要去琉璃厂买书买拓片，开销很大，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多次向好友许寿裳借钱。

有一位成都作家吴虞，也曾经在北京大学教书。查《吴虞日记》，1923年2月15日，他

才领到1922年10月份30%的工资，总共是78块大洋。1926年，吴虞担任成都大学国文教授，聘书上写的是月薪80块大洋，但实际上只能领到七成。到1926年7月，成都大学给吴虞的月薪涨到200块大洋，但仍“实支七成”。1927年6月18日，吴虞没有领到上个月的工资，去成都大学庶务处一问，“盖送薪金之人逃去未归也”，负责给教授们送薪水的工作人员竟然卷款跑路了。

抗战期间，全国学校都不再用银元结算工资，改发法币或其他纸币，由于通货膨胀严重，无论中小学教师还是大学教师，实际收入都断崖式下跌，教师从理论上的高薪阶层沦为实际上的贫困人群。以抗战大后方昆明为例，1942年夏天一双皮鞋要1000元（法币，下同），一套西装要3000元到5000元，而西南联大的教授月薪只有一两千元，拉洋车的车夫却可以挣到两三千元。

《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有一封信，是沈从文1942年9月8日寄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他在昆明教书，租不起城里的房子，吸不起小铺的纸烟，“教书阶级尤其是大学教授，便俨然独沉水底，无从呼吸”，“照收入说，教师最苦，随便换一职业即可将生活改造”。

即使在抗战前夕，普通教师的收入也只能勉强养活一个小家庭，绝大多数教师都渴望提高薪水。1937年6月6日，《海盐民报》刊登了一篇《一个教师的梦》，大意是某小学教师工作勤勉，教学有方，在历次教学比赛中都被列入甲等，教育局发文到学校：“应予嘉奖，



女作家苏青

自下学期起，着予晋级叙俸。”省教育厅也发了公告，允许他去浙江大学进修，进修期间工资照发。这位小学教师非常兴奋，热血沸腾，拎起包袱就要去进修，却被“砰”的一声惊醒，原来那只是一个美梦。他回到现实，没有嘉奖，没有晋升，没有进修的机会，只有两个小学生在破烂不堪的教室里打架。

为何将教师节定在6月6日

除了低薪、欠薪、难晋升以外，民国时期教师的职位也不稳定，很容易丢掉饭碗。1936年6月，邵爽秋主编的小册子《教师节与教师幸福问题》出版，提到国民党治下的公办学校聘任制度：教师一般由校长聘用，聘任期限只有一年，一年之后如果不续聘，就等于自动解职。所以，只要校长不满意某个教师，那个教师的饭碗就保不住，只要校长一更换，就会有一批教师集体失业。

邵爽秋指出，师资需要的急迫是无可讳言的，但要做到养成一个师范生毕业，就有一个师范毕业生在教育界上服务，徒用强迫服务的章程来强制，是没有效用的。邵爽秋认定，要使在职教师安心任事，当从改良待遇入手。而政府确立的最低薪水标准“两倍衣食住（以舒适为度）三事之所费，为最低限度之薪水”，因为教师除筹措本身生活费外，还负有

维持家庭生活费的责任。在经济保障之外，还要求重视对教师在健康与娱乐上的要求。教师任职数年后，应与以半年或一年之休假，令其出外研究或考察，费用由公家担任。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邵爽秋联合发起双六教师节之后，全国教师云集响应，从1932年起，在南京、上海、广州、重庆、开封、南昌等地，每年6月6日都会有大批教师自行组织，举办教师节纪念活动。当时举办这项活动的目标不是庆祝，更不是放假，而是试图通过“人多力量大”这种方式来让当局提高教师薪水，改善教师待遇，保证教师饭碗。

这种自下而上发起的教师节活动略有收效。1936年7月，国民党领导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修正小学规程》，将小学教师的续聘期限从一年延长到两年，并规定校长不得任意解聘教师，解聘之前必须呈报教育局批准。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从法令上确认了教师节，此后每年的6月6日都是官方认可的教师节。

当时为什么把教师节放在6月6日呢？这跟20世纪30年代的学年制度有很大关系。现在的学年从9月1日开始，到来年8月份结束，而在当时，大部分公立学校的学年都是从8月1日开始，到来年7月份结束。每年7月份一个学年结束之时，也是部分教师被解聘之时，而把教师节安排在6月份，就等于是在解聘之前让广大教师发声，给当局和校长施压，保证一部分教师不被解聘。那为什么非要安排在6月6日，而不是安排在6月份的其他日子呢？原因很简单，6月6日，双六日，特别好记。

抗战期间，6月6日是当时全社会公认的教师节，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权也会在这天举行活动。以1942年为例，晋察冀边区政府在5月25日就发布公告，要在6月6日举行纪念会，对边区教师进行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慰问：第一，对教师减免公粮税；第二，对教师发放保健费；第三，对小学女教师发放卫生费；第四，拿出边币2000元，奖励模范小学教师。这里说的“边币”是指当时由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主要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流通，可以兑换成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



邵爽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和谐》

许鸿飞（住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孙星阁 李汛萍
《双喜长青图》